

南 華 大 學

文學系

碩士論文

《水滸傳》人物與宋代社會階層之考察



研 究 生：閻宇隆

指 導 教 授：陳旻志 博士

中 華 民 國 一 〇 七 年 一 月

南 華 大 學

文 學 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水滸傳》人物與宋代社會階層之考察

研究生：閻亨漢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蔡金仁  
陳曼志  
廖俊龍

指導教授：陳曼志

系主任(所長)：陳章錫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一〇六年六月九日

## 摘要

本論文基於《水滸傳》具有人物性格多樣化，說明小說的虛構以及人性的真實，將探討梁山泊的社會基礎及政治意義。包括宋江何以能為梁山泊領袖，由祝家莊與曾頭市談到宋代軍隊與官僚、在梁山泊關勝的地位何以能超越林沖等議題。再者進行瞭解宋代的社會基礎，才能知道梁山泊高舉「替天行道」之政治意義，也說明梁山打著「替天行道」旗幟，但他本質上仍然是個流氓集團，唯有是流氓才能「聚義」，梁山事業才得以在很短的時間內興盛。

此外探討宋代的政治，特別是胥吏在統治集團的內部，是處在邊緣地位的位階，卻值得聚焦考查。再者宋代國富而兵弱，不但在大遼和後來的大金面前屢戰屢敗，連地處西北一隅的西夏 都敢侵掠大宋疆域。這是宋代的「重文輕武」政策，以及宋代兵制的特點。再者關於角色設定與梁山泊的定位上，梁山英雄在報國無門之時，他們揭起「替天行道」的大旗，懲治貪官汙吏，運用暴力而不是依靠早已顛倒的朝綱，來維持著廣大百姓所認可的社會正義。這是作者鋪陳出水滸英雄好漢的造反，乃是「官逼民反」最佳理由。

整體而言，通過《水滸傳》人物與中國政治生態的探討，對於《水滸傳》人物與中國政治生態的研究，通過此一複合式的視野，將有助於進行一有意義的參照。

關鍵字：水滸傳、宋代政治、替天行道、官逼民反

# 目錄

第壹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1
一、研究動機 .....	1
二、研究目的 .....	2
第二節 問題的提出與研究架構 .....	3
一、問題的提出 .....	3
二、論文架構 .....	4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範圍 .....	6
第四節 相關研究成果探討 .....	8
一、專書 .....	8
二、單篇論文 .....	10
第貳章 梁山泊的社會基礎及政治意義 .....	13
第一節 打著「替天行道」的流氓集團 .....	13
一、宋代之社會基礎 .....	14
二、替天行道之政治意義 .....	18
第二節 宋代時期的經濟生活 .....	26
一、農民的生活 .....	26
二、社會的經濟基礎 .....	33
第三節 宋代時期的倫理觀念 .....	36
一、紳士階級的道德觀 .....	36
二、流氓階級的道德觀 .....	40
第參章 宋江何以能成為梁山泊領袖 .....	45
第一節 由宋江家族關係說明宋代的政治 .....	45

一、 宋江的身世背景 .....	46
二、 宋江的處事與性格.....	53
<b>第二節 王倫與晁蓋何以不能成為領袖 .....</b>	<b>61</b>
一、 王倫的性格與才能.....	61
二、 晁蓋的性格與領導風格.....	70
<b>第肆章 由祝家莊與曾頭市談到宋代軍隊與官僚 .....</b>	<b>78</b>
<b>第一節 宋代軍隊.....</b>	<b>78</b>
一、 祝家莊與曾頭市 .....	79
二、 宋代的軍隊組織與訓練.....	85
<b>第二節 宋代官僚.....</b>	<b>92</b>
一、 中央官僚權勢 .....	92
二、 地方官僚 .....	104
<b>第伍章 梁山泊關勝與林沖的地位論.....</b>	<b>110</b>
<b>第一節 關勝的家族關係 .....</b>	<b>110</b>
一、 關勝的家族關係與官場地位.....	110
二、 林沖的身世與官場地位.....	112
三、 水滸中大刀關勝何以力壓林沖成為五虎之首.....	114
<b>第二節 相關人物與梁山泊的定位 .....</b>	<b>116</b>
一、 角色設定與象徵 .....	117
二、 官逼民反與政治生態的關涉.....	124
<b>第陸章 結論 .....</b>	<b>131</b>
<b>參考文獻 .....</b>	<b>136</b>

## 圖目錄

圖 1 研究動機樣態圖.....	2
圖 2 北宋時期引發社會動盪示意圖.....	15
圖 3 宋代農民經濟構成方式剖析圖.....	28
圖 4 紳士階級道德觀形成示意圖.....	38
圖 5 流氓階級道德觀示意圖.....	43
圖 6 宋江品德形象分析圖.....	51
圖 7 聚義堂至忠義堂義的演變圖.....	55
圖 8 宋江領導能力分析圖.....	60
圖 9 薩孟武士大夫階級分析圖.....	69
圖 10 祝家莊武裝骨幹示意圖.....	81
圖 11 水滸傳與中國近代戰役引發關係圖.....	82
圖 12 宋代由盛轉衰態樣圖.....	84
圖 13 宋代軍隊的種類分析圖.....	89
圖 14 林沖的性格分析圖.....	113
圖 15 關勝何以力壓林沖成為五虎之首分析圖.....	115
圖 16 官逼民反事件分析圖.....	125

## 表目錄

表 1 梁山泊三個時期領導人比較表 .....	77
表 2 宋代中央機構分析表 .....	93
表 3 宋代中央官制列表 .....	95
表 4 宋代官制名稱 .....	98
表 5 梁山好漢的來源構成分類表 .....	117
表 6 梁山英雄出身類別表 .....	128

## 附錄

附錄 1 梁山泊好漢全覽解悉表(三十六天罡星) .....	141
附錄 2 梁山泊好漢全覽解悉表(七十二地罡星) .....	146

# 第壹章 緒論

《水滸傳》是中國四大奇書之中，成書較早、流傳相當廣泛的文學作品。本事乃溯源於北宋徽宗年間，當時朝廷黑暗腐朽，奸臣弄權使天下大亂，民眾走投無路無奈被逼上梁山。「撞破天羅歸水滸，掀開地網上梁山」<sup>1</sup>(第37回)，說明了一切動亂的根源都是來自上層統治者的腐敗荒淫，這也是亂自上作最佳的寫照。本文將具體探究有關《水滸》研究的相關範圍，研究方法以及章節架構。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一、研究動機

「水滸傳」故事，家喻戶曉，然而，除了人物塑造與故事精采之外，它廣受讚揚的藝術成就又何在呢？對於公理和正義的追求，原本就是人們心中永不止息的嚮往！《水滸傳》在這一點上，恰好發揮了一部文學作品的力量，安慰了人們的心靈，也激勵了人們要勇於追求，勇於突破。或許屬於《水滸傳》的時代已經離我們很遠了，但是遙想過去，來看看現在，生活在現代社會當中的你和我，是不是在心裡面也有一個理想當中的天堂呢？所以提醒您只要理想永遠存在，英雄就永遠不寂寞！

《水滸傳》這部小說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和統治階級的罪惡，寫出了「官逼民反」、「亂由上作」的歷史真實，揭示從「流氓」行為方式衍生出「劫富濟貧」、「替天行道」等價值觀念。說明社會根源在於殘酷的封建壓迫和剝削，肯定和歌頌了梁山好漢抗爭的正義性。研究的動機是希望能以剖析梁山人物的反社會行為，來說明現今社會中反政府的各種抗爭活動，就是這個時代的「官逼民反」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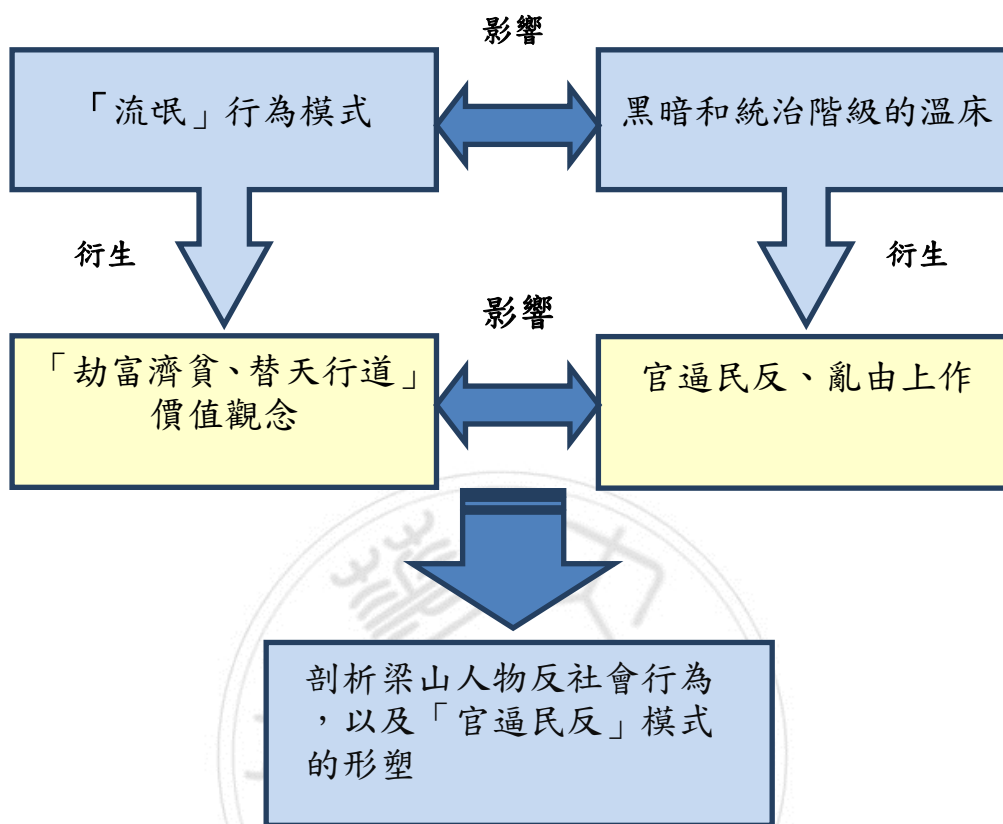
---

<sup>1</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年版，376頁。



達方式，此為本文研究動機之一。

圖 1 研究動機樣態圖



※閻宇隆繪圖

雖然聚眾領袖們的人格特質各異，但其在行為模式上，也可以找到一些相同之處。透過《水滸傳》人物性格分析和比較，找出領袖的各式風格，如宋江和晁蓋與王倫；林冲和關勝的比較，瞭解領袖人物的特質為何？以及如何賦予相應的定位，此為本文研究動機之二。

## 二、研究目的

《水滸傳》是一本政治性和社會性突出的小說，和現實人生實際相近，本論文基於《水滸傳》具有人物性格多樣化，說明小說的虛構以及人性的真實，因此選擇了政治、社會與人物角色相互關涉的層面，作為討論範圍，以人物分析的角度詮釋《水滸》，希望看出《水滸》故事在小說情節中的社會運作模式，當然也

包含了《水滸傳》所蘊涵的政治意義，本文希望能夠以不同的社會角度重新看待《水滸》，在學術前輩的成果上，挖掘新的意義，展現出《水滸傳》新的價值。

本文乃以「替天行道」為核心，並由讀者的角度出發，藉由《水滸傳》中英雄好漢的行為，探討「官逼民反」模式形塑的緣由，並凸顯出「官逼民反、亂自上作」的真實性，為悲劇英雄的遭遇，歸納文化模式的特殊型態。

## 第二節 問題的提出與研究架構

### 一、問題的提出

《水滸傳》對後世的影響，在於政治口號或政治要求，梁山水滸用簡單的語言文字突顯出政治訴求。最明顯的是「替天行道」這句話上，和表現在「忠義」這名詞的寓意上。宋江把原本的「聚義廳」改成「忠義堂」，並在堂前的大旗上寫著「替天行道」四個大字，什麼是「替天行道」？簡單的說，就是「劫富濟貧」。

本文乃就《水滸》人物設定對於後世的影響，以及「替天行道」的政治意義議題上，作進一步的整理和歸納，並由梁山英雄人物的塑造，提出關涉問題如下：

- 1、《水滸傳》是一部龐大而複雜的小說。就情節而言，這些人聚集梁山的目的是替天行道，反抗腐敗的政治，就梁山人物的特性與發展，延伸出「官逼民反」與「替天行道」的訴求，然而如何由梁山英雄的故事成因，瞭解宋代基礎及政治意義？
2. 梁山英雄人物大多數一生是曲折的，先是仗義英雄，招安後成為朝廷忠臣，最後是悲慘的結局。晁蓋是梁山好漢響噹噹的一個、受人喜愛及不可忽略的一個，為何最終不能成為梁山領袖，宋江最初的身分是吏，又何以能成為梁山泊領袖？
3. 《水滸傳》著重揭露了封建統治的腐朽，挖掘了遊民起義的根源。作品把視角伸向了封建統治階級身上，便於通過對統治者--上到皇帝，下到

地方上的土豪惡霸的罪惡的剖析，表明「亂自上作」。而領導這群「盜賊草寇」的梁山領袖，能讓一群人將希望寄託在他的身上，其有何優秀才能和特質？

4.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期，由於城市商業經濟繁盛，市民文化勃興，被西方漢學家們比附為中國的文藝復興。但政府軍對外作戰卻少有戰勝，何以連對付《梁山泊》都不如地方的武裝部隊，又有何原因導至宋代正規軍不如地方武裝勢力？
5. 《水滸傳》林冲是梁山第一高手功勳卓著，大刀關勝姍姍出場，力壓林教頭，成為代表梁山武將最高峰的五虎之首，其有何優點及特質？

## 二、論文架構

論文共分六章，探討梁山泊的社會基礎及政治意義、宋江何以能成為梁山泊領袖、由祝家莊與曾頭市談到宋代軍隊與官僚、在梁山泊關勝的地位何以能超越林冲及結論。各章節重點事項分述如下：

### (一) 第壹章 緒論

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與研究限制、研究範圍、文獻探討。

### (二) 第貳章 梁山泊的社會基礎及政治意義

先瞭解宋代的社會基礎，才能知道梁山泊高舉替天行道之政治意義是什麼，也說明梁山打著「替天行道」旗幟，但他仍然是個流氓集團，唯有是流氓才能「聚義」，梁山事業才得以在很短的時間內興盛。宋代時期的經濟生活、農民的生活，這和宋代社會的經濟基礎息息相關。宋朝的國勢並不強盛，北方又有一大片國土淪落在異族的手中，朝廷內又有奸臣弄權，小人當道。社會上貪官汙吏和仗勢欺人的土豪劣紳，更往往對平民百姓造成了直接的痛苦。梁山泊好漢的出現，從他們身上投射了一般百姓希望戰勝惡勢力的心理。他們替人們說了許多人們不敢說的話，他們也為人們做了許多不敢做的事，梁山泊好漢是他們所期望的。可惜的

是領導者宋江受到儒家忠君的思想，導致無法發揮流氓的本性而成為悲劇英雄。

### **(三) 第參章 宋江何以能成為梁山泊領袖**

梁山水泊的頭領中以遊民為最多，對於掙紮在生死線的遊民來說，生存、溫飽是他們最迫切的欲求，他們對於物質上的追求永遠是第一位的。中間還有大量的社會邊緣人物，包括武將、胥吏和自甘於處在社會邊緣人物。而古代社會的社會邊緣的處境是由於經濟地位、統治階級政策和人們自我選擇的結果。在梁山將領中占第三位是胥吏，但卻占了主導地位，宋江、鐵面孔目裴宣就是「吏」，雷橫、朱仝、戴宗、李雲、蔡慶、蔡福等就是「胥」。實際上宋代「官」「吏」是社會地位懸殊，學問教養、思想意識都有很大差別。由宋江家族關係說明宋代的政治，吏在統治集團的內部是處在邊緣地位的。主流社會對吏是有幾分歧視的，他們自視也賤，宋江既然是吏，所以他能成為梁山領袖的原因是他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

### **(四) 第肆章 由祝家莊與曾頭市談到宋代軍隊與官僚**

宋代國富而兵弱是出名的，不但在大遼和後來的大金面前屢戰屢敗，連地處西北一隅的西夏都敢侵掠大宋疆域。中國歷朝歷代，恐怕沒有比大宋朝更窩囊的了。這是宋代的「重武輕文」政策，以及宋代兵制的特點。宋代軍隊，在《水滸》中常見的區分軍隊類別的兩個詞，就是「禁軍」和「廂軍」。前者是中央軍，後者是地方軍，但根源乃在制度和訓練。曾頭市和祝家莊都是自籌錢糧、自練兵馬的民團，民團具體的戰鬥目的，就是保護自己的莊園，保護自己的家。這些人世世代聚族而居，同聲共氣，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練兵的目的明確，練兵的方法、防禦的模式也很有針對性。

### **(五) 第伍章 梁山泊關勝與林沖的地位論**

在角色設定與梁山泊的定位上，梁山英雄人物而在報國無門之時，他們揭起「替天行道」的大旗，懲治貪官汙吏，攻殺惡霸豪強，劫富濟貧，用暴力而不是依靠早已顛倒的朝綱來維持著廣大百姓所認可的社會正義。這是作者鋪陳出水滸

英雄好漢造反是被逼的「官逼民反」最佳理由。探討的是相關人物與梁山泊的定位問題，先從關勝和林沖的排名在角色設定與梁山泊的定位上，梁山英雄人物而在報國無門之時，他們揭起「替天行道」的大旗，懲治貪官汙吏，攻殺惡霸豪強，劫富濟貧，用暴力而不是依靠早已顛倒的朝綱來維持著廣大百姓所認可的社會正義。這是作者鋪陳出水滸英雄好漢造反是被逼的「官逼民反」最佳理由。關勝能排名在林沖之前，除有個了不起的祖宗外，他本人又是功夫了得，儀表不俗，再加上宋江需要的是排名第一上將，且必須是真正能聽從他命令和指揮，這樣才能達成他的夢想。

#### **(六) 第陸章 結論**

藉由《水滸傳》中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和統治階級的罪惡，寫出了「官逼民反」、「亂由上作」的歷史真實，揭示出遊民反抗朝廷的社會根源在於殘酷的封建壓迫和剝削，肯定和歌頌了梁山造反的正義性。並指出古代貪官為何每個時期都有，原因是受到制裁比率不高。所以，貪官才會不一直出現，到現今民主社會還在。透過古代與現今作一比較，分析出今日民主社會的各種現象，其實在古代就以已存在，只是形式不同而。

###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範圍**

本文使用歷史研究法，乃從歷史研究法和文獻分析法著手。一般而言，歷史研究法係指應用科學的方法探尋史料，檢驗歷史記錄及遺跡，藉以追求事實真相，組成一般原理。本文結合考察的脈絡分析如下：<sup>2</sup>

- 一、追溯考證水滸故事在歷史上的原貌。
- 二、閱讀各種水滸版本作品，探討作品間的源流關係，評介作品的風貌。
- 三、閱讀其他民間故事作品，確立它們和水滸故事的關係。
- 四、找尋水滸故事對社會的影響面等。透過檔案、書籍的分析和比對，剖析出官逼民反和替天行道真正的意義。

《水滸傳》思想的複雜性。是一部經過宋元數百年的累積，而最終成於元末

---

<sup>2</sup> 參見王雲五總編：《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社會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年7月第一冊，234~235頁。

明初的歷史題材小說。到明末崇禎年間，金聖嘆把《水滸傳》七十一回以後的文字全部刪掉另造了一個結尾，再加第一回改成楔子，編成七十回，並加以評點，成為清代唯一通行的版本。

好的文學作品的主題總是具有開放性、包容性，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水滸傳》也不例外，學術界對其主題爭訟已久，有「封建時代的愛國主義」說、「倫理反省」說、「諷諫皇帝」說、「復仇」說、「軍事人才悲劇」說、「反腐敗」說、「遊民」說、「綜合主題」說……各種說法都具有相當的理由，都能靠一定的論證和考辨得以成立。因此，我以為《水滸傳》的主題應為：一次由小官吏領導的、承載忠義思想的、反映忠奸鬥爭的遊民起義。其中，起義思想在後七十回減弱，遊民思想是義軍主要領導者的思想，而貫穿作品始終的是忠奸鬥爭思想。因而，忠奸鬥爭思想在諸種思想中處於駕馭和統帥的地位，是作品最主要的主題思想。

另外薩孟武先生其著作《水滸傳與中國社會》一書，對本文的研究啟發很大，從社會政治學的角度，分別從梁山內部組織的種種問題、外緣環境的般般限制和歷史條件上，分析了水滸英雄無法成事，在經濟、政治、社會等各種條件的緣由。並由小說中來解讀中國社會政治，以及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小說，本書推論的主軸，將作為各家論點之參照。

文學作品的客觀規定性，包含著眾多因素，文本構成則是眾多因素之一。《水滸傳》的成書過程比較複雜，在文本最終被寫定之前，已經有史書、野史、筆記、話本、戲曲及傳聞對其故事作了種種不同的描述。因此不少學者認為，《水滸傳》的文本是由民間創作與文人加工共同完成的。研究的困難在《水滸傳》版本繁雜，版本與版本之間分別很大，可以差上幾十回，同樣的情節又有各種不同的簡繁系統，加上多數主要版本往往僅存一兩套，且都有缺佚，又分散在中國、日本、歐洲各地，以致許多本來翻閱一下即可解決的問題，卻無法查詢而成為懸案。<sup>3</sup>資

---

<sup>3</sup> 馬幼垣著：《古典文學》，臺北，聯經出版社發行，1992年版，第七集下冊《排座次以後水滸傳的情節和人物安排》。

料很雜，要仔細分析卻是不易，以上種因素限制了對歷史的分析及研讀，只能對相關部分進行研究。

## 第四節 相關研究成果探討

綜觀《水滸傳》研究的文章和專書，大部分集中在作者、版本、主題、情節等方面，由於《水滸傳》流傳過程中過於複雜，很多問題至今仍是謎團未解，眾說紛紜，與本議題相關的專書和專文探討如下。

### 一、專書

#### 1. 王利器著：《水滸研究》<sup>4</sup>：

王利器在《水滸研究》一書中，對於《水滸傳》的形成、思想、版本、繁本和簡本問題、藝術性與對後人的影響，分為五章提出見解。

#### 2. 馬幼垣：《水滸論衡》與《水滸二論》<sup>5</sup>：

本書內容有考據和論析二篇。考據篇中對於《水滸傳》眾多小說的版本作者及成書問題深入考證，整理了流行於中國大陸的《水滸傳》，以氣度的角度分析作者作品的問題。論析篇討論的是《水滸傳》作者為施耐庵，亦或是羅貫中，並分析《水滸傳》與戲劇、話本的關聯，以及各種不同《水滸傳》版本間的關係。而《水滸二論》一書，乃針對故事、版本考釋，並對《水滸》文本中的陣法、人物死亡之謎等詳加討論。

#### 3. 王北固著：《水滸傳的組織謀略》<sup>6</sup>：

本書是從組織策略的角度著眼，對傳統文學名著《水滸傳》重新詮釋，通過梳理龐雜的人物身世和故事發展情節，乃至很少為人注意的情景對話、心理活動

---

<sup>4</sup> 王利器著：《水滸研究》，臺北，木鐸出版社發行，1993年版。

<sup>5</sup> 馬幼垣著：《水滸論衡》與《水滸二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2005年版。

<sup>6</sup> 王北固著：《水滸傳的組織謀略》，臺北，遠流出版有份有限公司發行，1998年版。

等細節性資料，別開生面地分析了梁山泊集團的形成過程及其主要成員類型、領導核心、人際脈絡、派系結構等，從中梳理《水滸傳》內在脈絡變化的線索，並提出許多獨到性的見解。

#### 4. 傅正玲著：《悲壯與蒼涼：水滸意境的探索》<sup>7</sup>：

本書是以討論意境為重心，探索中國古典小說的特質，及探討中國文學中的悲劇意識內容與爭議。

#### 5. 馬幼垣著：《水滸人物之最》<sup>8</sup>：

本書中，以探討《水滸傳》人物的個性為重心，不論角色，不計份量，只要人物在某方面足稱為「最」，均列入本書探究之人物。

#### 6. 薩孟武著：《水滸傳與中國社會》<sup>9</sup>：

薩孟武先生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不同的角度，精采的分析、詮釋《水滸》故事，及由此中所投射、反映出來的古代中國社會，並探討水滸好漢大多是出身低微、在社會底層討生活的「流氓份子」。分析了水滸英雄無法成事，在經濟、政治、社會等各種條件的緣由。並由小說中來解讀中國社會政治，以及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小說，具有相當的啟發性。

#### 7. 蕭相愷編著：《水滸傳鑒賞辭典》<sup>10</sup>：

蕭相愷的《水滸傳鑒賞辭典》一書，是以故事情節開始，到小說中主要人物的賞析，鑒賞與分析其故事情節之箇中原因。

#### 8. 孫琳著：《水滸傳續作研究》<sup>11</sup>：

從《水滸傳》續作解析入手，研究明清之際、清末、民國、新中國成立後等

---

<sup>7</sup> 傅正玲著：《悲壯與蒼涼：水滸意境的探索》，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年版。

<sup>8</sup> 馬幼垣著：《水滸人物之最》，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

<sup>9</sup> 薩孟武著：《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臺北，三民書局印行，1967年版。

<sup>10</sup> 蕭相愷編著：《水滸傳鑒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發行，2013年版。

<sup>11</sup> 孫琳著：《水滸傳續作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發行，2014年版。



歷史階段《水滸傳》續作對原作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接續與改編。通過翔實的案例分析，本作創造性地指出續作是人類文化發展過程中的必經環節。

9、黃波著：《隻眼看水滸----說破英雄驚殺人》<sup>12</sup>：

特點在於把水滸英雄置於廣闊的中國歷史和文化背景中，探究千百年來的大眾心理。探究梁山的權利結構、座次之謎、英雄與情色之關係等。

10、余大平著：《解讀水滸傳》<sup>13</sup>：

是從文化學、美學、心理學、歷史學諸方面，體驗出中國古典小說的豐厚文化內蘊。解讀《水滸傳》是中國古代小說故事情節及人物之善的一面，供為現代人感知、領悟與吸納，使讀者一起暢意於梁山泊。

11、老了著：《水滸十一年》<sup>14</sup>：

本書是從西元 1112 年到 1122 年，以梁山嘍囉的視角解讀當時草莽英雄的轟轟烈烈；從草根的視角看盛世草民的人生悲劇。分多個小主題，說當時人情世故，朝廷政事野史，鄉野趣聞八卦。

## 二、單篇論文

1. 孫述著：《南宋民眾抗敵與梁山英雄報國》<sup>15</sup>：

作者敘述的目的，是想要說明《水滸傳》的素材很多取自於宋金戰爭。梁山上的「忠義堂」便反映了「忠義人」的思想觀念，一丈青、關勝、呼延灼、李忠、周通等名字都是為了紀念與金抗爭的宋朝軍官和忠義人，晁蓋死於曾頭市暗示著宋欽宗被金人射死的傳聞、宋江最後被毒死影射岳飛被害，等等。

2. 馬幼恒著：《排座次以後「水滸傳」的情節和人物安排》<sup>16</sup>：

---

<sup>12</sup> 黃波著：《隻眼看水滸----說破英雄驚殺人》，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2008 年版。

<sup>13</sup> 余大平著：《解讀水滸傳—草莽龍蛇》，新北市，雲龍出版社發行，1999 年版。

<sup>14</sup> 老了著：《水滸十一年》，臺北，知本家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2009 年版。

<sup>15</sup> 孫述著：《南宋民眾抗敵與梁山英雄報國》，上海，古籍出版社，《水滸傳：怎樣的強盜書》一書，第二章，2011 年 4 月。

<sup>16</sup> 馬幼恒著：《排座次以後「水滸傳」的情節和人物安排》，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水滸論衡》一書，論析篇，2007 年 8 月。

作者以其精湛的考據功夫、深厚的學養和不凡的見識，在考據之外，亦對《水滸傳》的謀篇布局、情節、場面、情節及人物的安排有著精彩的分析和點評。

3. 胡萬川著：《粗魯豪放與肅穆威嚴——說李逵與宋江》<sup>17</sup>：

作者對於李逵與宋江不同的個性、特質具有獨特的見解與分析，並置重點於粗魯豪放與肅穆威嚴間的分界的說明。

4. 李喬著：《論中國歷史上的流氓文化》，<sup>18</sup>：

本文，作者說明流氓群體屬於社會下層(上層人物的流氓化是另一範疇的問題)；流氓文化屬於下層文化；在下層文化中，流氓文化屬於消極的、病態的、黑暗的部分。本文擬對中國歷史上流氓文化的主要內容做一考察，以期獲得對這一歷史文化現象的基本瞭解。

5. 林培雅著：《「水滸傳」關勝座次排名芻議》<sup>19</sup>：

本文試著從武藝與軍事的觀點重新來探討關勝的排名，從武藝來看，關勝是梁山泊中屬一屬二者，更重要的是從軍事觀點來看，關勝是梁山泊中最具有兵法素養，能運用戰術的將領，他之所以名列前茅，主要來自軍事上的重要性。

6. 傅正玲著：《從水滸傳七十回本及一百二十回本探究兩種悲劇類型》<sup>20</sup>：

本文說明七十回本與一百二十回本因時代思潮的影響，呈現出兩種結構，兩種悲劇意識。在結構上最大的差異是結局的處理，即這股原始氣性背反體制從各方聚顯於梁山泊，之後何去何從的省照。

7. 孫琰著：《有關「官逼民反」》<sup>21</sup>：

---

<sup>17</sup> 胡萬川著：《粗魯豪放與肅穆威嚴——說李逵與宋江》，臺北，聯經出版社，《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集第三卷》，1981年6月。

<sup>18</sup> 李喬著：《論中國歷史上的流氓文化》，北京，日報理論部，《史學理論研究》，1994年第1期，第56頁。

<sup>19</sup> 林培雅著：《「水滸傳」關勝座次排名芻議》，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成大中文學報》第26期，2009年10月，第65-69頁。

<sup>20</sup> 傅正玲著：《從水滸傳七十回本及一百二十回本探究兩種悲劇類型》，臺灣，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漢學研究》第18卷第1期，2000年6月，第237-253頁。

<sup>21</sup> 孫琰著：《有關「官逼民反」》，北京，《現代語文(文學研究)》雜誌電子版，2010年第22期5篇，《有關「官逼民反」》。

本文敘寫的是梁山好漢的集結、力量的壯大和最後失敗、毀滅的全過程。後人的評論往往將好漢們落草的原因歸結為「官逼民反」，片面地突出了他們憤世嫉俗、同情弱小乃至為民請命的主觀意識；而在理解梁山好漢為什麼會最終走上「受招安」這一歸宿時，又很少從梁山好漢的構成成分和自身原因出發，導致了分析得不全面。

8. 胥惠民著：《論「水滸傳義氣」文化的意義》<sup>22</sup>：

本文說明《水滸傳》是對「義氣」文化最好的詮釋。小說生動地表現了「替天行道」是「義」的根據，「濟困扶危」、「仗義疏財」是我們民族「義氣」的基本內容，發現並尊重人才是「義」的最高表現形式，而且「義」還是團結人教育的力量。

9. 劉鵬宇著：《論「水滸傳」中宋江的人物形象》<sup>23</sup>：

本文主要是在說明藝術成就主要表現在人物的塑造上，典型的人物如林冲、武松、宋江等，並通過概括宋江的生平、思想和性格特点分析宋江的人物形象。

10. 李金松著：《金批「水滸傳」的批評方法研究》<sup>24</sup>：

本文指出金聖嘆在評點《水滸傳》中，主要採用了四種批評方法：分解批評、擬史批評、意象批評和比較批評，討論了這些批評方法在金聖嘆解釋、分析《水滸傳》中藝術事實時的重要作用及其得失，闡明了這些批評方法在中國小說批評史以及文學批評史中的重要意義。

---

<sup>22</sup> 胥惠民：《論「水滸傳義氣」文化的意義》，山東，荷澤學院學報，第 28 卷第 3 期，2006 年 6 月。

<sup>23</sup> 劉鵬宇著：《論「水滸傳」中宋江的人物形象》，北京，北方文學雜誌網，2016 年 11 月。  
<http://www.bfwx.org/a/wenxue/lilun/2016/1128/5626.html>

<sup>24</sup> 李金松著：《金批「水滸傳」的批評方法研究》，北京，漢學研究中心，漢學研究第 20 卷第 2 期，2002 年 12 月。

## 第二章 梁山泊的社會基礎及政治意義

無論在任何一個時代，一部好的文學作品，都可以從中發掘當時的社會型態、經濟及官場文化，《水滸傳》以其傑出的藝術描寫手法，全面展現出一場農民起義從發生、發展直至結束的整個過程，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腐朽以及統治階級的罪惡本質，又如同一幅悠長的歷史畫卷，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研究價值。本章試圖從宋代的社會基礎，探討出梁山泊高舉替天行道之政治意義。

### 第一節 打著「替天行道」的流氓集團

《水滸傳》是一部龐大而複雜的小說。不論其表達的思想或版本問題都相當值得探討。就水滸傳的情節而言，前七十回以宋江、晁蓋為首，逐漸吸納四方豪傑上梁山。在這些好漢之中，有自願上山者；有被貪官汙吏逼上梁山者；也有受到感召而上山者。不論如何，這些人聚集梁山的目的是替天行道，反抗腐敗的政治。直到一百零八條好漢齊聚忠義堂，排座次。這一階段中，梁山英雄們大塊吃肉，大碗喝酒，殺得貪官汙吏心驚膽戰，令人大呼痛快，有借此發洩對政治現實不滿的意味。

歷史學家薩孟武在《水滸傳與中國社會》一書中寫到：

這群梁山英雄所代表的是什麼？不消說，它的構成分子，以流氓為主，最初投到梁山泊的是晁蓋等七人，晁蓋雖是山東濟州鄆城縣的富戶，但他不喜歡結交文人，「專愛結識天下好漢」（第十三回），其下有吳用為不第秀才，公孫勝為雲遊道人，劉唐飄泊江湖，沒有一定職業，三阮打漁為生，並做私商勾當，白勝則為閑漢。梁山泊的好漢大多出身於流氓，沒有正當的職業，或在山林「剪徑」，或在湖裡「揩油」，我們雖然佩服他們的義氣，而對於他們「迫上梁山」的環境，也該與以相當的同情，但不宜因佩服與同情，而諱言他們的出身。<sup>25</sup>

<sup>25</sup> 薩孟武著：《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1967年版，第6頁。

在梁山水泊團體中，有曾經的貴族和官員，也有農民和樑上君子，但他們卻互相稱兄道弟，相互以義待人，在正常的社會中是不應該出現的，能夠這樣地組成團體，說明他們有很大的共同特點，就是一身土匪氣習，一個人如果有這樣的氣質，當然是不容於任何時代和社會的。因此，作者是以鞏固封建制度和皇權為寫作目的，通篇鼓吹封建思想，教人忠於朝廷和國家，正如梁山好漢一樣，即使死，也必須歸順朝廷，即使朝廷是昏暗的。所以，替哪個天，行哪個道都不明確，也就沒有可維護的正義，也就不能說他們是站在正義一邊了。

## 一、宋代之社會基礎

在探討梁山泊前，先要瞭解宋代的社會基礎，才能瞭解梁山英雄的故事原因。施耐庵在話本《大宋宣和遺事》<sup>26</sup>等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基礎上，創作了《水滸傳》。因此，其中的記述在相當程度上是符合宋代社會生活原貌的。書中說到宋江受招安，招安就是宋朝平定農民起義的一項重要的、常用的政策。薩孟武先生從社會政治角度解讀認為：

中國歷史強權階級的出身，無非兩種人，一是豪族與流氓，前者如楊堅、李世民等；後者如劉邦、朱元璋等，梁山好漢無疑是屬於後者。流氓階級的經濟基礎，決定了流氓階級的倫理觀念，只能是義，而決非紳士階級的忠孝。此蓋豪族有所憑藉，便於取得權力，流氓無所顧忌，勇於冒險。<sup>27</sup>

就上述觀點而言，引發社會動盪的是兩個集團，一是豪強，二是流氓。豪強主要憑藉政治權力，利用農民的貧苦，大肆兼併土地，成為純粹的食利者。通過佔有土地而征斂的資源，不會用於擴大生產，而只是用於奢侈消費，對經濟發展毫無益處。豪強還可以通過與政權的聯繫，避免交納稅賦，這部分擔子就又落在已經極度貧苦的農民身上，直到把穩定的社會基礎完全壓垮。一旦天下大亂，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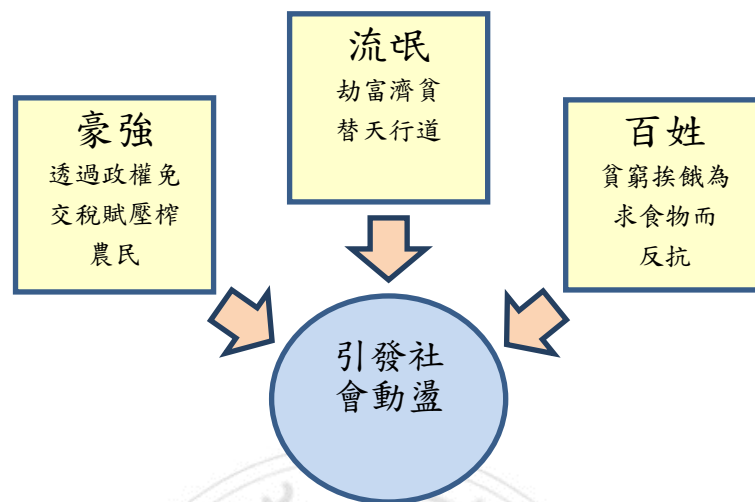
---

<sup>26</sup> 《大宋宣和遺事》，簡稱《宣和遺事》，是知名的話本，是成書於南宋的筆記小說輯錄，結合了多個類型的筆記小說並以說書的方式連貫而成，作者不詳。該書大概由講述歷代帝王荒淫誤國開始，一直寫到宋高宗定都臨安為止，加插了宋代奸臣把持朝政致使生靈塗炭的故事，也為寫梁山英雄聚義做了對照。因此成為《水滸傳》的藍本。<https://zh.wikipedia.org/zh-tw/>

<sup>27</sup> 薩孟武著：《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1967年版，第1頁。

強便紛紛起事，逐鹿中原。

圖 2 北宋時期引發社會動盪示意圖



※閻宇隆繪圖

中國自古以農立國，土地是唯一的生產工具，也是唯一的權力基礎。中國古代的遺產繼承制，以諸子均分為主，縱然是大農，一傳再傳之後，土地亦必細分，由大農變為小農，土地的生產已經不能維持一家的生活，而租稅又以田賦為主，農民受了苛稅的壓迫，結果便如晁錯所言：「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亡日休息……勤苦如此，倘復被水旱之災…賦斂不時…當具有者半價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sup>28</sup>。

由於宋代的糧食政策弊病，使得農民負擔過重、政府糧政弊病叢生的情況下，宋代的國家糧食安全始終沒有得到最根本的解決。中國農業技術的幼稚已妨害生產力的發達，而過小地的耕種又令技術不容易改良。

其結果，農民當然沒有貯蓄，而致再生產只能在同一規模上，不斷地反復著。然而地力是有限的，收穫是遞減的，年年在同一的土地，作同一的耕種，收穫何能不年年減少。<sup>29</sup>

<sup>28</sup> 薩孟武著：《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1967年版，第6頁。

<sup>29</sup> 薩孟武著：《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1967年版，第4頁。

這說明宋代農村社會的普遍貧窮原因。另因黎民百姓普遍化貧窮，造就了中國社會動亂的發生。

因貧窮而作亂的，多由流氓發動。他們沒有身家性命，而生活又不安定，生的快樂既未嘗過，死的苦痛也不恐怖。他們最肯冒險，由九死一生之中，突然地置身於雲霄之上。他們個人雖然沒有勢力，而成群結隊之後，就可以橫行江湖。紳士怕他們搗亂，農民怕他們魚肉，他們在中國社會上，乃是化外之民，隱然成為一個勢力<sup>30</sup>。

這股勢力就如歷史學者薩孟武從社會政治角度解讀名著《水滸傳》中梁山泊的社會基礎，這部分人是由遊民為主體形成的，他們不事生產，首先是因為失去了一切生產的條件，只能靠劫掠為生。這些人會變成流氓，做大了就占山落草，對抗官府。從「流氓」的行為方式衍生出「劫富濟貧」、「替天行道」等價值觀念。

中國歷代開國皇帝中有許多人都是不安分守己的市井流氓出身。

流氓在中國歷史上曾演過重要的角色。他們常常變為流寇，先向最沒有抵抗力的農民肆行劫掠，而使疲敝不堪的農村，連餘喘也不能保。農村破壞之後，政府因田賦的減少，財政也日益窮匱，不能不用苛捐雜稅來刮索人民，然而一切刮索最後都轉嫁在農民身上。<sup>31</sup>

其結果，不但不能挽救國家財政的窮匱，並且還使農村愈益破產，於是政府成為怨府，而朝代隨之衰亡。

中國的流氓又與現代的勞動階級不同，現代的勞動階級在許多國家雖然過著窮苦的生活，但是他們乃是生產要素之一，只要他們停止工作，社會的經濟就發生恐慌。中國的流氓不曾勞動，也不想勞動，社會並不依靠他們而存在，他們卻要依靠社會討生活。他們完全是一種過剩人口，縱令他們全部滅亡，也不妨害社會的存在，反而他們的滅亡卻可使社會的秩序因之

---

<sup>30</sup> 薩孟武著：《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1967年版，第5頁。

<sup>31</sup> 薩孟武著：《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1967年版，第5頁。

安定。他們的地位既然如此，何以他們竟有勢力？<sup>32</sup>

從《水滸傳》梁山泊故事中可瞭解到其根由。

封建社會農民起義動員、組織群眾的力量就是口號。「替天行道」是水滸梁山的一面鮮明的旗幟，是他們的一種精神追求、價值取向和基本信仰。因為這面鮮明的旗幟，眾多江湖好漢才紛紛聚義梁山泊，以實現自己的「社會價值」。而「有福同享，有苦同受」，是梁山英雄們的口號，「大秤分魚肉，小秤分珠寶」，是他們的生活。

由這口號與生活觀察，可知梁山泊集團只是幫會，而非政黨。幫會依義氣而結合，政黨依主義而團結。在幫會，既已加入，就不許中途脫離；中途脫離，視為不義之事。在政黨，政見相同，是我的同志；政見改變，又變成我的敵人。改變之人道德上毫無過惡，視之為敵之人，道德上也無反于友誼。幫會只能橫行江湖，依「有福同享，有苦同受」的觀念，互相合作，縱有小愆，亦不能奪其「福」，而加以「苦」。反之，政治所需要者乃是刑賞<sup>33</sup>。

《水滸傳》中英雄好漢為什麼把上梁山聚義看成他們的最高幸福？因為幫派的所在就是他們的利益所在。梁山水泊好漢們的生活既然不依靠他們自己的生產，薩孟武認為：

「仗義疏財」及「劫富濟貧」遂成為他們的最高道德。即他們並不想改變生產形式，只想劫掠富人的貨財，把各種消費品另行分配。這種「劫富濟貧」的觀念，不但流氓階級視為最高道德，就是普通人民也視為合於天理<sup>34</sup>。

古代財富的集中則由豪強利用高利貸的方法，尤其是政治手段，來剝削一般農民。這個方法是減低而不是提高生產力的。尤其北宋的國勢並不強盛，它北方又有一大片國土淪落在異族的手中，朝廷內又有奸臣弄權，小人當道。社會上貪

<sup>32</sup> 薩孟武著：《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1967年版，第3頁。

<sup>33</sup> 薩孟武著：《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1967年版，第6頁。

<sup>34</sup> 薩孟武著：《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1967年版，第8頁。



官汙吏和仗勢欺人的土豪劣紳，更往往對平民百姓造成了直接的痛苦。對於掙紮在生死邊緣的人民來說，生存、溫飽是他們最迫切的需求，他們對於物質上的追求永遠是第一位的。

這些貧窮痛苦的人幾乎沒有人幫他們，他們要繼續生活下去，所以他們就變成了四處遊蕩、到處覓求生存機會的遊民。遊民群體儘管有很多缺點，但這是因為社會結構中的不合理造成的，不能由誰來擔承。遊民脫離了他的宗法組織之後就要走入城鎮，通過自己奮鬥，以博衣食。這樣他必須改變自己原有的性格，從而形成自己的性格，否則就會被淘汰。反之，古代富人沒有這個必要。他們利潤的來源非在於技術的改良，而在於過度的刮索。他們刮索所得的金錢均供為個人享樂之用，所以財富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上，並不是生產力的發展，而只是消費品的集積。古人以仗義疏財為最高道德，用此以結交朋友，用此以增加權力，其原因實在於此。

《水滸傳》裡的英雄人物赤裸裸對物質財富的嚮往與追求，在主流社會裡是不被認同的，但對一般民眾來說是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水滸傳》作者用「義氣」、「結義」、「聚義」等名號，將人民道德把它包裹起來，不直接描寫對金錢財富的嚮往，好像實現「義」和「聚義」才是梁山好漢們最強烈的訴求。

《水滸傳》故事所以能夠廣為流傳是因為當時的百姓確實受到政府相當大的壓迫，官逼民反。所以他們才會希望有豪傑之士出來為他們伸張正義。所以說梁山泊好漢身上，每一個都投射了一般百姓希望戰勝惡勢力的心理。他們替人們說了許多人們不敢說的話，他們也為人們做了許多不敢做的事。這其中是有他們的理想性還有積極意義的。梁山泊好漢他們所期望的，也就是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一個美好的明天。

## 二、替天行道之政治意義

「替天行道」係出於《道德經》。它的原文為：「天之道，其猶張弓歟！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損不足以奉有餘！」

<sup>35</sup>(道德經第七十七章)

用這句話來概括說明一切階級社會中剝削階級對被剝削階級的殘酷壓榨，真是一針見血，恰到好處。水滸英雄所堅決反對的，正是這種「損不足以奉有餘」的「人之道」他們要替天行道，就是要實行「損有餘以補不足」的「天之道」。不論古今中外，從感情上說，窮人們都會反對這種損害窮人的「人之道」，而希望推行有利於窮人的「天之道」。「替天行道」就是一個短而有力的政治口號，政治口號、政治旗幟等一群觀念又可以把它們通通歸類到政治符號裡來。這些符號雖然簡單易懂，其實背後代表著一整套完整又自成邏輯的觀念，為了求簡短有力、易於瞭解、方便凝聚認同、有益於激起群眾「想像中的共同體」的熱情，而刻意被簡化，但是其背後代表的意義，並沒有被弱化掉。

《水滸傳》中的「替天行道」用的是同樣的觀念，在替天行道口號之前不平等早已存在，欺壓已經很嚴重，不公不義的事情已經司空見慣，不過何以一立起杏黃旗就揭竿而起，勢如破竹，不過就是英雄們把立方體換一個面，讓老百姓清清楚楚的看到了，以前被隱藏的真相，就是如此而已。宋江自始就是有心為國效勞，晁蓋死後他繼為梁山領袖，就進行改革，把聚義廳改名忠義堂，開始教導弟兄盡忠報國。並藉由上天顯應降下石碣，昭示了天命，要大家「替天行道、忠義雙全」，除了在忠義堂上掛起堂名的牌額，還在山頂豎一面杏黃旗，上書「替天行道」四大字，堂前柱上又立兩個硃紅牌，金字寫著「常懷貞烈常忠義，不愛資財不擾民」<sup>36</sup>(水滸傳第七一回)。

「替天行道」這個天道觀念不但涵義複雜，而且性近玄學，薩孟武先生研究政治上的天道觀念，藉以說明梁山泊終是草寇集團，沒有得到天下的希望<sup>37</sup>。

中國古代社會自周代以來都是宗法社會，人們通過血緣關係的遠近組成了宗法共同體，這些靠自然血緣關係形成的組織一直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基礎，而且它還與社會組織形式同構。薩孟武指出：

<sup>35</sup> (春秋)老子著：司馬志編著：《老子道德經》，臺北，華志文化出版，2013年版，240頁。

<sup>36</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年版，第938頁。

<sup>37</sup> 薩孟武著：《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1967年版，第12頁。

在中國古代原始社會都是血統團體，而以氏族為基礎，到了血統團體進化為地域國家之時，血統關係尚未完全脫掉。這個時代，最大的氏族可以統治別的氏族，而其族長則上升為國家的元首。例如黃帝，他是有熊氏的族長，而有熊氏又是當時最強的氏族，所以黃帝同時又為中國的元首。氏族乃集合許多家族而成，在家族之內，家長須慈愛其子弟，同樣，由氏族演進為國家之時，元首也須慈愛其臣民。家長要管束其子弟，必須立身以正，足為子弟的模範。子弟服從，一家就可統一，而有相當的威力，而能壓服氏族。氏族既已壓服，又可利用氏族的威力，征服別的氏族，而組織國家。

38

從周代以來的兩千多年中，宗法社會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秦以前的宗法 是家國同構，周人的宗子（家族領袖）也是天下之共主；秦代以後到隋唐，也是一種宗法，這種宗法跟周代有所不同，其特徵是與領主大莊園統治相結合。宋代以後至近代又是一種宗法，這是宗法家族制度，族長不一定就是宗子（長房長子），而是推舉的，這與秦朝以前和兩漢隋唐也有差別，但其以血緣為紐帶的基本特徵沒有變。

宗法制度除其以血緣為紐帶的特徵外，還有就是由宗法原則組成的共同體對於其統轄的宗法人是既控制又保護的。

這種思想雖然發生於血緣團體之內，但是血緣團體變成地域國家之後，中國人仍用這個觀念來解釋國家。就是他們仍把國家視為家族的擴大，仍把政治看做家政的擴大，君主為臣民的父母，臣民為君主的赤子，君主與臣民的關係無異於家長與子弟的關係，家長須慈愛其子弟，君主亦須慈愛其臣民，所謂「仁政」就是由此而產生，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是由此而產生的。<sup>39</sup>

在中國，士大夫的社會理想偏重於政治倫理，農民的社會理想偏重於經濟倫理，但對於只講利益，不講是非梁山好漢來說，最基本的問題是生存，他們要在

---

<sup>38</sup> 薩孟武著：《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1967年版，第12頁。

<sup>39</sup> 薩孟武著：《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1967年版，第13頁。

社會裡爭取屬於自己的利益。對於那些不屬於自己的利益，就要跟與自己相似命運的人結合起來，因為群體才有力量。他們的結合方式通常就是仿照宗法制度結成義兄義弟，複雜些的就是明清兩代產生的幫會。你看《水滸傳》中這一點就非常明顯，同樣是打劫，水泊梁山做的就是對的，那些不屬於梁山系統的強盜做的就不對。因為他們把上梁山聚義看成他們的最大幸福，因為幫派的所在就是他們的利益所在。為什麼幫會把利益看的那麼重呢？因為他們是被主流社會拋棄的一群，他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在肚子都不能填飽的情況下人們不可能捨棄利益而不談。

而在皇權社會中，大部分階層是比較穩定的，唯有兩個階層不太穩定，一是最高的皇權階層，一是最底的遊民階層。

在中國歷史上，君主因受百姓反抗，而致失去天下的不知多少，匹夫因受百姓歡迎而能得到天下的又不知多少，所以聰明的人常能體天之意，施惠於民。<sup>40</sup>

所以，士大夫及農民是最有勢力的階層。

中國本來是個農業國，又是個官僚國，而中國所以成為官僚國，又由於農業國的生產條件而來。中國經濟乃是閉鎖的自然的農業經濟，這種農業經濟最容易產生割據的封建制度。但是中國農業的生產條件又不許割據局面的存在。因為中國農業的基礎是築在水利經濟之上，這個水利經濟只有集合各地，共同協力，而後才能成功。如果各地割據，只能在河流的一部分，建築堅固的堤防，而不顧到全流域，那末在上流或下流還是要潰決的。水利的獨佔亦可破壞中國的農業。由於這個必要，遂成立了中央集權的國家。中央集權的國家要預防割據局面的復興，不能不打倒土地貴族；既然打倒了土地貴族，自然不能不利用士大夫階級，以組織官僚國家。這樣，士大夫階級就代替了土地貴族，而取得統治權。因為中國是官僚國，所以士人有很大的勢力；因為中國是農業國，所以農民也有很大的勢力，誰能

---

<sup>40</sup> 薩孟武著：《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1967年版，第6頁。

夠得到士農的歡迎，誰便為天子。<sup>41</sup>

作為士大夫文化的理想社會，其建構顯然偏重於政治倫理，主要表現為個性的自由、經濟的平等、政治的清明等。

士人就是知識階級，他們利用知識，以維持自己的生活，又利用知識，以取得社會的及政治的勢力。若就普通的情形來說，士人都想做官。然在當時，士人階級的人數尚少，他們做官容易。到了戰國時代，士人階級已覺過剩，由是就發生了生存競爭，而令士人注意到「仕」的問題。士人的生活既然依靠於仕，所以聖主賢君要得到士人的歡迎，必須大開仕路，使人人可用自己的才智，得到相當的地位。<sup>42</sup>

農民的生活怎樣？他們耕田，他們固然希望政府「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如其不能，也希望政府不來過度剝削。<sup>43</sup>

作為大眾文化主體的農民意識，他們的理想社會更偏重於經濟倫理，主要表現為財產公有和等級的廢除。由於地主階級殘酷的經濟剝削、政治壓迫和文化壟斷，農民理想的表達只能借助於具有猛烈沖決力的暴力行為，才会有水泊梁山這一塊光明的理想天地。在這裏，不存在以等級特權為標誌的貴賤貧富的差異，大家互為兄弟；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大秤分金，小秤分銀，生活資料免費供給，不存在財產私有和分配不均；以任何手段和途徑佔有的私人財產都抹去了原有印記，重新貼上了軍事共產的標籤，財產公有，共同消費，已成為最基本的經濟生活和道德生活原則。

梁山泊雖然標榜「替天行道」，但是他們的行為卻又常常與天道背馳。他們在江州劫法場的時候，「不問軍官百姓，殺得屍橫遍地，血流成渠」（第三十九回）。這種舉動已使百姓害怕，而起事數年，除流氓降將之外，又未曾用過一個士人，至對付近鄰的農村，更不得其法，卒致祝、扈、李三

---

<sup>41</sup> 薩孟武著：《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1967年版，第6頁。

<sup>42</sup> 薩孟武著：《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1967年版，第17頁。

<sup>43</sup> 薩孟武著：《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1967年版，第18頁。

莊因怕梁山泊過來借糧，準備抵抗（第四十六回）。試問這樣行動何能收攬民心？「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惡是懷」。梁山泊不能「施惠於民，當然民不懷德，民不懷德，當然皇天不祐」。這是梁山泊失敗的原因。<sup>44</sup>

不過，《水滸傳》中的「替天行道」又有人討論有何內涵和外延？「替天行道」經歷了由民間願望到文人理想的過程，其所替之天由「天道」演變為「天命」，其內涵也由「俠義」演變為「忠義」。水滸好漢之「替天行道」無論是俠義還是忠義，它首先承認君權的存在，由此派生出的道就是君臣之義，替天行道就是替君行道，客觀上維護著這一君權的存在。因而《水滸傳》中的替天行道，在政治上，既包括除暴安民、打抱不平，又包括護國安民，為朝廷效力；在經濟上，便是均貧富，因為「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雖然梁山泊正如眾多的論者所指出的，劫富濟貧在實際行動上並不多；但並不是沒有，如宋公明三打祝家莊之後，「所有各家，賜糧米一石<sup>45</sup>」（水滸傳第五十回）；打破北京大名府時，「又開倉放糧，將糧米俵濟滿城百姓<sup>46</sup>」（第六十七回）等。

也有人認為「替天行道」是來自儒家的仁義之道，忠義之德。但《水滸傳》中提到當九天玄女娘娘傳授三卷天書時對宋江說：「宋星主，傳汝三卷天書，汝可替天行道為……<sup>47</sup>」（水滸傳第四十二回）。從此，「替天行道」就成了梁山英雄的宗旨。駱玉明先生於《水滸傳故事選》一書中說明：

既然「替天行道」最初來自九天玄女，那這裡所指的「道」究竟是什麼呢？是來源於哪家的道呢？可謂眾說不一，莫衷一是。有的說是來源於道教，因為九天玄女就是道教中的神。但是，道教領袖老子所說的「道」是說它

---

<sup>44</sup> 薩孟武著：《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1967年版，第21頁。

<sup>45</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年版，第518頁。

<sup>46</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年版，第670頁。

<sup>47</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年版，第433頁。

是宇宙的精神本源。而且老子對儒家的「仁義」還持否定態度，總之，老子所說的「道」是一個哲學概念，儘管「替天行道」一詞來自玄女娘娘，但不能說宋江行的就是道家之「道」。相反，「替天行道」中的「道」與儒家的「道」卻有幾分相通之處。因為《水滸傳》中許多故事都是進行道德譴責和歌頌，其譴責和歌頌的標準都以孔孟學說的道德為準繩，像書中譴責高俅的為富不仁和潘金蓮、閻婆惜的不守婦道，歌頌梁山英雄見義勇為、打抱不平的壯舉等等，這些都與儒家的道德規範極為吻合，所以說「水滸傳」中「替天行道」應是儒家的仁義之道，忠義之德<sup>48</sup>。

尤其在政治昏亂的時代，官府的剝削壓榨過分嚴重，貪官汙吏、地方豪紳橫行不法，致使民不聊生，老百姓倒是希望有英雄豪傑之士起來造反，為他們伸張正義，至少也出一口惡氣。

《水滸傳》的特點，就是對封建專制社會中的黑暗面，進行了尖銳的揭露，也肯定了民眾反抗的正義性。梁山泊上的一面杏黃大旗，寫著「替天行道」四個大字。在正統的觀念裡，「天」是專門佑護朝廷，「道」也是統治者專有的，梁山上的人們，不過是一群「強盜」。但在「水滸傳」作著看來，朝廷中既然充斥著姦邪，使人民難以生存下去，便已是「違天逆道」，因而民間的反抗者，才真正代表了正義<sup>49</sup>。

「替天行道」的口號既是封建社會農民起義作為動員、組織群眾的口號。余大平先生在《解讀水滸傳》序中指出：

要領導那些長年累月扛鋤頭、勤扒苦作、和土地打交道的莊稼人造反，要和官府抗爭，先得具備兩個最起碼的條件：一是要有武功、有本領，能夠使槍弄棒、騎馬射箭；二是要有能夠將散落各地的英雄豪傑聚集在一起的號召力，使這些人形成一股勢力，形成浩浩蕩蕩的武裝集團。要符合這兩

<sup>48</sup> 駱玉明著：《水滸傳故事選》，新北，名田文化發行，2004年4月版，第10頁。

<sup>49</sup> 駱玉明著：《水滸傳故事選》，新北，名田文化發行，2004年4月版，第10頁。

個條件，於是就產生了「江湖好漢」這個特殊的社會階層<sup>50</sup>。

「替天行道」就是水滸梁山好漢這階層的一面鮮明旗幟，也是他們的一種精神追求、價值取向和基本信仰，屬於典型的文化建設的範疇。因為這面鮮明的旗幟，眾多江湖好漢才紛紛聚義梁山泊，以實現自己的「社會價值」。

但于學彬在《水滸傳講義》一書中認為：

換個角度來說，梁山泊之「替天行道」也是一種權謀、投機。天子與奸臣旦一體兩面，沆瀣一氣，奸臣若非天子的縱容，怎能為非作歹？梁山好漢只反奸臣，不反天子，是鴛鴦作風，既無法替天行道，更無法貫徹正義。因為那個「君臣綜合體」是個結構完整的異形，善惡一體，無法分割<sup>51</sup>。

作為梁山泊領袖的宋江，只反奸臣不反天子，其結果是陷於自設的陷阱中，只好在自己揭櫫的忠義大旗下接受招安，淪為打手，替皇帝打別的強盜。

令人不解地是，這些牛鬼蛇神、英雄好漢就是因不願接受體制規範，才投入梁山泊水寨為寇。為什麼一旦投入這規範性並不亞於朝廷的小集體，就心悅誠服的接受體制規範。在這標榜「替天行道」的梁山組織裡，替天行道四字首先把他們的行為道德合理化，而他們本身又是行為規劃的參與者與施行者。因此，當個人的生命安全得到維護，就喪失警惕性，不自覺的交出了自身尊嚴與權利。

不過，通觀宋明以前的中國政治史和法律史，我們就能夠發現，如果真是「替天行道」的話，那麼「施惠於民」或「救民水火」或「弔民伐罪」則是內在要求。但是，細繹水滸故事的敘述，我們絲毫未能看出梁山好漢有過什麼稱得上「施惠於民」或「救民水火」或「弔民伐罪」的事蹟。在梁山泊大聚義前，雖然也有個別好漢（諸如武松和魯達）「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義故事，然而更多的是「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的犯罪劣跡。在梁山泊大聚義後，也未見有「施惠於民」或「救民水火」或「弔民伐罪」的正義舉動，轟轟烈烈的征討東平府和東昌府的

---

<sup>50</sup> 余大平著：《解讀水滸傳》，臺北，雲龍出版社發行，1999年版，第1頁。

<sup>51</sup> 于學彬著：《水滸傳講義》，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8月版，第39頁。



故事，只是殺戮無辜民眾的血腥暴行。

總而言之，水滸一書旨在說明，生逢亂世，到底那裡才能找到一處安身立命之處。吊詭的是，被招安回歸朝廷體制內，才是梁山好漢安身立命之處。「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本是個人道德正義的制高，那麼當個人或小團體正義與法律正義衝突時，該如何抉擇？尤其是與奸人(童貫、高俅、蔡京)當朝，被閹割的法律正義時，其內心之痛苦煎熬自能理解，而一百零八條好漢面臨的情況正是如此。拒絕招安，卻要一生身負惡名成邊緣人，上汙祖先父母，下斷子孫道路；接受招安則如同貪汙犯的洗錢，變成一個乾淨人，但也同時否定了過去的一切。梁山泊被招安後的代價極慘，被朝廷當工具使，掛帥攻遼、伐王慶、打方臘，滅田虎，亡損十之七八，實際接受封賞的只 27 人，且隨即被鳩殺或自裁殆盡，他們實際得到的是個虛名。替天行道了一輩子，結果是奸人仍當道，這樣的天還有道嗎!?

## 第二節 宋代時期的經濟生活

宋朝社會經濟的發展是充滿了活力的。自唐朝中葉安史之亂以來，中原淪為戰場，藩鎮交兵不息，入宋之後，北、西兩邊與敵為鄰，是重兵屯駐之地，而非經濟文話滋育之所；至於江南，荊襄吳越一帶，兵革既少，又屢興水利工程，物產豐饒，生產力發達，等到南宋偏安江南，南方已經成為中國經濟與文化中心。在農業、工業商業方面的建設，都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準，其經濟生活的高度發展，和同時代的西方社會相比較，可以說超過甚多。所以宋代的經濟建設是極為可觀的。

### 一、農民的生活

宋代的農民是一些什麼樣的生活呢?時人王柏作如是觀：

今之農與古之農異。秋成之時，百逋叢身，解償之餘，儲積無幾，往往負

販傭工以謀朝夕之贏者，比比皆是也<sup>52</sup>。

說宋代的農民與過去的農民完全不一樣當然是不對的。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中，個體小農從來就不是純粹的糧食生產者，男耕女織，農業和家庭紡織業緊密結合在一起，是傳統小農的基本經濟構成。這在宋代並無根本性的質變。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宋代農民的生產形式和經濟構成畢竟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在主要致力於糧食和衣類生產的同時，兼做小手工業者、小商販、小雇工，已經不是個別的、偶發的特例，而是形成了普遍的、持續的發展勢頭。諸如「耕織之民，以力不足，或入於工商」<sup>53</sup>之類的記載，可以屢見不鮮。表明現實生活中，從事兼業的農民越來越多了，農民的經濟構成變得豐富、混合、多元化了，明顯地出現了一個小農、小工、小商三位一體化趨勢。王柏敏銳地體察到了這種跡象，所謂「今之農與古之農異」，就是對這一變化的精闢概括。

「農民」一詞只是一個籠統的概念，作為一個社會群體，其內部情況極為複雜。呂祖謙先生在《宋文鑒》一書中說明：

宋代鄉村五等主戶中的下三等戶，分別隸屬於富裕農民、自耕農和半自耕農。五等主戶之外者，則是稱作客戶的佃農。各個等級的農民，由於所處條件和地位的差異，其生產形式和經濟構成是不盡一樣的。宋孝宗淳熙七年，朱熹在南康軍任上為了摸清所轄都昌、建昌二縣缺糧戶的情況，曾設計了一份調查提綱，其中把鄉村「下戶合要糴米者幾家」區分為如下三類：

- (一)作田幾家，各開戶名，大人幾口，小人幾口，別經營甚業次。
- (二)不作田幾家，各開戶名，大人幾口，小人幾口。經營甚業次。
- (三)作他人田幾家，各開戶名，系作某人家田，大人幾口，小人幾口，兼經營甚業次<sup>5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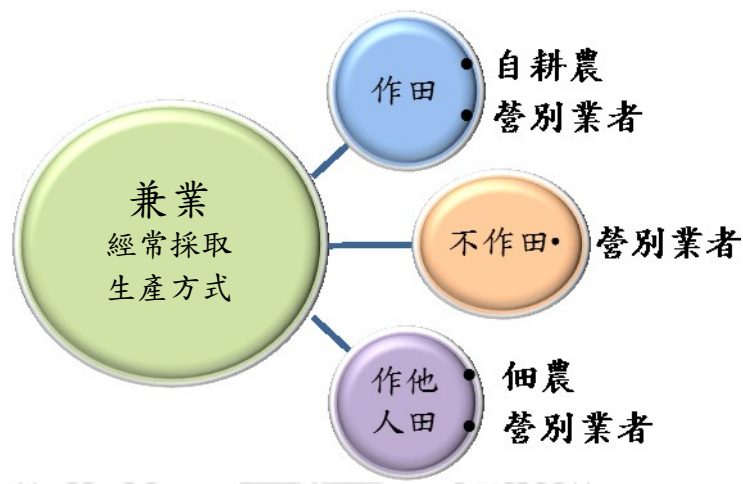
<sup>52</sup> (元)許衡著：《魯齋集》卷7《社倉利害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36年12月版。

<sup>53</sup> (宋)呂祖謙著：《宋文鑒(下)》卷125高弁：《望歲》，中國吉林，吉林出版社，2005年元月版。

<sup>54</sup> (宋)朱熹著：《晦庵集》卷6《取會管下都分富家及缺食之家》，第68頁。

其中的第一類，顯然屬於自耕農而兼營別業者，第三類則屬於佃農兼營別業者。他們與「不作田」而「經營甚業」的第三類是有區別的。說明無論是自耕農、還是佃農，兼業都是他們經常採取的生產形式。

圖 3 宋代農民經濟構成方式剖析圖



※閻宇隆繪圖

另據呂南公《與張戶曹論處置保甲書》分析：

大量的下層主戶似乎更有兼業的迫切性。「今之居民，客戶多而主戶少。所謂主戶者，又有差等之辨。稅額所占至百十千數千者主戶也，而百錢十錢之所占者亦為主戶，此其力豈同哉？……夫所憂者，非力厚之家也，正在百錢十錢之家耳。目錢十錢之家，名為主戶，而其實則不及客戶。何者？所占之地，非能給其衣食，而所養常倚於營求」<sup>55</sup>。

此話說得有些絕對，事實上「所養常倚於營求」者，何止下層主戶？但他指出的農業收入不足，的確是促使農民兼業的一個重要原因。

宋代農民之兼業，主要從事哪些行當呢？葉適說：當時的農民們，「窮苦憔悴，無地以自業。其駑鈍不才者，且為浮客，為傭力；其懷利強力者，則為商賈，為

<sup>55</sup> (宋)呂南公著：王雲五主持，《灌園集》，臺北，商務出版，1935年，卷14，第78頁。

竊盜」<sup>56</sup>。農民是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進行多方面選擇的。

自給自足的傳統型生產模式，決定了農民自古就必須做一個一身數任、一專多能的勞動能手。家庭紡織業等手工業生產向來就是小農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

吳承明先生指出：

中國自耕農和佃農的小農經濟，雖非封閉經濟，但規模狹小，生產什麼，常是由家庭或家族生活的需要、地主地租的要求、國家征課的要求決定的。但也有部分商品生產，包括農民家庭的商品生產，要受市場支配<sup>57</sup>。

如果說宋代小農兼營的手工業生產與傳統的家庭手工業生產有什麼不同，恐怕就在於隨著生產力水準的提高和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把原先主要用於滿足自身消費和應付地租、賦稅要求的勞動能力和技術，部分地轉變成了為市場交換而進行的小商品生產。

漆俠在《宋代經濟史》一書中說道：

宋代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僅憑農業上的收入難以生存。墾田面積的擴大落後於人口增長，每戶平均土地持續下降，是宋代農業經濟的一個顯著特點。就全國而言，北宋前期的 50 多年間，即從原來每產平均 95·5 畝，下降到 60·5 畝；宋仁宗以後，由於土地兼並者隱田漏賦的嚴重，戶均田畝下降幅度更大。就地區而言，在兩浙、江東、江西、成都府、福建路等經濟發達、人口密集的地區，戶均土地持續下降的趨勢表現得尤為突出。與此同時，土地兼並也日益猖獗起來。大致在北宋中期、北宋末期、南宋全期，先後出現了三次土地兼並的浪潮，而且一次比一次嚴重，土地越來越向少數人手裏集中。如果說全域性的戶均土地下降導致了自耕農、半自耕農的大量存在，那麼土地兼並勢力的膨脹更加劇了土地分配嚴重不均，加快了整個農民階級向下層主戶、以至佃戶淪落的步伐<sup>58</sup>。

人均土地少使下層主戶、佃戶的經濟力量驟減，來自農業的收入愈益不足。

李燾說：

<sup>56</sup> (宋)葉適著：《葉適集(中)》，《水心先心別集》，臺北，中華書局出版，卷 2《民事》，第 56 頁。

<sup>57</sup> 吳承明著：《市場·近代化·經濟史論》，中國雲南大學，雲南出版社發行，1996 年版，第 291—292 頁。

<sup>58</sup> 漆俠著：《宋代經濟史》第一、六、八章，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蜀民歲增，曠土盡辟，下戶才有田三五十畝，或五七畝；而贍一家十數口，一不熟，即轉死溝壑」<sup>59</sup>。

人口的增加已經對有限的土地造成壓力，糧食收入已不能維持農民的基本生活需求，迫使他們尋求新的經濟來源。

農民負擔重，遭受來自官府、地主、高利貸者的層層盤剝。漆俠在《宋代經濟史》一書中認為：

與土地兼並的三次浪潮基本同步的是，宋朝封建國家的賦役剝削也先後出現了三次激增的高潮。農民的賦役負擔，除王安石變法期間稍有減輕之外，其他時間一直不斷加重，北宋末南宋時更是直線上升<sup>60</sup>。朱熹就說：「民間雖復盡力耕種，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納稅賦，須至別作營求，乃可陪貼納官。是以人無固誌，生無定業，不肯盡力農桑」<sup>61</sup>。卷11《庚子應詔封事》。

這又迫使農民加重對高利貸的依賴。至於那些喪失土地淪為佃戶的農民，背負的則是地租和高利貸鑄成的雙重枷鎖。在官稅私債的兩面夾攻之下，農民陷入了「解償之餘，儲積無幾」，「率多窮困」的窘境。

渴望脫貧致富欲望的沖動。人們常把安於現狀、不求進取、狹隘苟且歸於小農意識的範疇，事實上小農也不乏變革創新的熱情。宋代農民之所以能提出「等貴賤，均貧富」這樣響亮的政治口號和經濟主張絕非偶然，應是傳統的均平意識和市場的公平觀念密切結合的產物。在商品經濟的激蕩下，逐利求富的價值觀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沖擊波，騷動著社會各個階層成員，包括農民的精神世界。白居易說：「今之人舍本業趨末作者，非惡本而愛末，蓋去無利而就有利也」<sup>62</sup>。因此，有人認為小農階級只求溫飽沒有發財致富的願望，顯然缺乏根據。從來就不光商賈地主才熱衷於供奉趙西元帥、迎接財神。

土地減少，使農民的農業收入下降；剝削加重，使農民的承受能力減弱；農

<sup>59</sup> (宋)李燾著：《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68 皇祐二年六月，臺北，中華書局，2004年版。

<sup>60</sup> 漆俠著：《宋代經濟史》第一、六、八章，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sup>61</sup> (宋)朱熹著：《晦庵集(四庫全書)》卷6《庚子應詔封事》，第86頁。

<sup>62</sup> (唐)白居易著：《白居易集》卷63《策林二·息遊惰》，臺北，中華書局，2011年版。

民盡管卑微，但多數人並不甘心年復一年地在貧窮的困境中煎熬。怎麼辦？擺在他們面前的出路不外以下幾條：其一，精耕細作，改善耕作技術，力爭單位面積產量有所提高。即向土地要效益。其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因地制宜改善種植結構，大力開展面向市場的經濟作物商品生產。即向市場要效益。其三，挖掘自身的勞動力潛力，在農作之餘從事各種形式的兼業活動。即向自身要效益。這三條道路，農民們是不會只擇其一的，通常的情況是三管齊下。而兼業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宋代商業的快速發展，商品經濟的不斷壯大，深深影響了農村家庭經濟的生產和消費狀況，加深了農村家庭經濟與市場的聯繫。在陳國燦、陳劍鋒合著《南宋兩浙地區農村家庭經濟探析》一文中指出：

南宋時期，隨著農村市場的快速成長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兩浙地區農村家庭經濟出現了新的趨勢和變化。一是家庭生活性消費和生產性消費越來越由傳統的自產自給走向市場供應。其中，在生活性消費方面：除了糧食之外，家居、婚喪、宗教活動也得依賴市場的供給；在生產性消費方面：農村家庭的三方面的需求，主要有工具之類、物種和生產工具之類、勞動力之類也都依靠市場。二是農村家庭生產的專業化生產有所發展，出現了不少農副業的專業戶。主要有糧食生產，經濟作物種植等<sup>63</sup>。

此外，南宋政府在賦徵收過程中的賦稅貨幣化程度不斷提高、採取「折變」的徵收方式等，這些都加強了農村家庭經濟與市場的聯繫。

在唐代劍、甘雲飛合著《宋代鄉村旅店業探析》一書中說明：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人口流動的加大，這也使得宋代鄉民們除了以傳統的耕種業為生外，還從事其他相關的行業，如經營鄉村旅店<sup>64</sup>。

李曉通過剖析宋代農民經濟結構和經營方式的變化，提出了「小農、小工、小商三位一體化」的概念，他認為：

宋代農民在經營農業的同時，普遍以兼業的方式從事手工業小商品生產、

---

<sup>63</sup> 陳國燦、陳劍鋒著：《南宋兩浙地區農村家庭經濟探析》，浙江師範大學，學報，2005年第4期。

<sup>64</sup> 唐代劍、甘雲飛著：《宋代鄉村旅店業探析》。商業經濟，2010年1月。

小商業經營、小雇傭勞動等，使其家庭經濟出現多重複合形式，這一變化的出現，是人多地少的矛盾、官賦私債的催逼、市場機制的導向等共同因素的結果，這也促使著小農經濟更具彈性，韌勁，張力，更加穩固。同時，也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推動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sup>65</sup>。

任仲書先生在《宋代農民負擔問題》一書中說明：

占了宋代鄉村總人口 85% 的農民階級，負擔的徭役名目主要有：田稅、支移和折變、丁口之賦、雜變之賦、和糴和買、夫役。名目繁多，內容雜亂。只是對一般農民收入水準的估算，實際上由於經濟、自然災害、糧食價格等因素的影響，宋代農民的負擔遠遠超出我們的估算，自耕農所承擔的賦稅，占其總收入的 30%—50%，而佃農則高達 50%—70%<sup>66</sup>。

同時，吳賓先生在《宋代農民負擔與中國古代糧食安全研究》一文中還論述了：

宋代開放的糧食政策的弊病也是大大加重了農民的負擔，而不管是正倉、義倉、常平倉還是興起於南宋用於儲量備荒的社倉，時間一長往往出現官府挪用、掠奪式的不等價交換等等現象的發生。最後得出正是在農民負擔過重、政府糧政弊病叢生的情況下，古代中國的國家糧食安全始終沒有得到最根本的解決<sup>67</sup>。

宋代的經濟取得了快速的發展，無論是從同時代整個世界各國的橫向比較，還是同以後朝代的縱向比較，宋代經濟都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即便如此，宋代依然沒有擺脫「普遍貧窮」的前現代社會的特徵。谷更有在《宋代鄉村戶之生活水準析議》一文中著重：「探討了經濟狀況處於中間狀態的第三等級即中戶的生活水準，對其能「自足」經濟生活狀態進行了系統的分析，第三等戶以「十口百畝之家」最為典型」。作者通過文獻材料推斷出：

宋代鄉村戶的基本生活程度：能維持日食 2 升或日進百錢以下的是貧困層；能維持日食 2 升，月用錢 15 緡的是鄉村中的自足層；能維持日食 2 升，日用錢一貫以上的是鄉村戶的小康層或富裕層，而第三等戶的生活水準則在日食 2 升，月用錢 15 貫—30 貫之間，一般都能自給自足<sup>68</sup>。

<sup>65</sup> 李曉著：《論宋代小農、小工、小商三位一體化趨勢》。中國經濟史研究，2004 年第 1 期。

<sup>66</sup> 任仲書著：《宋代農民負擔問題》。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 年 5 月，第 25 卷第 3 期。

<sup>67</sup> 吳賓著：《宋代農民負擔與中國古代糧食安全研究》。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 年 7 月。

<sup>68</sup> 谷更有著：《宋代鄉村戶之生活水準析議》。經濟史叢論(一)繆坤和主編，中國經濟出版社，2005

## 二、社會的經濟基礎

宋代儘管人才輩出，但因外患及「黨爭」之內憂，王朝仍以悲劇收場，但就它的經濟基礎來看，比起以前的時代仍是呈現飛躍進步的的社會。

宋朝經濟上除了一些皇親國戚、富商大賈外，社會已無明顯的階級之分。而在農村，宗族制度成為維繫社會的主因。廿世紀之前，中國的政權只向下延伸到縣衙，其下完全通過「鄉保」與「族長」進行管理。在理學的教化與士人的影響下，官方辦理社會救助；透過理學薰陶，商人階級出資辦理社會救助。救助內容除了辦書院、訂鄉約以激勵品德外，還普遍辦理義莊，以救貧恤孤，資助教育；辦社倉，以備荒歉；辦保甲，以補地方之武裝而保民。這種由士人自發的救助工作，成為自南宋以降中國社會安定的重大因素<sup>69</sup>。

在宋代之前，官方的社會救助活動多屬臨時性質；宋代開始，各州縣普遍設立各種社會救助的永久性機構。族長通過訂立鄉約鄉規來保持社會的秩序。地方紳士通過辦學、救濟事業、修橋鋪路等手段造福鄉裡。

人民的生活水準是一個社會經濟發展水準的最直接反映。其實對貧富而言，其制約因素都應包含社會制度和人自身才智因素兩方面，只是不同制度每個人的致富的機會不同而已。盡管如此，人的致富機會和才智還是成正比的。只不過越是不合理的社會，這種比例系數越小罷了。

普遍貧窮乃以前中國社會的特徵，處在這種情況下的中國人在滿足民眾和國家心目中的需要方面，可以說做得比任何其他的民族都更為成功。這是不少中國史學者對以前中國在世界史上地位的總看法。但這些學者們對宋代卻是稱贊有加，如日本宋史學家宮崎市定認為：「中國文明在開始時期比西亞落後得多，但是以後這種局面逐漸被扭轉，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亞而居於世界最前列<sup>70</sup>。」法國

---

年4月。

<sup>69</sup> 維基百科《宋朝》，社會生活篇，2016年4月版。

<sup>70</sup> 宮崎市定著：《宋代における石炭と鐵》，刊於《東方學》第13輯(1957年)，轉引自李伯重：《「選精」、「集粹」與「宋代江南農業革命」——對傳統經濟史研究方法的檢討》，載《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1期。



著名社會史學家謝和耐先生也稱宋代為當時「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進的國家」<sup>71</sup>。儘管由各種各樣的原因，這些學者對宋代的經濟發展水準的量的判斷都有不同程度的誤差，毫無疑問的是，與同時代世界各國相比，宋朝無論是政治制度還是社會經濟等方面都是居於世界最前端。但儘管如此，它仍然不能擺脫「普遍貧窮」的社會特徵。

現代西方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懷著羨慕的心情來敘述宋代歷史的：

據估計，11至12世紀，水稻產量增加了一倍。生產率提高使人口的相應增長成為可能，而人口的增長反過來又進一步推動了生產<sup>72</sup>。「當時中國宋代的經濟居主導地位，這可以由以下事實看出來：中國的出口品大多是製造品，如絲綢、瓷器、書畫等；而進口品多半是原材料，如香料、礦石和馬匹等。最後應指出，宋朝時代中國人首次大規模從事對外貿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國貿易商。因而宋朝時的中國正朝成為一個海上強國的方向發展<sup>73</sup>。」

宋代的社會是比較開放和具有活力的，這個活力主要來自於，在打破了土族貴族地主占統治地位的莊園農奴制時代那種階級結構、身份結構相對凝滯固定化的格局之後，不僅社會成員客觀上擁有了在封建社會內部各階級階層、各種身份職業之間流動的自由，而且這種自由得到了政府政策上的承認。自由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處於社會基層、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通過兼業而闖出的這條自由之路，對於調整封建社會的內部結構，使之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其意義無論從那個角度講，都比地主、商人、高利貸者的三位一體化要深遠得多，巨大得多。

政治往往是一個時代的經濟的集中反映。宋代的科舉制度是科舉制度進一步完善的朝代。其中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商人中「有奇才異行」者可以參加科舉考試。

---

<sup>71</sup> 謝和耐著：劉東譯，《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的日常生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12月，第4頁。

<sup>72</sup> 斯塔夫裏阿諾斯著：吳象嬰、梁赤民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元月，第438頁。

<sup>73</sup> 斯塔夫裏阿諾斯著：吳象嬰、梁赤民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元月，第439頁。

宋代的商業繁榮導致了商人數量的增加和經商階層的增多，甚至出現了「全民皆商」的景象，反映到了政治制度上，統治階級放寬了對於商人參加科舉考試的限制，反映了商人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提高。從中也可以反映出來兩宋時期商業的發展與繁榮狀況。

宋代社會的商業經濟發展與繁榮可以說是空前絕後。其商業的繁榮有以下幾個表現：首先，城市商業繁榮。城市突破了市坊的界限，「坊制」的突破，集鎮的興起，以及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的產生等。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李昌憲在《從《水滸傳》看宋代社會》一文中說明：

宋代以前，城市實行的是坊市制。城內作為商業交易區的「市」和作為居民住宅區的「坊」，在空間上是分離隔絕的，所有的商業活動隻能局限在「市」裡進行。居住區的每個坊之間也是互相隔離的，圍有圍牆，各有坊門。每日早晚，金鼓之聲響起，坊門和市門都必須定時開啟和關閉。<sup>74</sup>

其次，形成了三級市場網路體系。宋代的商業繁榮不但體現在城市，而且表現在農村市場。在農村市場上，小販、貨郎走街竄巷，活躍了農村市場，豐富了農民的生活，與此同時，宋代還出現了四大商業名鎮。李昌憲又說：

入宋以後，「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絡繹無窮」，封閉性的城市管理模式逐漸不能適應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於是，原先住宅坊區內臨街的民宅陸續開起了店鋪，坊內隔絕的舊格局逐漸被打破，坊牆也被拆除，越來越多的商人在坊內街道兩旁陸續開設了店鋪，過去在時間限制上長期實行的「夜禁」也終於宣佈取消。「日中為市」的慣例一旦突破，為了滿足市場的需要，追逐商業利益，早市、夜市也就應運而生。<sup>75</sup>

再次在貨幣領域裡，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最後，兩宋時期的海外貿易十分發達。到了南宋時期，海外貿易甚至成為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

---

<sup>74</sup> 李昌憲著：從《水滸傳》看宋代社會，中國文化報，第2版，2014年8月。

<sup>75</sup> 李昌憲著：從《水滸傳》看宋代社會，中國文化報，第2版，2014年8月。

### 第三節 宋代時期的倫理觀念

人類的生活方式，決定了人類的倫理觀念。薩孟武說明：

據社會學者所言，澳洲土人不以殺兒為不道德的行為，因為他們過的是遊牧生活。生了一個兒子，未到四五歲，而又生了一個兒子，不但無法養育，而且行動不便，所以只有把後生的殺死。美洲土人對其家中老人，往往置之死地，而不視為悖理的事。因為他們過的也是遊牧生活，而生產力又甚幼稚，一人一天的生產只能維持一人一天的生活。年老的人既然不能隨群奔走，而又無法覓食，所以只有聽其死亡，使他不受現世的苦痛<sup>76</sup>。

忠和義是中國古代社會具有重要意義的道德行為規範和倫理範疇，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建構中的重要精神支柱，同時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核心。從《水滸傳》版本上看，明刻百回本、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回本，都冠以「忠義」二字，即為《忠義水滸傳》，這正表明《水滸傳》所具有的忠義本質，實際上為它所藝術再現的也恰是忠義本質。

忠作為古代社會的道德規範和政治倫理，是要求臣民對皇帝要忠，勿犯上，勿二心。義是規範皇帝統治下的臣民的道德倫理哲學，要求被統治者之間要相互協調，相互和諧。然而忠和義同是封建社會血緣宗親關係的產物，對皇帝之所以要忠，是因為皇帝是全國臣民的「父親」，也就是「君父」，皇帝也同時即是全國臣民的大家長。臣民百姓者之間之所以要義，是因為「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都是皇帝這位大家長的子女，故都應以兄弟相待相親，這就是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因此，倫理觀念隨生活方式而不同，而生活方式又隨階級而不同。就以中國古代最有勢力的兩個階級來討論其倫理及道德價值觀。

#### 一、紳士階級的道德觀

在中國社會上，最有勢力的兩個階級之一的知識紳士。他們是中間階級，幸福的可以上升為紳士，不幸的則當淪落為遊士，他們有特別的氣質，他

---

<sup>76</sup> 薩孟武著：《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1967年版，第9頁。

們中了宋儒的毒，寒酸而不豪爽。他們無法謀生，雖然也想鋌而走險，然而只能攀龍附鳳，做謀臣策士，絕不能獨樹一幟，逐鹿中原<sup>77</sup>。

他們的生活稍稍安定，則心滿意足，毫無進取之心，一部二十四史，由知識階級而做皇帝的，恐無一人，梁山泊白衣秀才王倫的失敗，就是由於他們的寒酸氣。梁山泊彈丸之地，有何寶貝，他拒絕林沖上山，照他之意，「林沖是京師教頭，必然好武藝，倘若被他識破我的手段，他須占強，我如何迎敵<sup>78</sup>」（第十回）。晁蓋等七人上山之時，王倫又說：「非是敝山不納眾位豪傑，奈緣只為糧少房稀，恐日後誤了足下眾位面皮不好，因此不敢相留<sup>79</sup>」（第十九回）。英雄來投，竟然拒絕，只知保全小小地區，過其安樂生活，這種人何能做出大事？

薩孟武提到：

因為，中國古代的紳士生在財主家裡，才能財力和機會參加科舉，才能持續保有權益。所以，自幼有保姆看護，少年有師傅訓導，到了長大，又繼承祖宗的財產，過其安樂的生活。試問他們的生活何以這樣安樂？因為他們有財產。他們的財產從哪裡得來？由於祖宗遺留。他們享受現世安樂的生活，不能不回想到安樂生活的來源，既然回想到安樂生活的來源，當然對於祖宗，感恩感德，自然就發生一種孝順的情緒。所以，紳士以「百善孝為先」，是有理由的。但是祖宗的財產何以不被別人搶去？因為有國家的保護。國家是誰人的國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國家當然是皇帝的國家<sup>80</sup>。

我們現在安樂的生活，由於祖宗的財產，而祖宗的財產所以能夠存在，又由於國家的保護，即由皇帝的保護，則我們為了感恩感德，而須盡孝於祖宗，當然也須感恩感德，而盡忠於皇帝了。所以說，紳士階級的道德是忠孝二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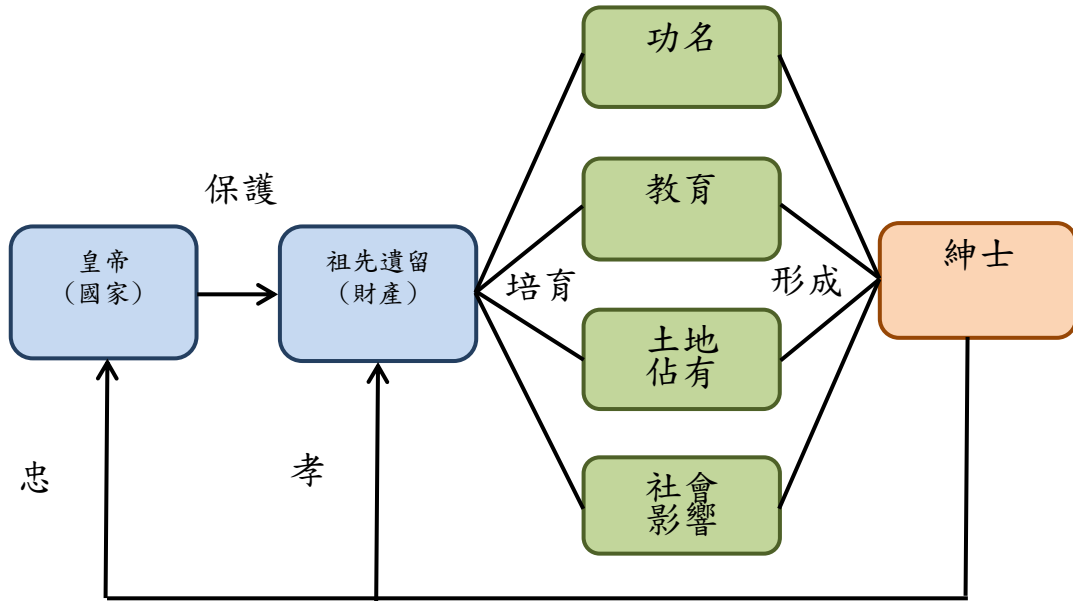
<sup>77</sup> 薩孟武著：《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1967年版，第18頁。

<sup>78</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年版，104頁。

<sup>79</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年版，183頁。

<sup>80</sup> 薩孟武著：《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1967年版，第9頁。

圖 4 紳士階級道德觀形成示意圖



忠孝

※閻宇隆繪圖

紳士階級雖然沒有做皇帝的資格，然而地主或流氓想做皇帝，卻非利用知識階級不可。他們讀過了《論語》，知道治國安民的方法；他們讀過了《左傳》，知道國家興亡的原因；他們讀過了孫吳兵書，知道三韜六略。知識階級常分裂為兩個集團，一是幫助新皇帝而為謀臣策士，一是幫助舊皇帝而為孤臣孽子，這個分裂是由儒家的思想而來的，因為儒家一面鼓吹「忠君」，同時又贊成「放君」，即主張、重道德。這個二重道德對於中國社會，乃有極大的效用。民主政治必以人民有相當的能力為前提，像中國從前人民那樣的幼稚，絕對不能實行民主政治，既然不能實行民主政治，則欲統治龐大複雜的國家，必須樹立絕對王政，而後才能控制各地，而舉中央集權之實。但是君權過大，又可釀成君主的虐政，一方要求鞏固的君權，同時又怕君權的濫用，由是二重道德遂有必要了。即君主的行為不越出一定限度以上，則主張忠君的道德，君主的行為若越出一定限度以上，則主張放君的道德，于庶民之中，再擇一位真命天子，自居于謀臣策士，而從新建設一個新皇室，所以知識階級在政治上是能演新陳代謝的作用的<sup>81</sup>。

然而，「紳士」在標示誰是社會的領導階層時，是以何種特定的標準來認定

<sup>81</sup> 薩孟武著：《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1967年版，第150頁。

「紳士」，諸如是否取得功名、及第的名次，以通過科舉考試為主要的標準，也就是說，是否是紳士是取決於其是否有功名。但是，並非具有地方影響力的紳士都是具備功名的，他們可能也是讀書人，但是未必有功名。如果考慮到某些針對社會實際運作而言，以「社會影響力」來界定「紳士」，亦可為某些特定條件。這樣的研究發展可以發現，紳士的特權與地位，大致而言，可以歸為以下四項：功名、教育、土地佔有、社會影響力基本上，具備這四種或其中數項的，我們都可以稱之為「紳士」。

紳士階層也是建立在社會流動上，其中最具有影響力的就是「功名」。它使得所有的人盡力去考科舉。而因為考試需要書、錢，所以也形成家族、鄉裡支持與獲得功名的紳士本身之間具有連帶的關係。也因為如此，地方的紳士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地方的「民意」代表者。所以地方官、政府人員需要他們的支援與配合。也使得紳士具有一些基本的特權敘述如下：

- 一、不可以污辱，見官員不必下跪。
- 二、具有司法權，可以打官司。
- 三、免除勞役，不必負勞役。
- 四、具有一些減刑、免罪的特別條例。
- 五、養奴婢。<sup>82</sup>

但是，紳士的也具有一些義務，應該說是對這個鄉裡的責任。

紳士也是傳統時代鄉村社會中的管事者，這是一種具有社區自治組織的地方領袖，或者說就是鄉賢。鄉賢或鄉紳們更多地關注鄉村社區的公共利益和事業發展，並且對於來自衙門的不合理的權力擴張進行有效抵制。當然，他們要保證國家意志和利益在鄉村社會的落實。他們的文化權威和社會地位源於制度與文化，或者說他們的身份、資格和威望本身即是文化和制度構成要素。他們不是權力結構中的力量，卻是整個社會制度和網絡中的組成力量，他們必須有社會地位，可以出入衙門，直接表達鄉村社會的訴求，並對地方權力體系形成壓力。王先明在《新鄉賢與核心價值觀的踐行》一文中說明：

---

<sup>82</sup> 梁庚堯著：《中國社會史》，臺北，臺大出版中心發行，2014年10月，第380頁。

在以農耕文明為生存方式的時代，他們擔負著「道在師儒」的使命，為民師表，移風易俗，促成鄉村治理的太平景象。在高度分散聚居的鄉裡村落，社會秩序的維系、鄉村公務的管理，均依賴於鄉紳或鄉賢的主持或主導，邑有興建，非公正紳士不能籌辦。鄉村公共事業的興革，如公產、義學、社倉、興修水利、道橋，大都由鄉紳士掌控，所謂「紳士之可否，即為地方事業之興廢。」<sup>83</sup>

梁山泊一百零八位好漢之中，吳用不是「無用」而是最「有用」的知識紳士階級。梁山泊一天沒有吳用，一天就不能存在。這樣重要的吳用不但不能坐第一位交椅，並且連第二位交椅也要讓給盧俊義坐。其理由是梁山泊只是流氓的團體，雖然有不少的軍官來投降，然其勢力只限於下層階級，至於紳士則仍視梁山泊為草寇。梁山泊得不到紳士的同情，就是表示中國社會上最有勢力的階級不贊成梁山泊，其結果足使梁山泊終為草寇，無法擴張勢力範圍<sup>84</sup>。

因為梁山泊的倫理觀念本來只注重「義」字，所以在晁蓋未死之前，它的會議室始終叫做聚義廳，至宋江繼承晁蓋後，宋江即把聚義廳改作忠義廳（聚義廳改作忠義廳，為第五十九回的事，接著第六十回，宋江就設法使盧俊義入夥）。這個「忠」字，解釋為整個梁山泊須盡忠於「趙官家」，固然可以，解釋為諸好漢須盡忠於宋江，也無不可。不管怎樣解釋，為臣須盡忠，乃是紳士們所視為最重要的道德。

## 二、流氓階級的道德觀

薩孟武先生認為：『在中國古代社會上，最有勢力的兩個階級之一的「流氓和地主」，他們都有做皇帝的資格。不過流氓要做皇帝，須有地主的德性，地主要做皇帝，須具流氓的德性。地主的德性是什麼？是禮賢下士。流氓的德性是什

<sup>83</sup> 王先明著：《新鄉賢與核心價值觀的踐行》，光明日報，2014年08月20日。

<sup>84</sup> 薩孟武著：《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1967年版，第151頁。

麼？是豁達豪爽。一方能學地主的禮賢下士，同時又能學流氓的豁達豪爽，一定可以得到全社會的歡迎，而被視為「真命天子」<sup>85</sup>。

流氓很看重「義」字，對於「忠」、「孝」二字則不次在眼裡，「義」是流氓尊崇的倫理道德觀念，是所謂「流氓道」的極重要的內容，在李喬發表的〈論中國歷史上的流氓文化〉一文中釋義：

流氓崇尚的「義」，大致包括兩方面：一是行俠仗義，一是哥們義氣。一對外，一對內。行俠仗義本是遊俠的特色，古代流氓未脫盡遊俠蟬蛻，故行俠仗義的氣質多一些，後世的流氓則逐漸脫盡行俠仗義的氣質，而專門作惡。哥們義氣是維繫流氓同夥之間的紐帶，「三國演義」的桃園結義和「水滸傳」的梁山上「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式的哥們義氣是他們所追求和模仿的範式，流氓用語「為哥們兩肋插刀」是這種哥們義氣的典型表現。但背棄哥們，扔掉義氣的事也是司空見慣的，因為左右流氓的最後是一個「私」字<sup>86</sup>。

薩孟武說明：

說梁山泊是流氓所組織的團體，所以他們重義而不重孝。孝子王進不上梁山，而最初出現於《水滸傳》的好漢便是氣死母親的史進(第一回)。宋江雖有孝義黑三郎的綽號(第十七回)，但若研究其生平行為，尚不能稱為養志。其他的人更談不到什麼孝字。李逵雖然動於孝思，回家取娘，然而半路就送給老虎充饑(第四十二回)。這個事情可謂世上最悲慘的事，然而李逵回山，訴說殺虎一事，宋江竟然大笑，眾好漢也沒有安慰的話(第四十三回)。假使李逵所取的非其母，而是其友，則難保梁山泊諸好漢不責李逵謀事不慎。重友而不重親，不是因為他們沒有道德，乃是因為他們的倫理觀念與紳士的倫理觀念不同<sup>87</sup>。

然而他們卻極重視義氣，魯智深在菜園舞起鐵禪杖，因為林沖一聲喝彩，即認為知己(第六回)。後來，林沖受了高太尉陷害，刺配滄州，魯智深便

<sup>85</sup> 薩孟武著：《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1967年版，第146頁。

<sup>86</sup> 李喬著：《史學理論研究》〈論中國歷史上的流氓文化〉，2015年10月24日，第58頁。

<sup>87</sup> 薩孟武著：《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1967年版，第11頁。



一路跟去，暗中保護，走到野豬林之時，董超、薛霸將林沖縛在樹上，舉起水火棍，望林沖腦袋劈了下去，而樹後忽然飛來了鐵禪杖，救林沖於將死，魯智深又直送林沖到滄州(第八回)。這種義氣還可以說是林沖是他的知己。「士為知己者死」，這句話只唯下層階級方能做得出來。楊雄吃酒半醉，途中為張保等搶去財物，石秀挑著一擔柴來，路見不平，便放下了擔，一拳一個，都打得東倒西歪，楊雄方才脫身，而與石秀結拜為兄弟(第四十三回)。此種路見不平，奮不顧身，恐非士大夫能夠做到。他如武松為施恩而打蔣門神，施恩亦三入死囚牢去看武松，這都是出於「義」字。所以「義」乃為下層階級的倫理觀念<sup>88</sup>。

「水滸」故事中描寫的是以「盜」為業的流氓，都可以說是「盜」，而且還往往是占山為王的大盜，在一百零八人中，最後都上了梁山。這些人沒有任何政治訴求、只是以殺人搶劫為業，在任何社會裡都是非法之徒，為絕大多數人所否定。這一百零八人中有些人流氓，並不是完全從事非法活動的，也有許多並無禍害民眾行為的。但由於他們脫離了宗法網絡、脫離了農村、又沒有正當職業的，生活沒有保障，隨時隨地都有可能捲入反社會活動。他們漂泊江湖，浪跡四方，屬於「生活最不安定」之列，他們的共同點除了脫離了主流社會秩序、沉淪於社會底層之外，就是：愛好拳棒，好勇鬥狠；天不怕、地不怕，敢於干犯法紀；講義氣，專好結識好漢等等。這是他們在江湖上生存和發展的本錢。有了這些他們才能夠與主流社會對抗，殺人放火，攻擊官府，用暴力向社會索取屬於自己或不屬於自己的利益。他們在江湖上遊蕩期間，有的直接投奔綠林，不以當「盜賊」為諱；有的尋找一切機會以改善自己境遇，哪怕為此觸犯國法。

如果說《三國演義》宣揚的「義」主要表現為感恩戴德的話，那麼施耐庵的《水滸傳》所宣揚的「義」主要表現為拔刀相助，平等相處，事實上，這也是作者在全篇小說中大力讚揚的。胥惠民在《論《水滸傳》「義氣」文化的意義》一文中提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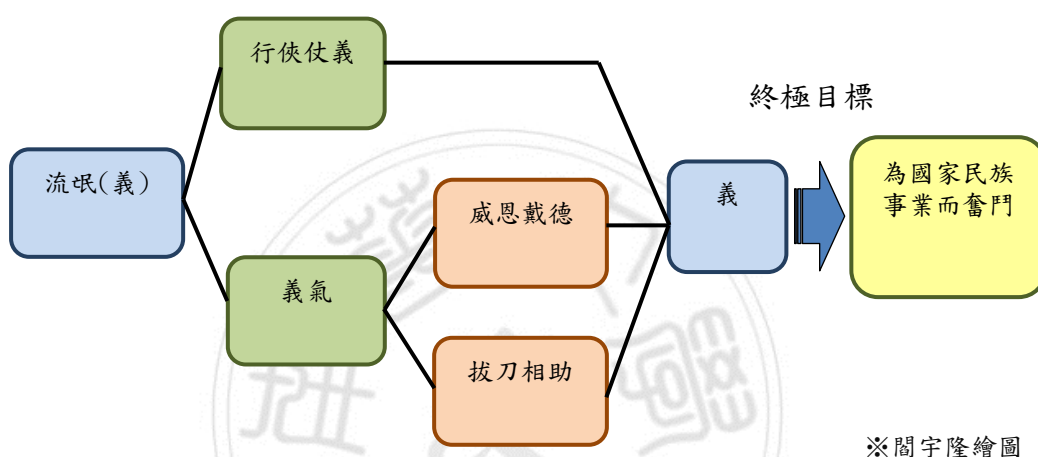
梁山好漢是沒有道德底線，富有江湖義氣的人，可以為兄弟兩肋插刀，不

---

<sup>88</sup> 薩孟武著：《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1967年版，第11頁。

惜自我犧牲。但是，他們的義氣只是針對自己圈子內的兄弟，而對於他人卻非常不義，甚至說非常殘忍。比如，武松進入孫二娘的黑店，差一點被剝成包子餡；宋江被王英一夥抓捕，差一點讓王英叫人掏出心肝做醒酒湯。宋江之所以受到天下英雄的敬仰主要不在疏財，而是他尊重所有不同的人才，從而打動了天下英雄。在小說中凡是發現尊重人才，合理使用人才的這便是義，否則就是不義<sup>89</sup>。

圖 5 流氓階級道德觀示意圖



然而，「義」的終極目的是為國家民族事業而奮鬥。這個思想主要是通過宋江用過人的「義氣」作紐帶維繫另外 107 個好漢的團結實現的。盧永和在《水滸敘事的文化闡釋》一書中說明：

在梁山的誓詞中明確有「但願共存忠義於心，同著功勳于國；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思想。怎樣實現「共存忠義於心，同著功勳于國」呢？那只有走招安路線才成。不過，「水滸傳」中梁山好漢的忠義思想闡釋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過。如明代李贄肯定「水滸傳」的忠義；然而金聖嘆卻否定「水滸傳」的忠義<sup>90</sup>。

依照金聖嘆的忠義標準，宋江等一百零八人當然說不上忠義，只能算盜寇。胥惠民在《論《水滸傳》「義氣」文化的意義》中也提到：

在我國傳統文化中，所謂「義」主要指符合正義或道德規範的思想行為，

<sup>89</sup> 胥惠民著：《論《水滸傳》「義氣」文化的意義》，荷澤學院學報，2006 年第 3 期。

<sup>90</sup> 盧永和著：《水滸敘事的文化闡釋》，南投暨南大學出版社，2014 年，第 96 頁。

如《論語·述而》「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因此人們常用義來稱讚那些合乎正義或道德規範的人和事，《史記·刺客列傳》「於是襄子大義之」就是這個意思。義常常又指正義或人們之間的情誼、恩義，但是，《水滸傳》中的「義」略有不同，它似乎特指小說中突出的思想即「義氣」<sup>91</sup>。

宋江常把忠義掛在嘴上，但金聖歎斷言他是假仁假義；可是李贄卻加標了個「忠義」，成了《忠義水滸傳》。到底《水滸》的忠義是什麼意思，確實是個難於回答的問題。就說忠吧，宋江明明心裡想做皇帝。眾家好漢殺官劫府有什麼「忠」呢？可是又要受招安以顯其「忠」。《水滸》中的「義」更為複雜。說「仗義」，其實有著全不相同的層次，「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並非是普遍原則。

### 小結：

綜上述觀點我們可以獲得梁山泊的社會基礎，是由遊民主體形成，他們不從事生產，靠劫掠為生進而變成流氓，並由行為方式衍生出「劫富濟貧」、「替天行道」等價值觀念。另由此可歸納出北宋時期引發社會動盪是由豪強透過政權交稅賦稅壓榨農民，流氓劫富濟貧、替天行道，百姓農民為求食物而反抗而引起。

宋朝最有勢力的兩個階級分別是「紳士」及「流氓」，紳士階級的養成是由於祖宗的財產而可以安樂生活，又由於國家的保護即由皇帝保護，為了感恩感德，而需盡孝祖宗，盡宗皇帝。所以紳士階級的道德是忠孝二字。流氓很看重「義」字，對於「忠」、「孝」二字則不次在眼裡，「義」是流氓尊崇的倫理道德觀念，是所謂「流氓道」的極重要的內容。

---

<sup>91</sup> 胥惠民著：《論《水滸傳》「義氣」文化的意義》，荷澤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

## 第參章 宋江何以能成為梁山泊領袖

自唐朝開始，吏居於主流社會的從屬地位，並在統治集團的內部是處在邊緣地位的。宋江懷有一腔壯志雄心，然而宋朝的主流社會結構卻使他只能屈居僚佐，《水滸傳》中，宋江的身分是「吏」，便可說明這個問題。主流社會對吏是有幾分歧視的，他們自視也賤，宋江殺死閻婆惜失去在主流社會生存下去的資格，但這時的他只想暫時流亡避難，卻絲毫沒有投奔梁山的念頭，這是最佳的寫照。

即時無奈上梁山非主流社會也只是宋江尋求精神寄託的地方，然而他們散漫而艱辛的生活方式卻是他所不願接受的，因此他始不願正式成為這非主流社會的一員。本章由宋江何以能成為梁山泊領袖為主軸，進而探討及說明宋代的政治。

### 第一節 由宋江家族關係說明宋代的政治

宋江的故事發生於北宋末年，他從一個歷史人物逐漸演變為小說中的文學人物。歷史上真實的宋江只是「盜賊」<sup>92</sup>，而在幾百年的民間流傳中，他逐漸成為了起義領袖，甚至是民族英雄。宋江既是梁山集團的核心，沒有了他集團成長難，維繫更不易，《水滸》給他的形象卻不盡符合人們對領袖的一般期望。這還不是最難理解的地方；撲朔迷離的是，宋江的行徑和他所扮演的角色矛盾重重，難作互協性的解釋。這些矛盾終叫他成為一個幾乎可以隨意歸類、卻又不似可容多類並屬的人物，種種理解的困難都可以通過事例來說明。

互不認識的公孫勝和劉唐不僅同時想到結伴劫取生辰綱的念頭，還不約而同地跑來並不是江湖人士慣常走動的碼頭鄆城。希望說服兩人均不認識的當地財主晁蓋出來擔任行事的領袖。這個所謂眾望所歸的人物卻孤陋寡聞至莫名其妙的程

<sup>92</sup> 與《水滸傳》中的多數人物形象不同，宋江在歷史上確有其人，《宋史》上記載，宋徽宗宣和三年(西元 1122 年)，「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今山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在《東都事略》中，也提到一名為侯蒙的官員，曾向皇帝上書建議「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敵抗者，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或足以平東南之亂」。呂哲編著，《水滸傳》，2008 年 1 月，華威國際出版，第 26 頁。

度，另一組人馬去年劫了生辰綱而成為天下大懸案的消息他一無所知，日後結聚梁山的一百零八名頭目。在計劃劫取生辰綱前，他充其量只認識宋江、宋清、吳用、朱仝、雷橫這五個本地人和白勝。指晁蓋江湖經驗貧乏，在江湖上毫無聲名可言並不為過。公孫勝和劉唐竟都對晁蓋信心十足，遠道訪求，這本已是十分差勁的情節安排(且不說能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公孫勝單一個人去劫生辰綱。本不費吹灰之力；對他來說，根本就沒有理由要遠道找個不詳底細、自己復不認識的人來當領袖)。他們不找同在一城內的宋江，可見宋江當時的知名度尚不及在江湖上活動極有限的晁蓋。《水滸》沒有給晁蓋配備當領袖的資格：公孫勝和劉唐都不選擇宋江，那麼宋江充當領袖的條件理應更差。自此至晁蓋逝世，這個綽號托塔天王的好漢(單憑強烈的正義感，晁蓋已絕對足稱好漢)在梁山集團裡始終是個徒掛首領招牌的虛位人物。宋江則不然，甫經露面，旋即以一呼眾諾、聞者景仰、見者心折的姿態號召群雄，宋江由是仿如一幢沒有弄好地基、便在上面一層層往上加建的華廈。先在介紹他出場時，說他樂善好施，因而揚名邇遠(如果他確盛名遠播，為何公孫勝和劉唐不找他？這是《水滸》敗筆隨處可見之一例)，然後再在以後的情節重複強調宋江喜玩權術，以此作為廣結新知、鞏固山寨的手段。

## 一、宋江的身世背景

### (一) 宋江身世背景

水滸傳作者施耐庵在《水滸傳》第十七回裡如此介紹宋江：

宋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鄆城縣宋家村人氏。為他面黑身矮，人都喚他做黑宋江。又且於家大孝，為人仗義疏財，人皆稱他做孝義黑三郎。上有父親在堂，母親喪早。下有一個兄弟，喚做鐵扇子宋清。自和他父親宋太公在村中務農，守些田園過活。這宋江自在鄆城縣做押司。他刀筆精通，吏道純熟，更兼愛習槍棒，學得武藝多般。平生只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若高若低，無有不納。便留在莊上館谷，終日追陪，

並無厭倦。若要起身，盡力資助。端的是揮霍，視金似土。人問他求錢物，亦不推託。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難解紛，只是週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藥餌，濟人貧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東、河北聞名，都稱他做及時雨，卻把他比的做天上下的及時雨一般，能救萬物。<sup>93</sup>

宋江的相貌、家境、地位雖然不是最差的，但也絕對不是最出眾的，他只是普通民眾的一個代表。首先，他相貌平凡《水滸傳》第 18 回宋江剛出場的時候有一大段描寫：

眼如丹鳳，眉似臥蠶。滴溜溜兩耳懸珠，明皎皎雙睛點漆。唇芳口正，髭須地閣輕盈；額闊頂平，皮肉天倉飽滿。坐定時渾如虎相，走動時有若狼形。年及三旬，有養濟萬人之度量；身軀六尺，懷掃除四海之心機。志氣軒昂，胸襟秀麗。<sup>94</sup>

他的綽號有一個稱作「黑三郎」，閻婆惜就多次叫他「黑三」，也多次被人叫做「黑矮漢子」，可見，宋江不如林沖、關勝等人英武挺拔相貌堂堂，也不如吳用、公孫勝等人溫文爾雅文質彬彬，他應該是一個又黑又矮但五官端正的普通人形象。

其次，他家世平常，第 18 回中，宋江出場的時有介紹：

祖居鄆城縣宋家村人氏，下有一個兄弟，喚做鐵扇子宋清，自和他父親宋太公在村中務農，守些田園過活<sup>95</sup>。

可以看出宋江只是一個有些田產，靠務農為生的小地主。他沒有柴進那般顯赫的聲勢地位，也沒有晁蓋、盧俊義、李應等人的財大氣粗。和許多中下層地主階級知識份子一樣，宋江從小受到的是濃厚的儒家思想教育。

宋江上梁山前，是宋朝鄆城縣的一個小吏，稱為「押司」，職位也不高，押司一職，只是協助知縣處理案牘之類的小吏，其官職不比林沖的八十萬禁軍教頭，花榮的清風寨知寨，甚至比不上晁蓋的保正。宋朝的吏主要是經手徵收稅賦或者處理獄訟，押司應該是沒有品級的「小公務員」，輔助政府官員的日常政務，

<sup>93</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 年版，163 頁。

<sup>94</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 年版，173 頁。

<sup>95</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 年版，175 頁。

負責案卷整理工作或文祕工作，一般一個縣有八個押司。從後來幾個朝代成熟的縣級政府編制（縣官、師爺、通判、捕快、押司、獄長）看，押司應在捕快之後。劉秉光先生在《水滸宋江的真實背景來歷》一文中說明：

宋朝時，一個正七品縣官一個月的俸祿只有三十兩銀子，那麼作為一個與縣官差了四個等次的押司，一個月的俸祿決不會超過十兩，而且沒有獎金和補助<sup>96</sup>。

這麼一點微薄的俸祿，除了基本的衣食住行之外，應該所剩不多。周曉彤在《淺論宋江的形象》一文中講到宋江的地位時說道：

原來故宋時，為官容易，做吏最難…那時做押司的，但犯罪責，輕則刺配遠惡軍州，重則抄紮家產，結果了殘生性命，以此預先安排下這般去處躲身<sup>97</sup>。

職位低下又有危險，使他養成了謹小慎微的習慣。如果沒有私放晁蓋以及之後引發的不平凡的遭遇，宋江極有可能一輩子都做一個押司小吏，沒有驚瀾起伏的度過一生。

## （二）宋江的品格與形象

### 1. 宋江的品格

#### （1）自知之明與知人善用

宋江身上最重要品質是他有自知之明，這是他超越凡人的地方。第 68 回中他曾對盧俊義說道：

非宋某多謙，有三件不如員外處：第一件，宋江身材黑矮，貌拙才疏；員外堂堂一表，凜凜一軀，有貴人之相。第二件，宋江出身小吏，犯罪在逃，感蒙眾兄弟不棄，暫居尊位；員外生於富貴之家，長有豪傑之譽，雖然有些兇險，累蒙天佑。第三件，宋江文不能安邦，武又不能附眾，手無縛雞之力，身無寸箭之功；員外力敵萬人，通今博古，天下誰不望風而服。<sup>98</sup>

<sup>96</sup> 劉秉光著：《水滸宋江的真實背景來歷》，2011年1月17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9353640100opkh.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9353640100opkh.html)

<sup>97</sup> 周曉彤著：《淺論宋江的形象》，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期刊，2012年4月19日，第3頁。

<sup>98</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年版，690頁。

其實宋江還是蠻了解自己的，如他本身知道自已的不平凡、缺點及能力不足之處，所以他懂的放下身段，對每個人都極為重視不看輕別人，所以他禮賢下士不了解的地方均能向人虛心請教，例如戰敗的將領、小吏及莫莫無名的人士等，故最終贏得如呼延灼、關勝等一流武將的信服，甘心聽從宋江的指揮，周曉彤在《淺論宋江的形象》一文中說道：

書中有很多押送情節，宋江算得上是待遇最好的一位。面對押送自己的差役，宋江百般的禮遇維護。刺配途中，宋江叮囑押解公差走小路躲開梁山。遇到劉唐欲殺公差而解救自己時，宋江以自刎相挾，終於保得兩人平安。而兩個公差也對宋江言聽計從，小心服侍，甚至路上主動幫宋江打開枷鎖，讓其休息。宋江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做自己該做的事，又會作人又會使錢，押送之初就打點好了一切，路上又出手大方，態度恭謙，沒有因為自己強大的人際而表現的強勢，讓公差們很受用，自然招人喜歡<sup>99</sup>。

其實如同上述所說的，宋江一直都了解自己的平凡，所以他對小吏及無名人士也都禮遇有加。例如在故事第 22、23 回中，宋江遇到武松，此時的武松還莫莫無名(尚未成為打虎英雄)，所以來到柴進莊上待了一年，因「性氣剛」，始終為獲得喜歡豪傑名士柴進的重視。但是宋江和武松兩人初次見面，一見如故，彼此相互傾慕。「同是天涯淪落人」一個殺了人一個打傷了人，均有相見恨晚之歎。直到武松較宋江先離開柴進莊，離別時宋江還給武松一錠十兩銀子，又送行了多程，可以說是依依惜別見深情。

宋江知道自己的才疏學淺，所以能做到知人善用。他雖然喜歡槍棒，武藝卻稀鬆平常，因此常用林沖、李逵等猛將做前鋒，衝鋒陷陣；他用公孫勝和吳用兩人做軍師，運用智謀算無遺策；雖精通刀筆，卻遠遠不及裴宣和蕭讓；所以將功勞簿交與掌管。更是收羅了包括醫生、獸醫、裁縫、鐵匠、船匠、石匠等一大批優秀的後勤人員，大大增加了梁山的實力，使梁山能夠與朝廷抗衡<sup>100</sup>。

<sup>99</sup> 周曉彤著：《淺論宋江的形象》，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期刊，2012年4月19日，第3頁。

<sup>100</sup> 周曉彤著：《淺論宋江的形象》，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期刊，2012年4月19日，第3頁。



## （2）有仇必報和心狠手辣

有仇必報是凡人的性格特徵，宋江雖然沒有做到睚眦必報，他還是很有肚量的，但是只要遇到陷害而危及到性命，在得救之後，宋江的報復是瘋狂可怕的。第 33~35 回中，宋江被清風寨知寨劉高拿住折磨，誣陷成賊，獲救之後，有文道：

宋江早傳下號令：休要害一個百姓，休傷一個寨兵。叫先打入南寨，把劉高一家老小盡都殺了<sup>101</sup>。

第 41 回中，宋江對待陷害自己的黃文炳一家，更是實行了「三光」政策。

宋江等吶聲喊，殺將入去。眾好漢亦各動手，見一個，殺一個，見兩人，殺一雙，把黃文炳一門內外大小四五十口，皆殺盡了，不留一人…<sup>102</sup>

黃文炳本人更是被割了烤肉，心肝被做了醒酒湯。為了報仇和梁山的發展，宋江打下了祝家莊和曾頭市，祝家莊的結果是全滅，連盟友扈家莊也被殺的只留下扈氏兄妹兩人，曾頭市同樣如此，一門老少盡數不留，射殺晁蓋的史文恭也被剖腹剜心。宋江報仇，不是滅人滿門，就是虐殺仇人，同時掠人財物，燒光其家，手段極其殘忍惡劣。

即便招攬人才，宋江有些事也做的很過火，牽連無辜。第 34 回中，宋江為了讓秦明入夥，冒充秦明在青州城外大開殺戒。

待到城外看時，原來舊有數百人家，卻都被火燒做白地，一片瓦礫場上，橫七豎八，殺死的男子婦人，不計其數<sup>103</sup>。

第 51 回中，為了招攬朱仝，更是指使李逵殺了方年四歲，有恩於朱仝的知府的兒子。像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可以說，秦明、朱仝等人是被宋江用很卑鄙的手段「逼」上梁山的，宋江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心狠手辣，這也是他令人詬病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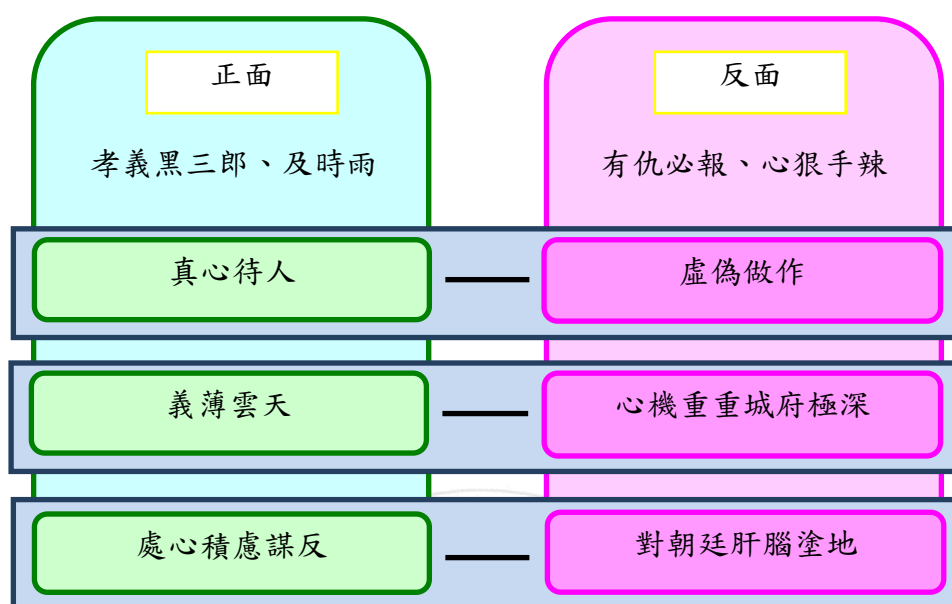
由此看來，宋江身上優點缺點並存，他並非是一塵不染的聖人，也不是十惡不赦的壞蛋，而是一個有血有肉，有喜有怒的凡人。

<sup>101</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 年版，343 頁。

<sup>102</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 年版，423 頁。

<sup>103</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 年版，345 頁。

圖 6 宋江品德形象分析圖



※閻宇隆繪圖

## 2. 宋江的形象

《水滸傳》是描寫了北宋末年一次農民起義的作品，宋江是作品中的主人翁，也是農民起義的領袖。很多驚心動魄的場面，都和他的名字聯繫在一起，宋江是《水滸傳》裡的第一號人物，也是最豐滿、最立體、最複雜、最有藝術魅力的一個人物形象之一。對宋江這個人物形象而言，對他的評價褒的人有之，貶的人亦有之，眾說紛紜啊。所以說無論我們以怎樣的主觀情感對宋江或褒或貶，或愛或恨，都不能否認他是中國古典文學人物畫廊裡一個成功的藝術形象，下面就從不同方面來分析宋江這個人物形象的複雜性。說他真心待人，他又時時顯示虛偽做作；說他義薄雲天，他又心機重重城府極深；說他處心積慮謀反，他又對朝廷肝腦塗地；說他為人寬厚，他又時時做下兇殘之事。宋江的性格是在說話人的描述中逐漸豐富起來的。

宋江是《水滸傳》裡邊名號最多的一個，宋江的綽號有四個。一出場就介紹了宋江的四個綽號，這四個綽號實際上就是介紹了宋江的幾個特點：一個是黑宋

江，因為他長得面黑，身體比較矮，這是就他的形體來講的，並不是如林沖、關勝等人英武挺拔，也不如吳用、公孫勝等人那樣溫文爾雅文質彬彬，他長的其貌不揚。第二個是孝義黑三郎，講的是他對待父母，講究孝道，他的孝道貫穿到了他的思想當中，成為他思想的一個部分，並且是他的思想的一個很重要的支撐點；第三個是及時雨，講的是他仗義疏財，扶危濟困，從他陸續和弟兄們交往中能夠看得出來，在這一點上他做得到位。第四個是呼保義。這四個綽號實際上重點介紹了宋江平時的為人和喜好，而且都是正常工作之外的表現，比如「愛習檣棒」、「揮金似土」、「排難解紛」、「扶人之困」等等，這些好處多都具有一些江湖上的感覺，在民間宋江是一個喜歡做好事、願意做好事的熱心人，無論是在家庭倫理上還是在社會關係中他以自己的作為贏得了大家普遍的認可。還有從潯陽樓宋江吟反詩可以看出宋江有謀略，有志向，不滿足於現狀。宋江的形象一直不能討好。金聖歎則認定作者痛恨宋江奸詐，他也認為宋江是純用術數去籠絡人，所以「時遷、宋江是一流人」，在一百單八人中「定考下下」。但大多數人不喜歡宋江，是因為他一直是梁山好漢中的招安派，並最終導致了梁山義軍和他自己的悲劇命運。

韓立勇在《宋江是怎麼當上老大的》一文中深入分析：

雖然金聖歎批評說：宋江為區區滑吏，而徒以銀子一物買遍天下。但是在古代上流社會的義和利是分開的，而生活在底層的遊俠和豪傑們卻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一天三餐可能不飽，也許你可以說他們現實，但是這些現實也是那腐敗的政府逼出來的，所以宋江之所以送給這些人銀子等物質東西，廣結朋友，一方面體現了宋江為人世故，懂得老子說的「將欲取之，必先以之」的道理<sup>104</sup>

一方面也很瞭解下層人物的需要，一個懂得關心別人，周濟人於水火之間的人從來不會有困難的。

---

<sup>104</sup> 韓立勇著：《宋江是怎麼當上老大的》，2011年5月18日。  
<http://opinion.hexun.com/2011-05-18/129704934.html>

## 二、宋江的處事與性格

周曉彤在《淺論宋江的形象》一文中提到：「宋江最主要的核心思想是「忠」、「義」，這也是他長久以來備受爭議的地方。<sup>105</sup>」

這裡區分 4 個部分來介紹，分述如下：

### (一)義薄雲天與忠君愛國

#### 1. 上梁山之前，宋江是「義」字當頭的英雄

《水滸傳》第 18 回對宋江有一個總的介紹，寫他平生只好結交江湖好漢，一慣地扶危濟困，救人之急，有「及時雨」之稱。因此，天下不論識與不識的，提起宋江莫不交口稱讚，也無不以結識宋江為榮，宋江也正因此而獲得了極高的聲譽。18 回中，他明知晁蓋截取生辰綱，犯了彌天大罪，但他冒險私放晁蓋。

梁文娟在〈《水滸傳》中宋江的忠義觀念〉一文中說明：

作為官吏，法在他觀念裡邊是根深蒂固的，一旦跟義發生了矛盾以後，他為了救自己的朋友、兄弟，宋江知法犯法，而置國家的法度於不顧，置個人性命安危於不顧，義壓倒了法。<sup>106</sup>

第 21 回講到，宋江怒殺閻婆惜，不是因為閻婆惜不守婦道，而更關鍵的是她把梁山首領晁蓋的書信隱藏了起來，這可是「私通盜匪」的罪證。在宋江委曲求全百般向她索要未果的情況下，宋江為了全朋友之義，只得殺人滅口。怒殺閻婆惜是宋江人生的一個重大轉折。為了逃避朝廷的懲處，他不得不亡命江湖，四處流浪。作者寫他亡命江湖的目的，還是在於展示一個「義」字。宋江的義，不僅使他俠名遠揚，而且像一塊護身符一樣多次助他化險為夷，遇難呈祥。各路英雄對宋江的頂禮膜拜，正是對他的「義舉」的回報。

刺配江州時，梁山眾人邀宋江入夥，宋江百般拒絕。後來晁蓋硬要把宋江留在山寨，宋江顯然已經十分的急躁，以至於「淚如雨下」，說自己若不去江州，

<sup>105</sup> 周曉彤著：《淺論宋江的形象》，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期刊，2012 年 4 月 19 日，第 3 頁。

<sup>106</sup> 梁文娟著：〈文學教育〉，〈《水滸傳》中宋江的忠義觀念〉，2008 年第 1 期。

便是「上逆天理」。可以看出宋江對於落草為寇，從心底是鄙視的，此處所說的「天理」，當然是指宋朝的法度，即忠心於宋朝的統治。可見宋江從心底是忠於朝廷忠於皇帝的，但此時他沒有將自己的思想灌輸給眾人，只是他一人心底從「忠」罷了。因此這個時期，宋江的表現是「義」大於「忠」。

## 2. 上梁山之後，宋江是忠義雙全領袖

宋江憑藉個人組織與軍事才能，以人格魅力成為梁山的領袖。他關懷兄弟，仗義疏財，為朋友兩肋插刀，有良好的群眾基礎，對江湖的好漢有巨大的號召力。投奔他的有魯智深、武松、楊志、史進、李忠等二龍山少華山桃花山的頭領們，也有解珍、解寶、孫立、孫新等登州的好漢們，連帶關勝、呼延灼、徐甯等朝廷將領，零零總總數十人。另外，《水滸傳》有幾次比較大的戰役，打祝家莊、曾頭市、高唐州、青州、北京城，贏童貫，敗高俅，戰果累累，但大多數他都是為了救自己的兄弟而打仗，打祝家莊是為了救時遷，打高唐州是為了救柴進，打青州是為了救孔明，打北京城是為了救盧俊義。

這一時期宋江的忠君意識表現得強烈起來。他把梁山的聚義廳改成忠義堂，宣揚「替天行道」，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他親自指揮、親自領導了不少戰役：三打祝家莊、夜攻曾頭市、兩贏童貫、三敗高俅，打擊地方惡勢力與朝廷奸黨，表現出卓越的領導才能、軍事謀略和外交策略。梁文娟在〈《水滸傳》中宋江的忠義觀念〉認為：

這個階段是宋江性格轉變的關鍵時期，梁山事業的輝煌使得朝廷恐慌，這也正是宋江接受招安、得到朝廷認可的資本，在「全忠仗義」、「替天行道」雙重旗子招引之下，義漸漸向忠傾斜<sup>10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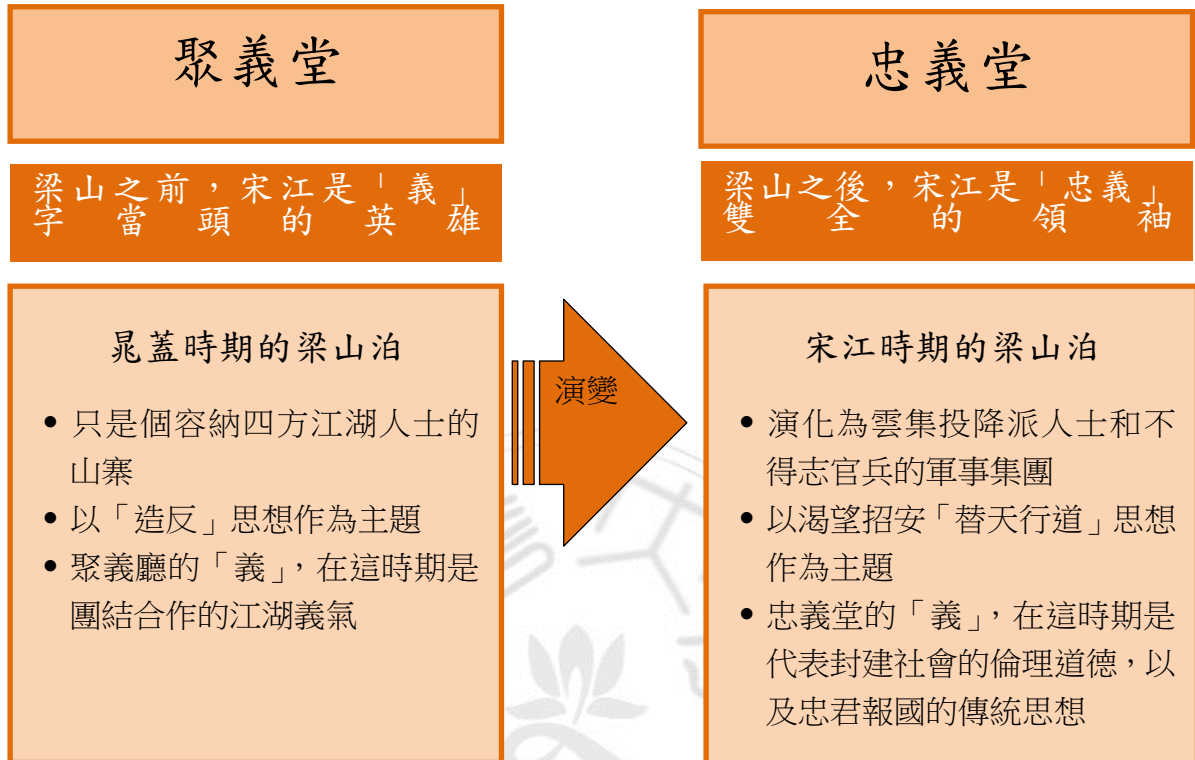
從戰爭結果來看：打祝家莊、曾頭市絲毫不留情，都是全滅的下場；與童貫、高俅打，都是力爭生擒對方，不傷性命，擒來更是禮遇有加。

總而言之，這個時期宋江的思想雖然影響了眾人，但並沒有使梁山遭受損

<sup>107</sup> 梁文娟著：〈文學教育〉，《《水滸傳》中宋江的忠義觀念》，2008年第1期。

失，宋江觀念裡的「忠」、「義」還是對等的。

圖 7 聚義堂至忠義堂義的演變圖



※閻宇隆繪圖

## (二)趨利避害與追名逐利

宋江是地主，是小吏，是反賊，是領袖，是英雄，無論他的身份是什麼，他只是個凡人，他的思想他的追求都與常人一樣。趨利避害是人的天性，生死關頭，只要還有生存的一絲希望，人往往不會輕易放棄，宋江也不能除外。自古以來殺人要償命是人們的共識，殺了閻婆惜之後，宋江第一反應是逃跑。雖然從書中看來，宋江的人緣極好，極有可能被關照免去死刑。但這時的宋江只是一個未經大風大浪，處事不深平凡小吏，殺人之後，心中慌亂，害怕法律的制裁，他與常人一樣害怕死亡，選擇了逃亡生涯。

宋江上梁山並非出於自願，是酒後潯陽樓上題反詩，犯有殺頭之罪，臨刑前

一刻被晁蓋帶人救下，才被迫上梁山。與之前不同處境，這個時候宋江的反賊之名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實了，宋朝對捉住反賊的處置只有死路一條。要不上梁山當賊頭，要不乖乖等著被朝廷處死。面對生存還是死亡的抉擇，雖然心有不甘，宋江還是選擇了前者。以「共舉大義」的理由上樑上，正體現了他貪生怕死的凡人思想。

追名逐利是人之常情，名聲地位榮譽也是利益的一種。在那時，沒有什麼能比做官更能帶來利益的了，宋江的志向一直都是如此。在滅了清風寨、打了青州之後，宋江原本是打算投奔梁山的，但是從宋太公處聽聞朝廷因策立太子而大赦天下，在父親的干涉下和自己的心動中，他很乾脆的投案自首去了，結果如償所願，刺配到了一個好地方。在宋江心中，即便是做了「徒流」的囚犯，也好過做一個自由的山賊，因為流放是有期限的，大不了時候到了再回來，可要是做了山賊，不僅擔心朝廷的圍剿，而且連累家人，還會斷了他人仕當官的路子，落得不好的名聲，這是宋江最不願意的，他內心深處對農民起義保留著看法，他和統治階級一樣，把農民起義看成是盜賊行為。

從第 39 回宋江的詩文中可以看出他的志向，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恰如猛虎臥荒丘，潛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冤仇，血染潯陽江口。宋江希望得到朝廷的賞識，能夠「遂凌雲志」，可惜他酒後不慎寫下反詩，親手斷了自己正常入仕的道路。韓亞男、簡論合著【《水滸傳》中宋江的性格】一文中說明：

在解決了生死危機的情況下，宋江的又把目光看向了更高的利益，既然走不了常路那就走彎路，「想做官，殺人放火受招安」，宋江完全是按照這個步驟來的，他率領眾人將朝廷派來的軍隊一次次的打退，終於使得朝廷讓步，帶著兄弟們搖身一變，成為了堂堂正正的將軍，開始步入仕途。宋江這位濟貧苦、排難解紛的「俠士」在內心中不甘永遠扮演江湖豪傑角色，他嚮往的是功名富貴與光宗耀祖。他那種「建功立業」的願望和「官爵升還」的幻想，在本質上同真正的農民革命意識格格不入，而同士大夫階層、平民意識一脈相承<sup>108</sup>。

---

<sup>108</sup> 韓亞男、簡論著：〈《水滸傳》中宋江的性格〉，忻州師範學院學報，2008 年 8 月。

「忠君」的背後是宋江的追名逐利，再一次表現了他思想的平凡。平遼、平田虎、平王慶、征方臘，幾場戰役之後，宋江的名望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理想實現了。但在最終回，喝下毒酒之後，宋江才明白，這個朝堂是容不下他的，可惜為時已晚，命在旦夕之際。

我自幼學儒，長而通吏，不幸失身于罪人，並不曾行半點異心之事。今日天子輕聽讒佞，賜我藥酒，得罪何辜！我死不爭，只有李逵現在潤州都統制，他若聞知朝廷行此奸弊，必然再去哨聚山林，把我等一世清名忠義之事壞了。<sup>109</sup>」（第六十九回）他找來李逵陪自己一同赴死，留下了「寧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的遺言<sup>110</sup>。

宋江把形勢看得很透，自己反正都是死，留下李逵一個不能成事，還會壞了兄弟們用鮮血和性命好不容易換回來的名譽。是不顧一切的報復去做無用之功，還是繼續維持自己和兄弟們的形象受萬人景仰，宋江毫不猶豫的做了聰明的選擇。臨近死亡，宋江的沒有常人的惱羞成怒或是心灰意冷，他已經看透了生死，平靜的接受，頭腦冷靜的去思考獲得最大的利益，命殞的同時，也一舉奠定他忠義兩全的英雄之名。

### （三）宋江鋪陳了很了不起的型像

古時的北宋通訊並不像現代用大眾傳播媒體如廣播、報紙、電視及網路等那麼方便，寄信要靠飛鴿傳書或人馬運輸送達，交通工具沒有汽車更沒有柏油馬路那麼舒適的路面可供行走，這一來一返就要幾周甚至幾月。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下，宋江的仗義疏財名聲基本上就靠著人人的口耳相傳，就能影響到河北、山東的好漢，並讓他們了解到宋江「及時雨」的事蹟，這個是作者在碩造宋江角色上的一個很好的行銷方式。那至於宋江為何會有這麼多的綽號，由於宋江沒有什麼

<sup>109</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年版，697頁。

<sup>110</sup> 韓亞男.簡論著：〈《水滸傳》中宋江的性格〉，忻州師範學院學報，2008年8月。



特別突出的，於是施耐庵就將所有的優點和特徵都給取了綽號，作家何鈺著《盜寇的潛規則》一書中道：

其人黑，就有「黑宋江」之稱；其人孝義，就有「孝義黑三郎」之譽；其人經常仗義疏財，就有了「及時雨」和「呼保義」之讚。這麼多的綽號，對江湖豪客，就用「及時雨」，對政府官員，就用「孝義」，整治李逵這個活寶，就得用「黑宋江」，每一個綽號，都有其不同的用處。那為什麼是「及時雨」最出名？看上面宋江這麼多優點或者特徵，沒有一個是特別出色的。論孝，比不上公孫勝；論義，比不上林沖；論疏財，比不上柴進；論黑，比不上李逵。這麼多綽號裏只有一個「及時雨」最為朗朗上口，因此也被叫得最多<sup>111</sup>。

由於一開始時宋江沒做過什麼了不起的事，所以「及時雨」就越叫越響了。例如柴進，有著貴族的身分這是他最出色的優點了，而不是仗義疏財；例如晁蓋，有著厲害的托塔神功，掩蓋了仗義疏財的優點，所以他叫「托塔天王」；如果把「及時雨」用在他們的身上並非不行，可就是不大符合他們的身份和性格。反而像宋江，百無一用，好不容易揪出來了一條優點，便將這一綽號大肆宣傳，久而久之，大家想起柴進來首先便想到他的身份，想起晁蓋也只有他的托塔，而想起宋江來，卻是「及時雨」般的「仗義疏財」，這也是作者為了要鋪陳宋江了不起的型像而設計的。

宋江「仗義疏財」的這種性格，一直跟他到做了土匪頭子還沒有改變，這也使他得到「禮賢下士」的好名聲，反觀像柴進和晁蓋，就沒有像宋江這等的胸襟。例如武松在柴進莊上之時，因為生病而脾氣變的暴烈，柴進就慢慢的疏遠冷落他。此事一傳出去，柴進就沒有了「仗義疏財」的名聲。晁蓋在楊雄和石秀上梁山時，因為「敗壞了梁山名聲」，差點砍了他們的腦袋，晁蓋也就沒有了「仗義疏財」的名聲。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因為宋江，才使得柴進重視武松，楊雄

---

<sup>111</sup> 何鈺著：《盜寇的潛規則》，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發行，2008年10月，第9篇〈宋江的及時雨是怎麼叫響的〉。

和石秀才得以保全性命，沒有對比就沒有發言權，光看武松、楊雄、石秀三人的遭遇，便知道在做人上，宋江比晁蓋、柴進高明得多，其「及時雨」的名聲，也壓過了晁、柴二人，得以廣泛傳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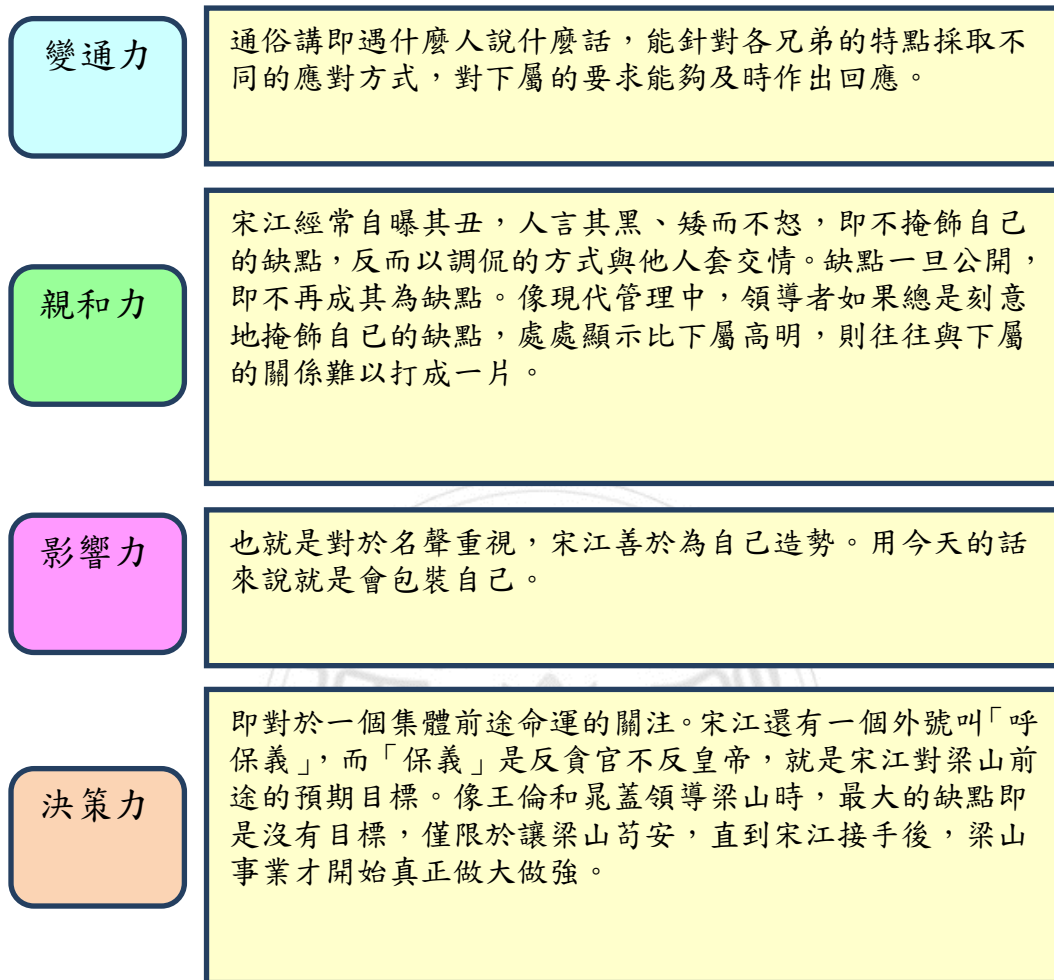
宋江，刀筆吏出身；晁蓋，村長（里正）出身；柴進，貴族出身。三個人不同的出身，決定了他們的身價。先說晁蓋，看《水滸傳》中的描寫，當過里正的，如史進、晁蓋等人，生活品質是絕對沒問題的，至少也是個中產階級。要當上里正，他們至少得是個小地主出身才可以獲得提名。掌握了土地資源，便掌握了銀子。晁蓋、史進也一樣。在農業社會，有土地便是老大，是以我們才有「土地革命」一說。既然晁蓋、史進是個小地主兼村長，那麼他們的仗義疏財也就順理成章了。沒有人會覺得他們的仗義疏財有多麼的了不起。像大地主兼大貴族柴進，就更不必說了，本來就是朝廷養著，又有自己土地，有錢得很。疏點兒財，對柴進來說不過是九牛一毛，根本就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sup>112</sup>。

我們無法得知宋江在體制內有無貪污受賄，無可考，那就當他是個公正廉潔的公務員吧，所以宋江要做到「仗義疏財」，必然要把他的俸祿及資產的絕大部分貢獻出，當然若他是個大官那也沒什麼，要知道宋江是個押司小吏而以，能得到的收入並不多。可見得宋江在一開始「仗義疏財」的難度上，是要比柴進、晁蓋等人難度上要高的多的，必竟他們在初始的設定上就已經有一定的基礎，所以宋江能夠獲得更多的好評。但是宋江儘管以實際收入來幹「仗義疏財」的事情是有點力不從心，但是對於爾後的投資報酬率是巨大的，因為在日後往往宋江被捉住後，只要自報只自己是宋江，匪徒就會問，是不是山東及時雨宋江，在得到肯定的答案之後，宋江便又從階下囚變成座上賓了，這在梁山英雄的故事裡找不到第二人了。

---

<sup>112</sup> 何鈺著：《盜寇的潛規則》，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發行，2008年10月，第9篇〈宋江的及時雨是怎麼叫響的〉。

圖 8 宋江領導能力分析圖



※閻宇隆繪圖

#### (四)宋江創造其過人的領導才能

在《水滸傳》中，宋江與梁山泊的前兩位領袖王倫和晁蓋相比，無疑宋江更深諳管理藝術。宋江不能成為能征慣戰的英雄，但他的個人氣質卻使他可以成為一個深具凝聚力的好領袖。孫琳在【《水滸傳》續作研究】一書中說明：

《水滸傳》作者施耐庵為宋江創造了四種特殊的領導能力，即變通力、親和力、影響力、決策力<sup>113</sup>。

<sup>113</sup> 孫琳著：《水滸傳》續作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12月，第240頁。

通過領導能力分析圖，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宋江強于晁蓋、柴進的地方。是作者施耐庵經過種種渠道地宣傳，讓日後眾人談起「仗義疏財」，便只能想起宋江一個。這種經典的行銷案例，即使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仍然值得我們學習，特別是那些需要做各種行銷宣傳的企業，更要學習。

## 第二節 王倫與晁蓋何以不能成為領袖

梁山泊先後經歷了三任寨主，王倫、晁蓋和宋江。這三人出身經歷不同，行事風格迥異，在江湖上的名聲、影響和號召力也是大不相同。然而，他們能夠成為梁山泊寨主，肯定不是泛泛之輩，必定都有其過人之處。比如說王倫，他既不會武藝，又不懂的文學，心胸還那般促狹，杜遷憑什麼要讓給他當山寨寨主？王倫當上梁山泊寨主也不是一天兩天了，官軍也不是征剿過一次兩次了，為什麼梁山泊還能存在下去？這從另一個側面說明，王倫也不是一無是處，肯定也有他的長處。這個長處是什麼呢？就和晁蓋、宋江一樣的共同之處——疏財，能謀財！區別在於，晁蓋、宋江的疏財是一種主動行為，而王倫是一種被動的行為。

### 一、王倫的性格與才能

提起王倫這個名字，怕未必馬上意識到是誰，但一加上「白衣秀士」，立刻就明白，而且會在腦海裡跳出一個氣量偏狹，容不得人的形象。李國文在《被歪曲的白衣秀士王倫》一文中說明：

「白衣秀士」，原指尚未及第的士子，從字面推敲，本無貶義。但經《水滸傳》一用，就成了帶有否定意義的專屬詞彙，一是專指《水滸傳》中的王倫，二是泛指類似王倫式不能容人的小人之輩<sup>114</sup>。

這就是文學的力量，文學要給你鼻子上抹塊白，千秋萬代也洗不乾淨。《水滸傳》裡有許多反面人物，王倫是著墨最少，卻是最成功的一個負面典型。在歷史上確有王倫其人，要是細細考究起來，不完全是《水滸傳》裡描寫的那樣一個人。

---

<sup>114</sup> 李國文著：《被歪曲的白衣秀士王倫》，《人民日報》2006年8月1日 第十五期。

宋人蔡條在他的筆記《鐵圍山叢談》（卷第一）裡，提到了他。「當寶元、康定（1041年）之時……會山東有王倫者起，轉鬥千餘裡，至淮南，郡縣既多預備，故即得以殺捕矣。」這和《宋史》載徽宗宣和三年（1120年）「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應該不是一回事，因為兩者之間，至少相隔七十多年。但到了文學家手裡，這時間差便不存在了。於是，在蔡條眼裡「轉戰千餘裡」的王倫，就成了施耐庵、羅貫中筆下的心胸狹窄的白衣秀士了<sup>115</sup>。

### （一）王倫的性格與才能

梁山的首領前後有三個，王倫創始，晁蓋繼承，宋江擴張。晁蓋和宋江對梁山發展的貢獻容易理解。而王倫卻被說成是心胸狹窄、畏縮忌才，阻礙梁山發展的敗類。馬幼垣先生在《水滸人物之最》一書中說明：

古今讀「水滸」者莫不臭罵白衣秀士王倫的，實在是有欠公允。這都是受到主要人物林沖、吳用諸人評論王倫之言所影響，事實並非如此<sup>116</sup>。

沒有王倫，梁山山寨很可能從未出現。另外論文才武功，王倫和宋江相差不多，都不是有顯著真材實料之人。歷史學家薩孟武先生在《水滸傳與中國社會》一書中提到：

指出王倫本是一個落第秀才，我國古諺有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就是因士大夫階級有種性質<sup>117</sup>。

用現代語言，就是投機分子。又說：

而這種性格之人，胸襟不廣，只配幫別人成大事，不配自己獨立做大事，秀才出身的王倫當然也有這種性格。<sup>118</sup>

話雖如此，但王倫的才能就不是宋江能及的。當王倫不得志時和杜遷一度投

<sup>115</sup> 李國文著：《被歪曲的白衣秀士王倫》，《人民日報》2006年8月1日 第十五期。

<sup>116</sup> 馬幼垣著：《水滸人物之最》，2003年11月，臺北，聯經出版社，第20頁。

<sup>117</sup> 薩孟武著：《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1967年版，第10頁。

<sup>118</sup> 薩孟武著：《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1967年版，第11頁。

靠柴進。王倫旋即帶著杜遷去開發梁山水泊這塊天賜的險地。看準梁山的特殊地形，把它開拓為一深具發展空間的地盤，這功勞只該王倫才配擁有。

馬幼垣先生在《水滸人物之最》一書中說明：

不管王倫因何而死，他眼力之佳和開創之功不是一聲狹隘自私便可以抹煞的。要說王倫容不下晁蓋諸人，倒不如說晁蓋等容不了王倫，拔之而後快<sup>119</sup>。

從晁蓋諸人的角度去看，以王倫的性格而言，與其日後磨擦不斷，不如立即採取行動，迅速剷除王倫。又要尊他為山寨創基人，卻又將其殺之，豈不互相矛盾，只好臭罵他一頓，王倫說成是心胸狹窄、嫉賢妒能，屢拒英雄豪傑於梁山之外的敗類。

李國文認為：《水滸傳》作者在王倫被殺以後，引用了一句古人云：「量大福也大，機深禍亦深」<sup>120</sup>，這種因果關係，不是絕無道理的。

但是，量大談何容易，能寬容者，多為強者，而不夠寬容的人，十之九，在個人才智和總體實力方面，存在著某些虛弱的成分。唯其虛弱，才有嫉畏，才有計較，才有排擠，才有偏激和狹隘。像王倫這類資歷淺，學問少，本領差，智商低，能力弱，心胸窄，人緣薄，名望遜的人物，在現實生活中，是不乏見的，哪怕稍稍勝似他一點的朋輩，也是不肯相容，極不樂意出現在自己視野中。官場如此，文場何嘗不如此，那些東張西望之徒，老是五官挪位地看不上這個，瞧不起那個，說了歸齊，在於實力不濟耳！統觀海內，凡閒話說得多的人，文章寫好者少。

## （二）歷史上的王倫與水滸梁山

宋代歷史上記載，王倫和宋江都是從山東地區，揭竿而起，嘯聚梁山泊，反抗宋王朝的起義農民隊伍。

但王倫規模大，轉戰千里，一直打到淮南，聲勢很大；宋江規模小，最遠

<sup>119</sup> 馬幼垣著：《水滸人物之最》，臺北，聯經出版社，2003年11月，第23頁。

<sup>120</sup> 李國文著：《被歪曲的白衣秀士王倫》，北京，人民日報發行，2006年8月1日 第十五期。

進入海州，即今之魯蘇接壤處。兩人的結局雖不一樣，王倫被捕殺，宋江被招安，但他們起事後的作戰方式，進攻策略，設立根據地，完善集團內部體制方面，基本上相類似。<sup>121</sup>

因此，說王倫是一位先行者，不算過分。而宋江，不過是將他未竟的事業，再付諸實施一次罷了。

在中國歷代農民革命運動中的這種傳承現象，也是屢見不鮮的。如同在宋代的王小波、李順、鐘相、楊么；稍早的如唐代的王仙芝、尚讓、黃巢；稍晚的如明代的張獻忠、李自成。所以，王倫是宋江精神上的導師，實際構成前仆後繼的關係，大概比較貼合的<sup>122</sup>。

但《水滸傳》成書以後，那位先行者，便化為最早在梁山泊裡落草為寇的首領，也就是綽號為白衣秀士的王倫了。從小旋風柴進的口中，我們知道白衣秀士王倫，和摸著天杜遷，雲裡金剛宋萬，還包括朱貴，大概比較早地就在梁山泊裡，建立了農民革命根據地。那四個好漢聚集著七八百小嘍羅，打家劫舍，多有做下彌天大罪的人，都投奔那裡躲災避難。從朱貴對林沖所說：「山寨中留下分例酒食，但有好漢經過，必教小弟相待<sup>123</sup>。」(第十一回)以這兩人的言語考量，一是敢於吸收天下造反之人，二是能夠禮送過路英雄好漢，看來王倫並非拒賢妒能之輩。作為頭領，井井有條地維持山寨的正常運轉，也是無可非議的。

然而，從王倫面對林沖入夥這樣一個棘手問題時，尋思道：「我卻是個不及第的秀才，因鳥氣合著杜遷來這裡落草，續後宋萬來，聚集這許多人馬伴當。我又沒十分本事，杜遷、宋萬武藝也只平常。<sup>124</sup>」(第十回)這是正常人的反應，但從此開始，他便固定在白衣秀士這樣一個狹隘，排斥異己，自以為是，無法容人的角色上了。不及第是王倫的致命傷，所以，當林沖水寨大拼火時，雙眉剔起，兩眼圓睜，也是抓住他的這個其實算不得什麼弱點的弱點：「量你是個落第腐儒，

<sup>121</sup> 李國文著：《被歪曲的白衣秀士王倫》，北京，人民日報發行，2006年8月1日 第十五期。

<sup>122</sup> 李國文著：《被歪曲的白衣秀士王倫》，北京，人民日報發行，2006年8月1日 第十五期。

<sup>123</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年版，112頁。

<sup>124</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年版，104頁。

胸中又沒文學，怎做得山寨之主！<sup>125</sup>」(第十八回)由於這樣的扣，王倫的行情，從來沒有被看好過，無論當時，還是後來，包括現在，都抓住他的這個不及第秀才，從心底裡鄙視他。綜上所言，我們可以理解他是一位有遠見的英雄也不算過分。作家李國文在《被歪曲的白衣秀士王倫》一文中，有以下幾點為他來評功<sup>126</sup>：

1. 他比晁蓋、宋江「落草」早，先到梁山泊，先打起義旗。資歷，即使在革命隊伍裡，也是本錢。
2. 他不是像晁蓋、宋江等被官府捉拿，逼上梁山的被迫「落草」，而「因鳥氣」，這個不第秀才，才憤而上山造反，屬主動「落草」。
3. 要不是他選擇梁山泊，建立了革命根據地，後來也不可能使晁蓋、宋江這幫農民起義者，立足於此，跟朝廷對抗，成就一番事業。溯本追源，王倫選擇西逼都城開封，東臨河海之濱，南向江淮魚米之鄉，北上燕北平川之地，建立了這樣一個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根據地，不能不承認他有相當了不起的戰略眼光，這是王倫最主要的功績。

所以，他在世人心目中，是個鼠肚雞腸的形象，恐怕多少也有些冤枉。人們光看到林沖上山入夥時，他被王倫千方百計刁難的一面，並沒有注意到最後實際上將他收留下來的一面。先禮送，後考驗，再留用，作為王倫對入夥人的例行考察手段，和關門主義是兩回事。在根據地初建，人單力薄的情況下，對來者保持必要的警惕，這是創業者必須保持的高度警覺性，說不上是缺點。同樣，當晁蓋、吳用、公孫勝、劉唐、阮氏三兄弟，上得山來，這位白衣秀士又把對待林沖的三部曲，重新實施一次的時候，第一步驟還未完成，豹子頭就把刀拔出來，將王倫結果了。

從此，王倫成了沒氣量，難容人，小心眼，無水準，不賢而嫉賢，無能而妒能的文學上典型人物。若是林沖在拔出刀之前，捫心自問，連你這樣一位開封城

---

<sup>125</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年版，173頁。

<sup>126</sup> 李國文著：《被歪曲的白衣秀士王倫》，北京，人民日報發行，2006年8月1日 第十五期。



裡，八十萬禁軍的教頭，也讓實在敵不過的王倫，半夜裡從夢中嚇醒過來，而不敢收留。現在，山寨裡嘩啦啦一來七八條好漢，有文有武，荷槍實彈，皆是殺人亡命，無所忌憚之輩，他能接受得了？山頭主義，從來是農民「革命軍」缺乏全域觀念的產物，王倫對這些強大許多倍的來客，拒絕接納，不能不說是正常反應。客大欺店，店大欺客，來了這一夥大搖大擺的客人，他不會張開膀臂，熱烈歡迎的。他是小本經營的店老闆，因此，他不可能識大體，顧大局，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連一個讓其認識形勢，待其思想轉變，然後使其拱手讓位的時間，也不給予王倫，喀嚓一聲，搨倒在亭上了。

王倫捨財，是不是「疏財」，需要辯證地看。林冲上梁山，王倫害怕他好武藝，一旦識破他的手段，強佔山頭，自己沒法迎敵。因此，為了免致後患，他只好「發付他下山」。王倫用的是什麼辦法呢？請林冲赴宴。酒席快要散了的時候，「王倫叫小嘍羅把一個盤子，托出五十兩白銀，兩匹紵絲來<sup>127</sup>」（第十一回），讓他尋個大寨安身歇馬。不管怎麼說，這也是一種捨財。林冲正在性命攸關時刻，又能到哪裡去安身？所以，王倫又讓他取一個投名狀來，這就引出了另一個人——楊志。

楊志失陷了花石綱被免職，他收的一擔兒錢物，待回東京樞密院使用，打算官復原職。正好趕上林冲要一個投名狀，這擔錢物被林冲弄到了山上。王倫看他好武藝，就想讓楊志留下來挾制林冲。由於楊志還心存幻想，所以執意要走，說：「如不肯還（行李），楊志空手也就去了。<sup>128</sup>」（第十一回）王倫留他住了一宿，第二天吃過早飯，眾頭領叫一個小嘍羅，把昨夜擔兒挑了，一齊把楊志送下山去。

晁蓋生辰綱事發，帶著六位好漢上了梁山，聽了他們的所作所為，王倫一時間驚得說不出話來。王倫「心內躊躇」，也就有了不留晁蓋等人之心。當然了，王倫要送走晁蓋的路數和此前送林冲時一樣——送銀子。看看飲酒至午後，王倫回頭叫小嘍羅取來。三四個人去不多時，只見一人捧個大盤子，裡放著五錠大銀

---

<sup>127</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年版，112頁。

<sup>128</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年版，112頁。

子。假如四個人，每人五個，總共是二十錠大銀，每錠大銀是五十兩，就是一千兩銀子。這時候的梁山泊，還沒有多大家業，一次出手千兩紋銀，這王倫也算是出手大方，至少算不上小氣。

換個觀點來探討，王倫因為可能面臨即將失去山寨寨主之位，所以寧可傾家蕩產也要送走晁蓋，可以說他不得不那麼做。再者如果以林沖及楊志為例，就可以說明他不是個守財奴。其一林沖他是單身上梁山的，如果王倫吝嗇錢財，可能有很多的手段來送走林沖，或許會說林沖武藝高強，宋萬、杜遷及王倫聯合也不是他的對手，但必竟是在他人的地盤上，並不是戰場任由馳騁。話說林沖去取投名狀時，遇到過二三百人的商隊，他也不敢動手，況且在這個山上人數可高達七八百人，再不行的話王倫還可以使用陰招，當然如果耍詐的話就不是好漢的行為，可是有人會把王倫當成好漢來看嗎，所以王倫心胸狹隘這是無庸置疑的，可是在金錢上可就看的比身家性命還要緊。其二楊志那擔的錢物本來就是楊沖強回來的，他自己不能夠留嗎，如果留下財物，或許楊志還能夠留下來，以強盜理論而言，這是在正常不過的，但是王倫可沒有那樣做。

### **(三)王倫何以不能成為梁山領袖**

個人綜觀水滸傳得出以下幾點原因，可看出王倫性格和才能是不足以領導梁山：

- 1.王倫的世界觀很狹窄，他只看到的是自己周圍。他只想著自己小打小鬧，來讓自己的弟兄平平安安的生活，所以他不謀求太大的發展，他不知道自己領導的梁山在當時已經成為很有名氣的根據地。
- 2.俗話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王倫做事，瞻前顧後，優柔寡斷。要麼拒絕，要麼收留，快刀斬亂麻，利索一點，免得夜長夢多。
- 3.王倫對林沖儘管不喜愛，卻最後還是收留了林沖，畢竟偌大的梁山是自己一手開創的基業，他真的不想拱手讓給別人。王倫沒有動手殺害林沖，足見王倫內心並不是很歹毒的。王倫本就是梁山首領，一個強盜再仁義，

也是強盜，與其這樣，倒不如殺氣騰騰一把。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王倫好酒好菜款待林沖，並且饋贈給林沖好多金銀，足見王頭領還是有點義氣的。

其實，想想在現實的生活中，有多少人和王倫相仿，辛辛苦苦搞了一個企業，自然實行的是家族式的管理，用人制度、用人策略，自然有王倫的影子。一旦有能人加盟，如果不給你扯後腿、穿小鞋，已經夠客氣的，你還指望他對你升官發財。這樣的人儘管胸無點墨、胸無大志，可是一旦你冒犯了他老人家的虎威，總會找機會讓你腳底抹油。而和他相比，王倫顯然還算個人物。

另外，歷史學家薩孟武先生從古代士大夫階級分析，王倫不能成為梁山領袖的原因，薩孟武認為：

古代士大夫階級就是中間階級的一種，他們在經濟上，站在剝削和被剝削之間，在政治上，站在支配和被支配之間。他們可以上升為支配階級，也可以下沉為被支配階級。因此之故，他們常常分裂為小集團，隸屬於各基本階級，成為精神的鬥士，一部分為支配階級的利益而奮鬥，他部分則為被支配階級的利益而奮鬥。他們為了開拓自己的出路，固然大多數依靠於支配階級，要求支配階級的援助，但是他們一旦知道支配階級不能援助自己，他們又不惜離開支配階級，而投降於被支配階級的革命團體之中。不過他們的地位既然站在支配和被支配之間，所以他們的投降又是不可信用的。當革命潮流高漲的時候，他們的熱血固然也上升到沸點以上，但是革命的高潮過了之後，而入于最後的持久的鬥爭，他們又不免動搖起來。<sup>12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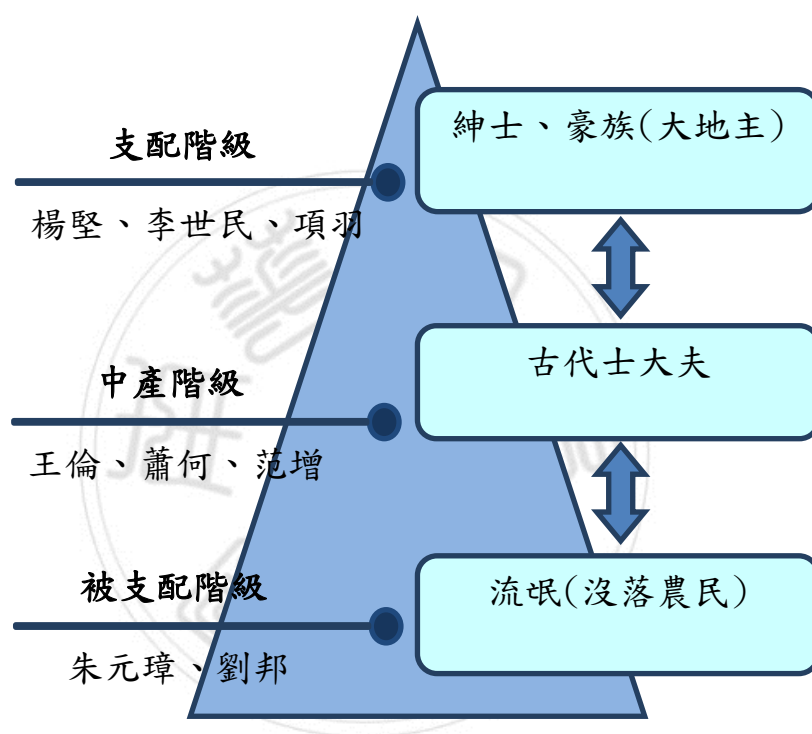
在中國最有勢力的，有兩種人：一是紳士(大地主)，一是流氓(沒落的農民)，地主可以做皇帝，流氓也可以做皇帝。至於士大夫階級則站在二者之間，自古至今，沒有一人曾做過皇帝。所謂「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須遺臭萬年」，這句話絕對不是士大夫階級所能說的。<sup>130</sup>

<sup>129</sup> 薩孟武著：《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1967年版，第62頁。

<sup>130</sup> 薩孟武著：《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1967年版，第63頁。

歷來人們對於書生都是有看法的，筆者從薩孟武士大夫階級觀中繪製了分析圖，我們可以從圖中了解士大夫頂多只能做卿相，必不能做帝皇他們不能做帝皇，不是因為他們的才幹不夠，乃是因為他們是中間階級，胸襟不廣，只配幫別人成大事，不配自己獨立做大事，蕭何幫助流氓的劉邦，范增幫助貴族的項羽，就是一個例證。

圖 9 薩孟武士大夫階級分析圖



※閻宇隆繪圖

#### (四)王倫被殺的背後原因

《水滸傳》裡的山頭一般是誰武藝高強誰就是山寨老大，假如我打不過你，我就讓你來做老大。同樣，我下山打不過人家，就請老大出面擺平；老大也擺不平，咱們一起請人家來當老大。不過，人家的老大、老二都是真正的兄弟，只有長幼之分，不是主次關係，老大說話好使，老二也有第二位的自主權。梁山上的王倫不是這樣，他不僅是老大，他還是「首領」，其他人都是「頭領」。雖然也是稱兄道弟，但兄弟們只有服從的份兒，沒有參與決策的份兒。所以，無論是林冲

上山，還是晁蓋等人上山，其他頭領都沒有說話的份兒，或者是提出了建議，也根本不起絲毫作用。從他訓斥林沖的話當中可以看出，他是「上」，其他頭領都是「下」。正統社會稱呼皇帝為「今上」，已經脫離了官府管轄的梁山泊，王倫把自己說成是「上」，不是很明白他把自己看作是什麼人嗎？既然他是主子，那麼，不管是失言還是說錯了話，都得為自己的話兌現。更何況，他已經把林沖折騰的足夠了，他認為林沖可能已經知道誰是主子誰是臣下了，在這種情況下，林沖留下來了。

但是，梁山泊這個山頭不是世外桃源，他可以是一個獨立王國。既然如此，你要是想當這個主子，必須要有足夠的本錢，否則，你就當不成這個王，不管他是賊王還是草頭王！晁蓋沒有這個本錢，他當得這個首領如同傀儡。王倫更沒有這個本錢，他只能被殺死。

## 二、晁蓋的性格與領導風格

說起梁山好漢，晁蓋是響噹噹的一個、受人喜愛的一個、不可忽略的一個。盧明在《托塔天王稱晁蓋》一文中說明：

上梁山前，晁蓋是個保正。那個時候實行保甲法，建立民兵武裝，負責治安聯防。十戶一保，設保長；五十戶一大保，設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設保正。晁蓋這個保正，負責五百戶的民兵訓練和治安聯防，相當於現在的民防團長吧。晁蓋勇力過人，英風蓋世。鄰村做了一座青石寶塔鎮妖降魔，將鬼怪趕至晁蓋所在的東溪村，晁蓋大怒之下獨自涉水將石塔搬到自己村子裡來，這樣的勇力，絕不亞于魯智深倒拔垂楊柳<sup>131</sup>。

晁蓋喜結好漢，盛名遠播。他樂善好施、仗義疏財，一點不比宋江差。他氣度和風采，受到各處英雄仰慕。

### （一）晁蓋的性格

談到晁蓋的性格，愛好《水滸》的我們都了解他為人忠厚，敢於伸張正義，

---

<sup>131</sup> 盧明著：《托塔天王稱晁蓋》，刊登於水滸國際網絡，2015年10月2日  
<http://www.shui-hu.com/asp/Article.asp?ArticleId=5349>

在群眾中很有威望。他介於王倫和宋江之間，是梁山泊上的第二任首領，劫取生辰綱是他走向政治舞臺的開始，此役也為了爾後的梁山聚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晁蓋是東溪村的保正和富戶，有著英雄的氣質和品性，除了特質外他還交遊廣泛，認識了許多英雄豪傑，參加並領導他們的活動。(第十四回)從故事中可以了解，晁蓋是一位深受敬重的平民領袖。

梁中書送生辰綱一事，劉唐和公孫勝不約而同地給他報信，要同他商議。

阮氏兄弟聽說由他出頭大受鼓舞，把手拍著脖項道：這腔熱血，只要賣與識貨的<sup>132</sup>！

晁蓋是非常重情義的，例如劉唐被都頭雷橫抓到以後，捆到晁蓋家休息，因劉唐與晁蓋是舊識，於是晁蓋好說歹說，並送雷橫十兩銀子，才使劉唐得到解脫。另外上梁山后，他最先想到的就是要報當初宋江給他們提供消息的恩情，派劉唐送一百兩黃金給宋江。還有山寨的事剛有頭緒，他就安排到濟州大牢營救白勝。有人說白勝是吳用救出來的，這話只說對了一半，吳用是按照晁蓋的指令做的。在盧明著《托塔天王稱晁蓋》一文裡，還有一些例子：

得知宋江在江州即將被斬，晁蓋心急如焚，冒險遠征，劫法場救宋江，對宋江的關切無以復加。宋江上山后，晁蓋立刻要讓位給宋江，只是由於宋江不同意才沒讓成。宋江想搬取老父上山，晁蓋堅決支持，並給他妥善行動的建議。在宋江遇險的情況下，還是晁蓋派人接應了他，並把宋太公接到山上。白虎山到梁山求救，晁蓋並沒有因為是宋江的朋情而冷淡，反倒堅決地支持宋江等人帶兵參加三山聚義打青州<sup>133</sup>。

晁蓋秉持正義，疾惡如仇。說晁蓋是梁山事業的創立者，並不是說他是最早上梁山的，而是說他所走的路上截然與王倫不同。在王倫領導的梁山時候，那時的梁山只能算是土匪，在晁蓋領導梁山的時候，才算是代表了正義事業。晁蓋做

---

<sup>132</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年版，133頁。

<sup>133</sup> 盧明著：《托塔天王稱晁蓋》，刊登於水滸國際網絡，2015年10月2日  
<http://www.shui-hu.com/asp/Article.asp?ArticleId=5349>

了梁山泊主，晁蓋一改王倫時期不分好壞又殺搶的作法，而是只殺官不擾民，只劫富戶不劫貧家。頭領們第一次下山劫取富商的錢財，他就特意提示千萬不可殺人。在他的領導下，梁山泊主要打擊對象是害民的惡霸地主。晁蓋強烈的正義感，還體現在他對梁山形象的維護上。得知時遷在祝家莊偷雞，他氣憤地說：

俺梁山泊好漢，自從火並王倫之後，便以忠義為主，全施仁德於民。新舊上山的兄弟們，各各都有豪傑的光彩。這兩個傢伙冒用梁山泊好漢的名義偷雞，連累我等受辱<sup>134</sup>。(第四十六回)

如果不是宋江等人勸說，差一點把與時遷同來的楊雄、石秀斬了。晁蓋做事寬宏，疏才仗義，能夠很好地團結他人，在梁山的草創時期是一個比較合適的領導人。他上山后，取出打劫得的生辰綱並自家莊上過活的金銀財帛，就當廳賞賜眾小頭目並眾多小嘍羅。對眾人打劫到的眾多財物，他處理辦法是一半充公，一半平分，這種利益均沾的方式使梁山兄弟團結得交情渾似股肱，義氣如同骨肉，有效地增強了梁山的凝聚力和戰鬥力。

在晁蓋的領導下，梁山事業有所興旺。但晁蓋時代的梁山僅僅處於一種「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綢錦」的盡情享樂的狀態。他不讀書史，缺乏戰術，指揮才能有所限制，只能是過渡時期的領袖，沒有將起義軍引上正確的道路。大敵當前，晁蓋往往沒有主意，在宋江上山之前，大事主要是由吳用分析、決斷，晁蓋只起發號施令的表面作用。他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說是宋江的陪襯；他的早期活動，在一定程度上說是為宋江的出場作鋪墊<sup>135</sup>。

另外晁蓋為一寨之主，他的政治及謀略是不行的，例如他在梁山上稱王稱霸，只是單純的想與兄弟們永結情義並同享富貴，他交友最主要是重視德行，一但認准了某人是兄弟，便會傾心相待，把情義放在第一位，這或許是他最大的優點，但同時也是他最終不能久任梁山寨主最大的致命傷。在他的眼裡，梁山是一片境土，是不容許那些薄情寡義、偷雞摸狗的人上梁山的，即便他有其通天的本

<sup>134</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年版，480頁。

<sup>135</sup> 盧明著：《托塔天王稱晁蓋》，刊登於水滸國際網絡，2015年10月2日  
<http://www.shui-hu.com/asp/Article.asp?ArticleId=5349>

領也是不行，最終招致眾人離心離德。

相互比較下，宋江的政治哲學及眼光可就深遠多了。梁山泊的一百多位英雄，就像現今我們工作過的團體生活一樣，每個人都有各自思想，難免品行及行為也都會不一樣，宋江當然也會有他討厭的人，但是他都會包容他所不喜歡的人並且委以重任，如果是晁蓋的話就沒辦法了。晁蓋的思想過於純潔，對人或對事都一樣，晁蓋喜歡結交英雄，卻拙於交際。隨著梁山的規模日益壯大，死心跟著宋江的人越來越多，晁蓋反而無法冷靜思考而是焦躁不安，去做一些無關緊要而適得其反的事。在任何一個時代，想要穩住重權或成就大事，良好的人際關係永遠是最堅實的後盾。可惜，晁蓋太過光明磊落，看不慣玩弄權術背後那些無法避免的醜惡和殘酷。余大平在《為什麼要讓晁蓋早死?》一文中說明：

水滸故事的創造者和改造者，為讓故事前後符合世人的想法，故在梁山事業初期，先讓晁蓋出面領頭造反，如果有不忠不義之罪，當然都是晁蓋的；等宋江來到梁山上時，就可以站在一個新的起點上，以新的面目在眾好漢面前倡導忠義了。所以，晁蓋是一個「過渡」性人物，在必要時，就必須讓他死去，好騰出頭領的位置，迎候宋江上山。因為梁山不可能同時有併列的兩個坐第一把交椅的人<sup>136</sup>。

## (二)晁蓋的領導風格

從梁山泊發展的真實狀況來說，晁蓋做水泊梁山的天王，有很偶然的因素。劉亞洲先生在《水滸潛規則》一書中說明：

從志向、胸懷、人望及領導才能的任何一個方面比較，晁蓋確實都不及宋江。稍稍展開點比較，晁蓋甚至都不及魯智深。宋江能代替晁蓋執政梁山，從梁山發展角度看，未嘗不是一大幸事。否則，梁山無論在規模、名氣、前途上，都會很小，甚至可能回到王倫時代<sup>137</sup>。

從這個意義上說，宋江取代晁蓋，是梁山歷史發展的必然。

而以晁蓋的死換來這個必然，不失為一種合理的安排。不過，這並不是說，

---

<sup>136</sup> 余大平著：《為什麼要讓晁蓋早死?》，水滸國際網絡，2015年11月13日。  
<http://www.shui-hu.com/asp/Article.asp?ArticleId=5374>

<sup>137</sup> 劉亞洲著：《水滸潛規則》，臺北，金城出版社，2009年3月1日。



晁蓋就一定被宋江取代。從《水滸傳》的進程與梁山的事業發展看，晁蓋大可以不死，他的被宋江「逼死」，其實是其無能與領導方法過於簡單的結果<sup>138</sup>。

就從搭檔選擇上而言，晁蓋因沒從制度選擇上奠定好根基，所以第第一次當上梁山領袖時就喪失了機會。這樣的說法並不是就否認晁蓋不能當梁山領袖，而是他在位時期沒有妥善安排好副手。以林沖的能力及立功的表現上都能夠勝任梁山的副佐了，晁蓋也因此火拼了王倫來反牽制林沖，這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事安排，但是晁天王未以梁山大局為考量，沒有選擇合適且對梁山根基大業有助益人員，反而立吳用為副手，顯的他私心太重，所以這種安排也說明了，晁蓋看人的眼光確實不夠，不足以成就大事。

另就人才編組上而言，因晁蓋的目光短淺且識才與擇能的能力更為庸常，甚至因疏忽造就的錯誤比王倫更為糟糕。即然梁山泊自己認為是好漢的團隊，那麼應該只要是江湖上的好漢，尤其是慕名遠道而來投奔的英雄，應該來者不拒並且必須要妥善安排，以收攏人心。宋江及柴進就是最好的例子，凡是天下英雄好漢，無論是被流放邊疆的人或者是窮途潦倒的人，不問過往，不論才能，不分貴賤，只要是投靠而來的，全部接納收留，並妥善安排職位，甚至散財傾力結交，所以他們能夠凝聚向心，使其同心同德共同抵抗外欺。話說回來加入梁山之前的晁蓋，也是如此，可是換他當上了寨主，就忘記江湖最起碼的規矩甚至是破壞，那往往會使人心向背憤而離去。財經評論家劉亞洲著《水滸潛規則》一書中舉例如下：

這方面的例子，最典型的莫過於石秀與楊雄投奔梁山時，晁蓋的那句「斬訖報來」的昏話。因為楊雄、石秀、時遷等三人在投奔梁山的路上，偷吃了一隻雞而要殺三人，此舉除了過分殘忍外，還透著極端的無知。水泊梁山奉行的是好漢（強盜）邏輯，義氣是第一位的，好漢間相互投靠是很順理成章的事，連王倫那樣的庸才，還知道拿出一盤銀子禮送遠道投奔的林沖呢。反觀晁蓋，不僅冷落投奔而來的好漢，而且要推出斬首，是冷了傷

---

<sup>138</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年版，112頁。

了石秀、楊雄等投奔者的心，令與宋江一道加入的英雄們心中不齒；如往深裏說，是晁蓋踐踏了梁山的好漢規則，自人心，也為宋江籠絡人心打下基礎<sup>139</sup>。

所以如果一定要給托塔天王晁蓋下個《水滸傳》的評語，那他可算作一個不稱職的梁山泊領袖，雖然不算是蓋棺論定，但至少說得過去，並且符合水泊梁山發展的真實狀況。如果我們再進一步的來分析晁蓋為何無法當上梁山的領袖，那也就是他的不爭之心害了自己了。

從宋江上山后，梁山上大大小小的所有軍事行動全是宋江指揮的，如攻打祝家莊，高唐州，連環馬，收三山，取華州。一切和晁蓋幾乎毫無關係，晁蓋是個沒有心機的實在人，每次下山，宋江都是爭搶著要去，功勞是他的，出的風頭是他的，收來的好漢是因他而來的但是這些畢竟也是為了梁山泊著想，晁蓋不會去爭這些，也不會過多計較，所以每一次出征，晁蓋其實都是讓著宋江去，自己的想法從未堅持<sup>140</sup>。

如上面所言如果是暫時性的話還好，但是長久下來可就無法了，原因很簡單，晁蓋才是梁山之主，而宋江不是，但宋江已經做到了功高蓋主，可說是完全架空了晁蓋，晁蓋自己也是有想法的，必竟他才是真正的梁山之主。

他可以忍受一次，黃門山四傑只是因為聽到宋江的名字，下馬就拜，投奔梁山。他可以忍受第二次，魯智深這樣的好漢都大贊宋江：江湖上今日也聞宋三郎好，明日也聞宋三郎好。但是事不過三，他無法忍受一個偷馬賊段景住居然也說江湖上只聞及時雨大名，無路可見，欲將此馬前來進獻與頭領，權表我進身之意<sup>141</sup>。

說到這裡我想，換做是任何人應該都忍不下吧，因為連一個偷馬賊居然都不把晁蓋當頭領了。我可以不為，但是你不能忽視我的存在，應該就是這個道理吧，於是晁蓋極力想要挽回自己在山寨上的威信，所以才會有曾頭市之難。

在任何時代，欲要穩掌重權或成就大事，良好的人際關係永遠是最堅實的後

<sup>139</sup> 劉亞洲著：《水滸潛規則》，臺北，金城出版社發行，2009年3月，第99頁。

<sup>140</sup> 劉亞洲著：《水滸潛規則》，臺北，金城出版社發行，2009年3月，第100頁。

<sup>141</sup> 劉亞洲著：《水滸潛規則》，臺北，金城出版社發行，2009年3月，第102頁。

盾。可惜，晁蓋太過光明磊落，看不慣玩弄權術背後那些無法避免的醜惡和殘酷。隨著梁山勢力的日益壯大，宋江的心腹越來越多，大大小小的戰役都是宋江帶著人去，如三打祝家莊，大破高唐州，連環馬，收三山等等，收回來的人自然也都是宋江的人。幾次晁蓋想下山去活動活動，宋江就一句：「哥哥是山寨之主，豈可輕動<sup>142</sup>。」(第五十九回)幾次下山後，宋江功高震主，已經成功的把晁蓋架空了，所有這個過程都有吳用的鼎力相助。

總而言之，歷史上宋江率眾起義這一最根本的事實，作者施耐庵改而以晁蓋為頭的一夥人，劫取了不義之財生辰綱之後，逃上梁山聚眾造反，將造反頭領由宋江換成了晁蓋。水滸故事的這一發展變化，具有很重要的意義：如果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來寫宋江，把他放在梁山第一把交椅的位置上，讓他率領眾人打家劫舍、起義造反，固然是一件順理成章、輕而易舉的事情，但是再要在他的身上增添一層忠義思想的色彩，卻是比較麻煩的。因為要讓一個聚眾造反的「強盜」頭子去口談忠義，這個彎子無論如何是不好轉的。余大平在《為什麼要讓晁蓋早死》一文中說明：

水滸故事的創造者和改造者們想出了這個主意：梁山事業的初期，先讓晁蓋出面領頭造反，如有不忠不義之罪，當然都是晁蓋的；等宋江來到梁山上時，就可以站在一個新的起點上，以新的面目在眾好漢面前創導忠義了<sup>143</sup>。

小說作者金庸在《倚天屠龍記》後記中說明：

古代中國成功的政治領袖，第一個條件是「忍」，包括克制自己之忍、容人之忍、以及對付政敵的殘忍。第二個條件是決斷明快。第三是極強的權力慾<sup>144</sup>。

從晁蓋身上很難看以上三點。所以，這是晁蓋無法當梁山領袖的真正原因。

<sup>142</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年版，604頁。

<sup>143</sup> 余大平著：《為什麼要讓晁蓋早死》，2015年11月13日。

<http://www.shui-hu.com/asp/Article.asp?ArticleId=5374>

<sup>144</sup> 金庸著：《倚天屠龍記》第四冊，臺北，市遠流出版社發行，2005年2月，後記。

## 小結：

上述透過古代士大夫分析，使我們了解士大夫階級介於紳士(豪族)及流氓兩者之間，自古以來就無人做過皇帝，不是因為他們的才幹不夠，乃是因為他們胸襟不廣，只配幫別人成就大事，本身則無足夠領導能力，王倫就是最好的例子，終就不能成為梁山領袖。另晁蓋秉持正義，疾惡如仇，是梁山事業的創立者，但因藐視和怠慢旗下將領，招致眾人離心離德，且攻打曾頭市時，沉不住氣且不能忍，犯下許多軍事上的錯誤，造就了無法成為梁山泊領袖的主因。

由宋江的品格形象及處事與性格分析，了解宋江能做到知人善用，且具有忠義思想，並由變通力、親和力、影響力及決策力分析，證明了宋江有其優秀的領導能力，使最終其能成為梁山泊領袖。

表 1 梁山泊三個時期領導人比較表

人物 (階段)	王倫時期	晁蓋時期	宋江時期
階段	草創初步階段	過渡發展時期	穩定發展時期
人數	700~800 人	數千人	萬人
頭領	朱貴、杜遷、宋萬、林沖	朱貴、杜遷、宋萬、林沖、阮氏三兄弟、劉唐、吳用、公孫勝	朱貴、杜遷、宋萬、林沖、阮氏三兄弟、劉唐、吳用、公孫勝、花榮、戴宗、李逵、孔明、孔亮、宋清、雷橫、朱仝等 108 位好漢。
上梁山 原因	主動上山	劫了生辰綱，被逼上梁山	殺人後被逼上梁山
中心目標	打家劫舍，落草為寇，算是土匪，不分好壞的殺與搶。	將梁山目標改為劫富濟貧。開始重視組織建設，代表了正義事業，只殺官不擾民，只劫富戶不劫貧家，但反對接受招安。	把梁山的聚義廳改成忠義堂，宣揚「替天行道」，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他是忠於朝廷忠於皇帝的，一切行動只為推展接受招安。

※資料來源：參考 1.施耐庵著之《水滸傳》。2.吳閑雲著之《黑水滸》。

## 第肆章 由祝家莊與曾頭市談到宋代軍隊與官僚

宋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經濟、文化教育與科學創新最繁榮的時代，期間出現了宋明理學，科技發展亦突飛猛進。西方與日本史學界中認為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的文藝復興與經濟革命的人不在少數。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期，會亡國原因以文制武的方針有關，宋朝實行重文輕武的治國之策，同時削弱地方勢力以加強中央集權，所謂中央集權是軍權集中，財權集中，而地方則日趨貧弱。在軍事上，中央設置樞密院與三衙，均由文官在其中擔任要職。正規軍除了駐守京師之外，還會被分配到各地負責參與鎮壓或征戰等軍事活動；其領導者包括安撫使、經略使、經略安撫使、監押等職位，其中安撫使、經略安撫使等要職也均由文官擔任，由此可見宋朝重用文官、壓制武官的政治思想如何根深蒂固。

### 第一節 宋代軍隊

《水滸》中梁山諸人造反後，官府派軍隊一再進剿，而且一次比一次規模大，統帥的軍官級別越來越高，可結果一樣，都落敗而去。如果說晁蓋剛剛劫了生辰綱，上了梁山後，濟州府尹派團練使黃安帶領千人一出動的僅僅是地方武裝，第一次攻打梁山，翦羽而歸，是因為視梁山等人為普通打家劫舍的草寇，犯了輕敵的兵家大忌。後來朝廷逐步重視梁山的危害，進剿的力度加大，會巫術的高廉落敗後，高太尉大興三路兵，從大宋王朝的轄區內調撥精兵良將，並讓名將之後呼延灼拜下連環陣，照樣敗北；最後高太尉親任兵馬大元帥，徵調河南河北、上黨太原、京北弘農、潁州汝南、中山安平、江夏零陵、雲中雁門、隴西漢陽、琅琊彭城、清河天水等十路節度使各率一萬兵，會剿梁山泊，此時已是集大宋政府各地部隊之精銳，大舉進剿，可結局仍然慘敗，「齊聲喚，前頭捉了高太尉<sup>145</sup>」（五十八回），梁山好漢們取得了一次又一次反圍剿的大勝利。

<sup>145</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年版，596頁。

宋朝因為實施重文輕武的政策，刻意的打壓軍人的勢力和地位，所以造成武力不振，實際上的正規軍是無太大的戰力的，相反的民團屬地方勢力訓練起來可以保護自己莊園及鞏固權勢，所以花較多時間在訓練上，可以說真正的讓梁山泊感到有威脅且頭痛的是民團，是當地地主武裝勢力。

和梁山毗鄰、一個小小的祝家莊，就使宋公明三次興兵，前兩次不但沒有搞定，還讓許多大將被人俘虜，最後離間了祝、李、扈三家，使用了連環計，讓反叛的登州府軍提轄孫立假裝前來幫助祝家，才最後攻陷了祝家莊<sup>146</sup>(五十八回)。

另外梁山泊在攻打曾頭市時，曾氏五兄弟和一個家庭教師史文恭就讓梁山好漢們紛紛落敗，當時梁山泊的領袖晁天王也在此役中箭身亡，把民團和官軍放在一起來比較的話，可以證實民團的戰力確實大於官軍。那民團勝因筆者認為有三點：第一自練的兵馬訓練較精良，第二就是攻守之勢的原因；在攻打祝家莊及曾頭市時，梁山軍是主攻，而民團是守，攻擊和防禦在戰略層級面原本就不同，且外來軍要攻打原來的城池本來就會比較耗損戰力，第三不同的管理機制和精神戰力(鼓舞士氣)的影響，以上是歸類為民團比正規軍來的強的原因。

## 一、祝家莊與曾頭市

我國自秦漢以後，藩鎮割據逐建減弱，但各地的莊園地主，還是喜歡訓練民團，因為他們對朝廷的官軍，即封建制度下建立的政府軍極度不信任。例如「時遷上梁山之前，偷了祝家莊一隻雞，引發了三打祝家莊<sup>147</sup>」。事實如果沒有發生時遷的小偷小摸，宋江他們為了要生存，因得須四處「借糧」，所以梁山和祝家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祝家對於這些草寇則需要自保。在梁山軍和祝家軍的戰鬥中，書中沒有提到正規軍隊，是祝家靠自己培育起來的民團武裝勢力，可見當時的地主是多麼不信任政府的官軍。

<sup>146</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年版，597頁。

<sup>147</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年版，480頁。

## （一）祝家莊

祝家莊位在梁山附近的獨龍崗，祝家在當地扮演著霸主的身分，和梁山泊不同的是他們有著白道身份掩護，並且和當地政府及重要商人保持著密切的關係，這和晁蓋在東西村的狀況有點累同。在地理位置上和東邊的扈家莊、西邊的李家莊在獨龍崗形成三角之勢，並且有著結盟關係。這三大莊各自經營自身的生意，與梁山泊向來是井水不犯河水，因為在晁蓋時期的梁山勢力始終沒有威脅到獨龍崗，所以祝家莊做為當地的霸主，當然不會把梁山放在眼裡。作家安立志在《祝家莊戰役的性質》一文中對祝家莊有著簡單的介紹：

祝家莊位於鄆州地面，距梁山泊不遠，只是一個地主莊園。在《水滸傳》中有幾個這樣的地主莊園，比如史家莊、劉家莊、曾頭市等。這些治理鄉村事務的鄉紳們是泛指：有的是族群興旺的族長，有的是德高望重的鄉紳，有的是財大氣粗的財主，有的是結連官府的豪強。鄉村事務的治理，主要是保境安民，排解糾紛等事<sup>148</sup>。

然而這些地主莊園不同的是，他們成立武裝的民兵組織或地方保安，較具有規模一點的與民團相似，只不過他們主要是為了要防範土匪強盜的侵襲，保護莊民的財產安全，和成立民團是為了要鞏固地方勢力在這一點上是不同的。書中的實際案例證明如果鄉村沒有武裝的話情況會大不一樣，例如劉家莊沒有武裝，劉太公的女兒就被桃花山的土匪逼婚。

小霸王周通逼婚<sup>149</sup>（第五回）。史家莊雖沒有武裝，由於史太公的兒子九紋龍史進武藝高超，少華山的土匪才不敢小覷<sup>150</sup>（第二回）。

但祝家莊地理位置距離梁山泊較近恐有被侵擾的風險，所以他們必須要成立武裝且要有一定規模強度的民團勢力。作家安立志在《祝家莊戰役的性質》一文中對祝家莊的武裝有著詳細的說明：

祝家莊的武裝很有規模。一是有一批強有力的武裝骨幹，比如，祝家莊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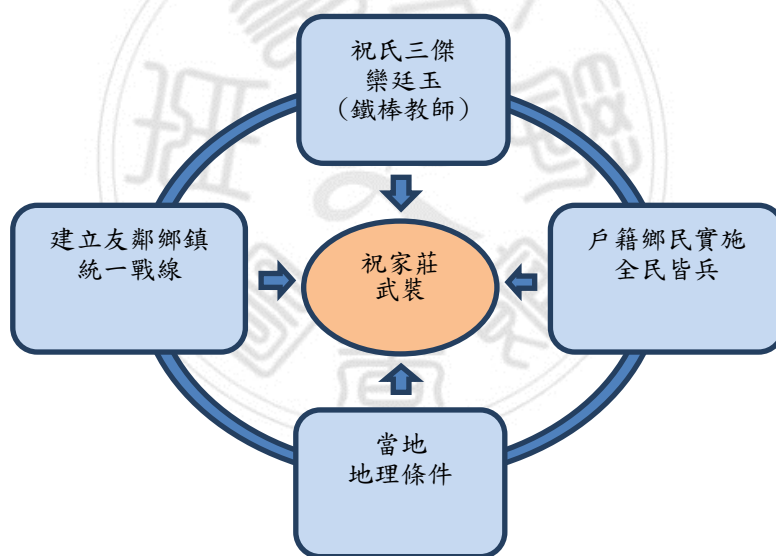
<sup>148</sup> 安立志著：《祝家莊戰役的性質》，北京，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雜文月刊，2012年09期。

<sup>149</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年版，62頁。

<sup>150</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年版，29頁。

「祝氏三傑」，還有一位有萬夫不當之勇的鐵棒教師樂廷玉。曾頭市與祝家莊很相像，他那裡有「曾家五虎」，且有一位更厲害的家庭教師史文恭。二是充分利用當地的地理條件。祝家莊位於獨龍崗下，路徑曲折多雜，四下灣環相似，這種盤陀路給宋江的第一次攻勢造成了重大損失。三是戶籍鄉民實行全民皆兵。祝家莊幾千人，家家配備刀槍，只要有令傳來，人人前往策應。加之鄉民具有保土安民的責任感以及熟悉地理環境的有利條件，往往較之官軍更有戰鬥力。四是建立友鄰鄉鎮的統一戰線<sup>151</sup>。祝家莊與扈家莊、李家莊還簽訂了共保契約，建立了攻防聯盟，形成了相互支持、相互借重的犄角之勢<sup>152</sup>（第四十七回）。

圖 10 祝家莊武裝骨幹示意圖



※閻宇隆繪圖

祝家莊與梁山泊既無瓜葛，也無仇恨。在北宋朝廷治下，祝家莊這樣的鄉村莊園是當時社會的自然狀態與合法存在，而梁山眾人則是反叛朝廷、危害社會的非法武裝。在歷代朝廷眼裡，梁山泊這樣的山頭都被視為土匪強盜，都屬於社會的動亂因素與治安毒瘤。對於梁山這樣的盜匪，如果說朝廷的職責是剿滅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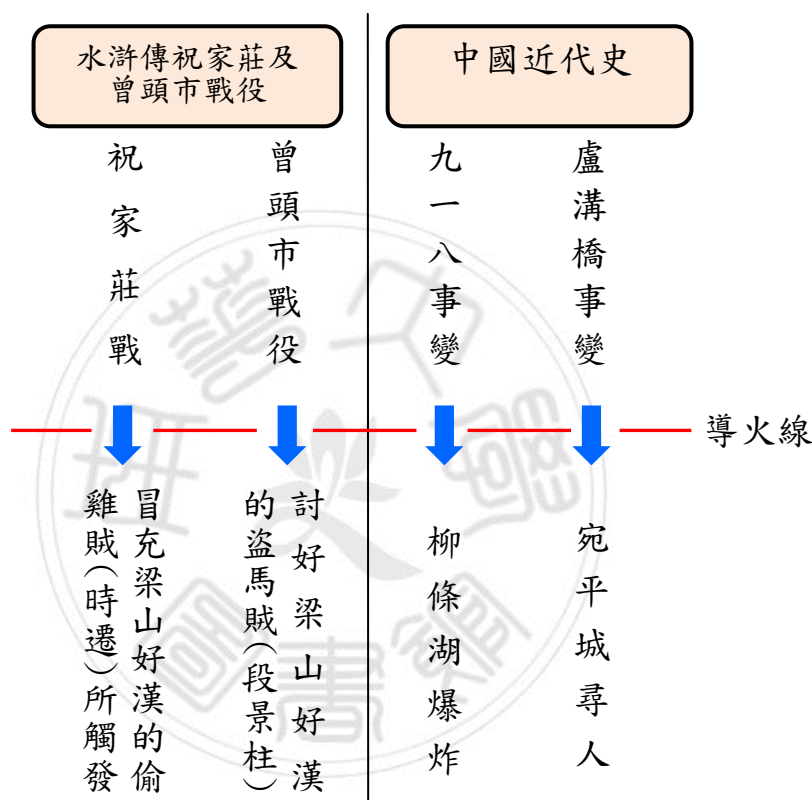
<sup>151</sup> 安立志著：《祝家莊戰役的性質》，北京，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雜文月刊，2012年09期。

<sup>152</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年版，491頁。



那麼，鄉村只能立足於防範了。正因如此，祝家莊建立和擴大武裝的目的，是因「此間離梁山泊不遠，只恐那賊人來借糧<sup>153</sup>」（第四十九回）。而宋江發動戰爭的目的，也是為了搶掠祝家莊的糧食，「以供山寨之用<sup>154</sup>」。因此，在當地村民眼裡，宋江攻打祝家莊與「土匪下山、鬼子進村<sup>155</sup>」沒什麼兩樣。

圖 11 水滸傳與中國近代戰役引發關係圖



※閻宇隆繪圖

宋江上梁山時，一路上招兵買馬、招降納叛，加上晁蓋舊部，梁山人馬已經很成規模。這樣一支土匪武裝，既不經商，又不種田，沒有任何生產功能，他們的供給來源只能依靠打家劫舍、攻城掠寨。發動戰爭的理由很簡單。祝家莊戰役是由一個雖非梁山好漢而冒充梁山好漢的偷雞賊（時遷）所觸發<sup>156</sup>（第四十六

<sup>153</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年版，509頁。

<sup>154</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年版，510頁。

<sup>155</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年版，510頁。

<sup>156</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年版，480頁。

回)，而曾頭市戰役則是由一個並非梁山好漢而討好梁山好漢的盜馬賊(段景柱)所引起<sup>157</sup>(第六十回)。就如同我國近代戰史「九一八事變」肇端於「柳條湖爆炸」，「盧溝橋事變」起因於「宛平城尋人」，戰爭藉口都是人製造的。由此可見，這種戰爭本來就是不可避免的，即使不打祝家莊，也會打曾頭市。而祝家莊戰役是宋江上山之後發動的第一場戰爭。

## (二) 曾頭市

薩孟武在「由祝家村與曾頭市說到中國的軍隊與官僚」一文中說明：

曾頭市距梁山差不多四、五百里(曾頭市地處濰州西南、青州附近，濰州查無此地名，而青州位於今山東青州市，濰坊地區的西端，所以到今山東濟寧地區西端的梁山有差不多二、三百公里的樣子。從戴宗的行程推算，戴宗打探曾頭市情報一個來回花了4、5天時間，戴宗的腳力是一天800裡，來回路上花一天多，打探情報花個3、4天也算合理)。所謂強龍難壓地頭蛇，梁山雖然名聲大，曾頭市覺得自己也不用怕。曾頭市如此囂張也是有道理的，曾家原是金國人士，有宋一代朝廷對外屢戰屢敗，所以身為金國移民，曾家未必看得起梁山人物<sup>158</sup>。

曾頭市是個城市，市區三千餘家，其中一家姓曾，有五七千人馬<sup>159</sup>(第五十九回)。

曾頭市即其軍隊與歐洲中世自由城市之軍隊相同，而為鄉團。部曲與領主有主奴關係，其關係是封建式的，不是雇傭式的，在鄉團，軍隊大率是該鄉的住民，他們由於愛護鄉土，即他們的祖墓、他們的財產、他們的妻子均在這個地方，所以在社會紛亂之時，他們不惜犧牲一身，出而當兵<sup>160</sup>。

曾頭市所為對梁山來說是一種極大的挑釁與羞辱。

面對這樣的挑釁和羞辱，梁山不得不做出反擊。梁山自三打祝家莊後，早已跨入全國性規模黑幫的行列，正在上升期，既然曾頭市如此不把梁山放

<sup>157</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年版，614頁。

<sup>158</sup> 薩孟武著：《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臺北，三民書局有限公司發行，1967年版，第127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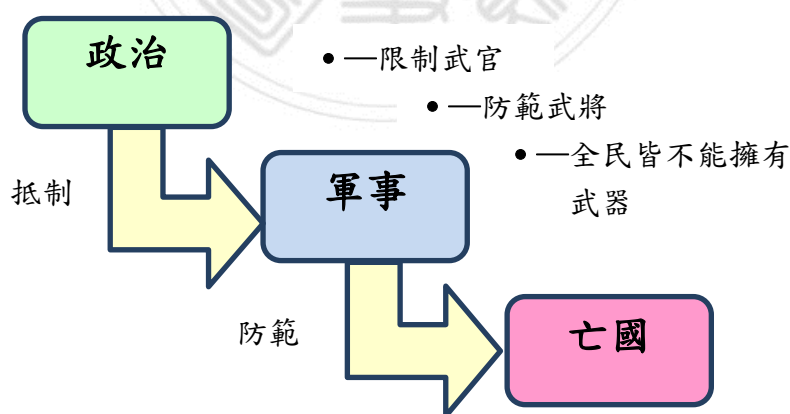
<sup>159</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年版，604頁。

<sup>160</sup> 薩孟武著：《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臺北，三民書局有限公司發行，1967年版，第128頁。

在眼裡，梁山也不可能不作出反應。同祝家莊一樣，曾家在當地也有良好的政商關係和白道身份掩護，與所在的凌州市政府有著極好的關係。曾家同祝家莊一樣也是個家族式的黑幫，5個兒子個個武藝高強，人稱曾家五虎，他們的師傅史文恭更是水滸上一等一的高手，梁山在盧俊義進入組織之前，無人能是史文恭的對手，那匹照夜玉獅子馬目前就是史文恭的坐騎。而另一個師傅蘇定也是個高手。<sup>161</sup>

總之，宋代正規軍隊不如地方武裝勢力，這是因宋朝這個時代的政治和軍事互相影響的結果。從宋朝立國開始，限制武官、防範武將是其軍事制度的重要特點。戰爭中鍛鍊出來的、狄青、岳飛和韓世忠等傑出將領也多被猜疑。政治上的文官治國，全社會重文輕武，使得軍人社會地位不高；宋朝軍隊尤其是禁軍的沒落，其實是宋朝皇帝自己一手造成的！是「重文抑武」惡劣風氣的直接結果！宋朝擁有舉世無雙的經濟和科技實力，卻還是亡於外患，或許是當初宋朝制定開國政策下就已經註定的結局。

圖 12 宋代由盛轉衰態樣圖



※閻宇隆繪圖

中華民國又何嘗不是猜忌、抑制軍人的制度，不尊重軍人的社會氣氛。兩蔣

<sup>161</sup> 薩孟武著：《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臺北，三民書局有限公司發行，1967年版，第127頁。

時期警政署長都由陸戰隊司令轉任，社會治安良好。換成警政系統出任署長，治安開始每況欲下。郝柏村轉任行政院長時，反對黨攻擊軍人干政，處處猜疑軍人。這和宋朝一樣，優待士大夫，永遠讓文人壓在軍人的頭上，不讓軍人掌握政權，將使台灣走上宋朝積弱不振的後塵。

## 二、宋代的軍隊組織與訓練

在《水滸傳》中常見的區分軍隊類別的兩個詞，就是「禁軍」和「廂軍」。所謂「廂軍」，是地方守備部隊，而「禁軍」則是直屬於皇帝的首都衛戍部隊。在不同的朝代，禁軍有不同的稱呼，如「虎賁」、「羽林萬騎」等……但一般都是在軍隊中所占比例不大的精銳部隊。然而，宋朝的百萬大軍之中，禁軍的編制卻佔據了絕大多數，《水滸》中所說的「八十萬禁軍」，其實一點都不誇張。由於唐朝軍權旁落，最後導致藩鎮割據與叛亂，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以此為前車之鑒，所以把幾乎全部軍隊都由皇帝直接統轄。可惜，這樣一支龐大的軍隊，卻根本沒多少戰鬥力，在平時無所事事，而戰亂時刻又無濟於事。

在宋朝前後的各個朝代，基本上採用的都是「兵役制」或「府兵制」，兵役制是用法律形式規定百姓必須無償服役，並有一定期限；府兵制是「寓兵於農」的預備役制度，既政府為府兵授予一定的耕地，平日務農，閒暇時操練，一旦有戰事時則自備武器出征。只有這兩種方式都不能滿足足夠的員額時，才會用「募兵制」作為補充——徵召雇傭兵。但是，由於在唐朝末年土地兼併現象異常劇烈，使許多失去土地的農民淪為流民或佃農（即《水滸》中所說的「莊客」），而宋朝在開國之後又沒有進行土地改革，所以府兵制根本無法實行。再加上唐末五代以來，兵源大多是招募而來，宋朝自然也繼承了以募兵制為主的徵兵方式<sup>162</sup>。

但是，宋朝的募兵制卻走了另一個極端，使軍營變成了一個大收容所。每當某地發生饑荒時，政府便將一批饑民招募為兵，以防由於饑荒而引起的變亂。然而，這是一種飲鴆止渴的手段，因為平均每名士卒的軍餉是每年十貫錢，按當時

---

<sup>162</sup> 雪域寒川著：《從《水滸》看宋代軍事弊端》，紅袖添書網站，2016年2月29日。  
<http://article.hongxiu.com/a/2007-11-19/2428690.shtml>

的價格可以買十畝耕地。

為什麼宋江會翹首以待地盼望著朝廷的招安？他為什麼會對招安信心十足？這又涉及到宋朝的另一個「慣例」了——對已經發生的暴動或民變，基本上都是採用「安撫」的態度，辦法同樣是將這些暴徒強梁招募為兵，對其首領還授以軍職，這種「招安」方式，在歷史上也是空前絕後的。

漸漸地，這些「雇傭兵」被養出了惰性。在以往的朝代，如果百姓們得知朝廷徵兵，人人逃之猶恐不及，甚至會自殘手足以避免徵召；而軍中的士卒，最大的願望就是解甲歸田。但到了宋代，情況就不一樣了——如果皇帝下令解散某支軍隊，就等於砸了那些當兵的飯碗，士卒不反了才怪呢。

禁軍們養尊處優，但戍守邊塞的任務總要有人去的，於是只好交給發配的犯人了。令犯人戍邊，在以往也曾有過先例，但依然是在宋朝才達到了高峰。為什麼《水滸》中「發配」和「充軍」是一個意義，大家都明白了吧？可是，這些充軍的犯人們自然不會死心塌地為朝廷效力，所以邊塞上的逃亡事件層出不窮，許多逃亡的犯人成了遼和西夏的內應，「充軍」簡直成為變相的「資敵」<sup>163</sup>。

面對這樣的軍隊，大概就算是孫武子再生，也未必能夠使之具有戰鬥力，而宋王朝在「招募——供養——再招募——再供養」的怪圈中根本走不出來，以至於許多部隊不得不駐紮在物產富庶的地方，並不是出於軍事防衛的需要，僅僅是因為那裡易於籌措軍糧，因此這些駐軍也被稱為「糧軍」。這樣一支臃腫且沒有戰鬥力的軍隊，正是造成「冗員、冗兵」的根本原因。而政府再將絕大多數的稅收去供養他們，「冗費」開支日益龐大，財政越來越難以負擔，終於導致「積貧」。這樣的政策、這樣的軍隊、這樣的制度，如果國家不因此而「積弱」，那反倒是怪事了。三民書局

中國從秦始皇郡縣天下後，真正的封建已經消亡。封建社會才是家中有家，國這個大家中有無數小家。皇帝對各地割據的貴族內部事務並不多加干涉，碰到外敵就像周幽王遭遇狄戎入侵一樣，用烽火召集各地諸侯來擒王。各地諸侯自己養兵，自己保衛自己，自然積極性很高，部隊也有戰鬥力。後代的皇權社會，皇帝老兒最大的擔憂是武將擁兵自重，因此處心積慮地削弱軍事將領對部隊的影

---

<sup>163</sup> 雪域寒川著：《從《水滸》看宋代軍事弊端》，紅袖添書網站，2016年2月29日。  
<http://article.hongxiu.com/a/2007-11-19/2428690.shtml>

響。——宋代和明代這方面做得最徹底，宋、明皇帝恨不得天下幾百萬兵卒只聽皇帝一個人的，而不受制於任何一個將軍，管他是岳飛、還是戚繼光或者袁宗煥，三人的悲劇也是源於此。既希望平時將兵分離，又希望打仗時將兵一體，英勇善戰。這怎麼可能呢？只有現代民主社會，真正做到軍隊國家化，文人統軍、武人治軍既能避免軍人干政，又能保證常備軍的戰鬥力。

### （一） 宋代軍隊之種類

宋代的兵制非常複雜，有禁軍、廂軍、蕃軍、鄉軍之分。維護宋代封建政權的主要軍事力量是禁軍。廂軍、鄉兵和蕃兵都是地方部隊，一般不離開本地。基本上都是募兵即職業兵，從少小當兵到60歲退伍，這樣的兵還有什麼戰鬥力<sup>164</sup>？另外一種兵就是配軍，像武松、宋江、楊志這樣犯了罪的人，刺了字進軍隊服役。這樣的兵鬧不好像牧野之戰的紂王部隊一樣，給你來個反戈一擊。謹就各性質分述如後：

#### 1. 禁軍：

維護宋代封建政權的主要軍事力量是禁軍。保衛京城、戍守邊境、對外作戰、對內鎮壓人民，主要是依靠禁軍。禁軍原來是皇帝的衛兵。十年砍柴(李勇)在《官軍為何不如民團》一文中說明：

禁軍的名稱始於唐代，當時數量很少。五代的皇帝許多是由節度使爬上來的。他們登上了皇帝的寶座以後，往往把他們原來統率的軍隊調到中央當禁軍，作為自己的親兵。後樑朱溫時，已經有「侍衛親軍」的名號。到了後漢，侍衛親軍的統帥——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就握有很大的權力。後周柴榮為了加強中央的權力，除了保留侍衛親軍以外，又下令各地選募壯士到開封，由當時任殿前都虞候的趙匡胤挑選武藝高強的編為殿前諸班，也作為禁軍，而且比侍衛親軍更見信用<sup>165</sup>。

宋代在首都設殿前司，置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各一人，其職掌據《宋史·職官志補正六》說：「掌殿前諸班直及步騎諸指揮之名籍，凡統制、訓

<sup>164</sup> 十年砍柴著：《閒看水滸：字縫裡的梁山規則與江湖世界》，山西，人民山版社，2010年11月20日，第78頁。

<sup>165</sup> 十年砍柴著：《閒看水滸：字縫裡的梁山規則與江湖世界》，山西，人民山版社，2010年11月20日，第79頁。

練、番衛、戍守、遷補、賞罰，皆總其政令<sup>166</sup>。」五代後周時，本設有都點檢、副都點檢之官，位在都指揮之上，因為趙匡胤在北周時任過「都點檢」，故即位之後不復置。

## 2. 廂軍：

就是些雜七雜八的地方部隊，他們並不歸軍事首領統帥，而是由當地的文官如知府管理，而文官是流官，常常調換的。平時不修戰備，純幹些地方的建設專案，如蘇東坡至杭州時，浚西湖修蘇堤的主力是當地的廂兵，有些地方部隊還經商，如《水滸》中的張團練就是「快活林」的後臺老闆。這樣的部隊，只有到了戰時，才臨時徵調稍加訓練就上前線，戰鬥力就會有所限制。

## 3. 蕃軍：

是外籍兵團，也可說是邊塞上的鄉兵，為內屬的外族組織而成。《隨唐宋史》說明：「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之兵也<sup>167</sup>」。《宋史·兵志》又說：「具籍塞下，團結以為藩籬之兵，其後即分隊伍，給旗幟，繕營堡，備器械，一律以鄉兵之制<sup>168</sup>。」蕃兵以西北地區為多，西北邊疆的羌戎種落，不相統一，政府對其附塞者施以軍事組織，給以旗幟器械，使其守邊，一切制度與鄉兵相同。鄉兵和蕃兵，只限少數地區才有，廂兵雖遍佈各州，但也缺少校閱，真正合標準的兵，只有禁兵。

## 4. 鄉軍：

就是由宋朝地方機構組織的民兵。十年砍柴(李勇)在《官軍為何不如民團》一文中說明：

鄉兵其實就是臨時招募的普通農民或獵戶，以戶為單位，抽選壯丁參加。是沒有固定軍餉的，一般也不參戰，甚至連武器等經費都是地方官府自己籌措的。大部分時間務農生產，農閒時則集結訓練，無論是編制還是訓練都無法保證。而且宋朝皇帝以及官僚向來極端不信任民眾怕其造反，因此鄉兵的裝備和給養差到無法想像的地步——普通的生鐵刀槍和狩獵用的弓箭都是好貨，官軍用精鋼刀矛、強弩硬弓和大炮則是不敢想像的奢侈品。因此其戰鬥力可想而知。但問題在於，鄉兵都是在本鄉本土作戰，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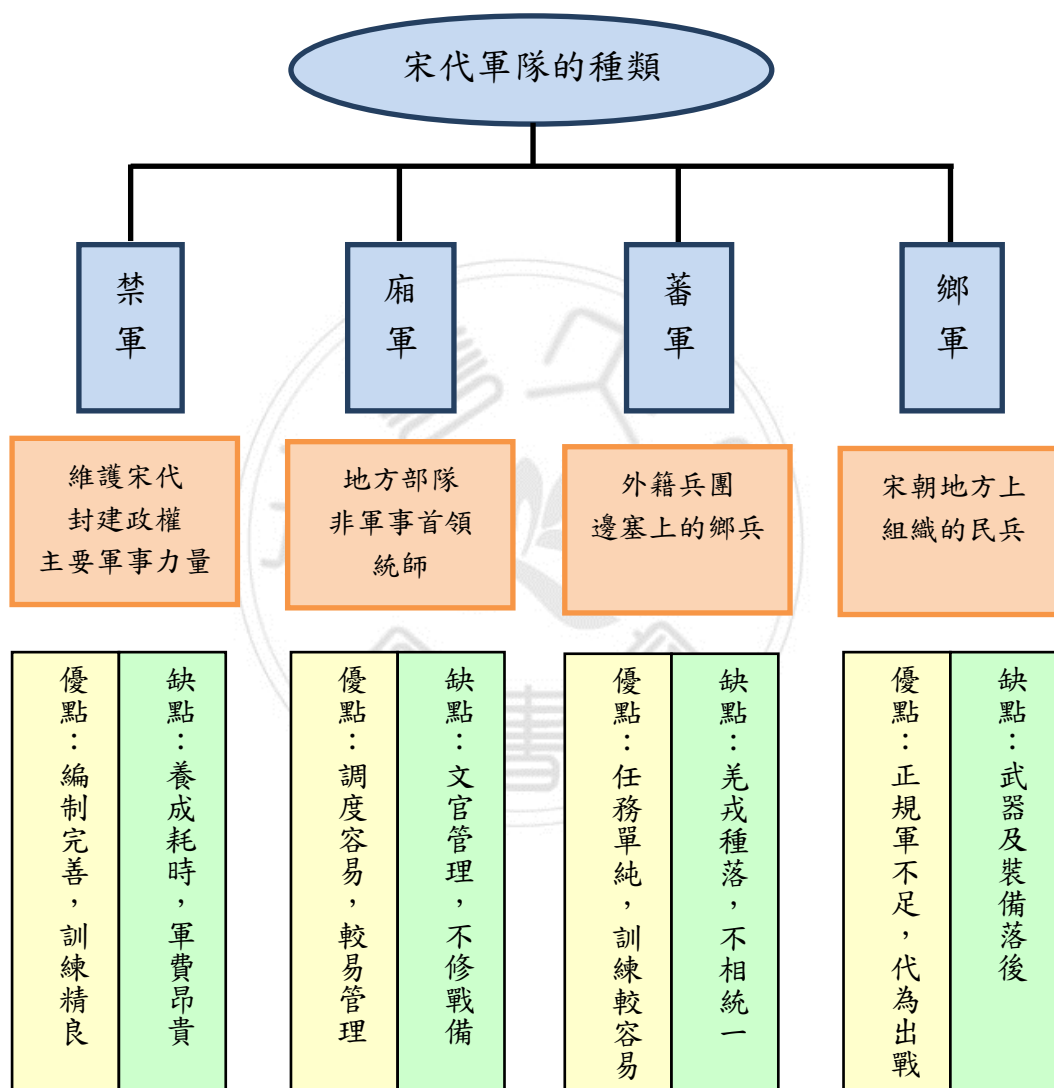
<sup>166</sup> 龔延明著：《宋史職官志補正(下)》，臺北，中華書局發行，2009年8月1日版，卷166。

<sup>167</sup> 張豈之主編：《隨唐宋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發行，2002年，348頁。

<sup>168</sup> 龔延明著：《宋史職官志補正(上)》，臺北，中華書局發行，2009年8月1日版，卷140。

當地地形、氣候環境非常熟悉。加上戰場就在家鄉，親人家產就在身邊。自己是在抗擊外賊守土保家，因此往往能發揮出意想不到的戰鬥力。因此在某些極端情況下，宋朝朝廷也會用鄉兵出戰。一旦如此，鄉兵就開始接收朝廷發放的武器和軍餉、糧草。即民兵，並非國家的正規軍。<sup>169</sup>

圖 13 宋代軍隊的種類分析圖



※閻宇隆繪圖(參考黃仁宇著：《中國大歷史》，臺北，聯經出版社，1993年版，154頁)

## (二) 宋代軍隊之訓練

<sup>169</sup> 十年砍柴著：《閒看水滸：字縫裡的梁山規則與江湖世界》，山西，人民山版社，2010年11月20日，第81頁。



軍隊，作為國家政權的工具，承擔著保衛國家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和國家安全的重任。為了能有效地提高軍隊的戰鬥力，在未來的戰爭中剋敵制勝，古代統治者十分重視軍隊的日常訓練，積極練兵和備戰，即「養兵千日，用兵一時」。

北宋初年，為了剷除地方割據勢力，加強中央集權的統治，宋太祖趙匡胤令天下各州郡選送體格健壯、勇敢善戰者從軍，編為禁軍。為此，他還「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儘管地方軍事長官已對這些被選入禁軍的士兵進行了訓練，但宋太祖還要經常親臨校場，親自指導訓練。對訓練中發現的「非才勇絕倫」者，立即淘汰，改充其他軍種。校場訓練的內容包括模擬實戰的激烈性對抗比武。

中國古代的軍事訓練的方式。袁庭棟在《解秘中國古代軍隊》一文中說明：

如「打毬（球）」，宋代將打毬分為步打、馬擊兩種形式，直接對抗和間接對抗兩種競技方式。一種是於球場東、西兩側，各豎木為球門，高丈餘。打毬的士兵分為兩朋，每朋十餘人，兩朋隊員分著不同顏色的服裝，通過相互傳遞，將球擊入對方的球門。這種競技十分激烈，「交爭競逐，弛突喧鬧，或略地以丸走，乍陵空似月圓。」另一種是於球場中央豎一球門，兩朋隊員各布列於球門一側，通過本朋隊員相互傳遞，由「毬頭」（即主力隊員）將球踢過球門上方的「風流眼」<sup>170</sup>。

對方則以同樣的方式，再將球踢回對方場地。宋代將原軍中的「打毬」遊戲作為一種軍事訓練的方法，就在於這種遊戲具有很強的對抗性和技巧性，既可以增強士兵的對抗意識和合作精神，還有助於增強士兵的體魄和靈巧性。

宋代是由皇帝直接掌握軍隊的建置、調動和指揮大權，其下兵權三分：樞密院為最高軍政機關，負責戰略決策、處理日常事務，招募、調遣軍隊，長官稱樞密使。三衙分掌全國軍隊的最高指揮權力，其全名是殿前都指揮使司、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司、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司。各設都指揮使為長官，地位低於樞密院。樞密院與三衙分握發兵權和管兵權，互相牽制。帥臣儘管平時有所統轄部隊，但戰時由皇帝臨時派遣，率兵出征，事定之後，兵歸三衙。《宋史·職官志補

<sup>170</sup> 袁庭棟著：《解秘中國古代軍隊》，山東，畫報出版社，2007年9月1日，第157頁。

正二》：

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得專制，此所以百三十餘年無兵變也<sup>171</sup>。

種制度對削弱唐藩鎮割據以來的兵禍，保障社會安定確有貢獻，但同時也造成了互相掣肘、效率低下、軍隊戰鬥力低下的弊端。

大陸遼寧師範大學王鵬程教授在《從《水滸傳》「四大奸臣」看北宋的中央官制》一文中說明：

- 1.樞密院：首長為樞密使，與中書令號稱「二相」，職責全國軍事。「掌軍國機務，兵防、邊備、戎馬之政令，出納密令，以佐邦治。凡侍衛諸班直，內外禁兵招募、試閱、遷補、屯戍、賞罰之事，皆掌之。」樞密院典掌軍國機務，出納密命，但尚書省仍有兵部管軍政，故樞密院可視為現代之參謀本部。
- 2.殿前、侍衛司：為宋代掌管禁軍的最高指揮機構。北宋初年，改後周禁軍殿前、侍衛二司之制，分設殿前都指揮使司(簡稱殿司、殿前司)、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司(簡稱侍衛馬軍司、馬司)和侍衛親軍步軍指揮使司(簡稱侍衛步軍司、步司)，合稱「三衙」或「三司」。三衙互不統屬，鼎足而立，直接聽命於皇帝。雖為統兵機構，但各衙只設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和都虞侯等。三衙的長官分稱殿帥、馬帥、步帥，合稱「三帥」，並分別掌管所屬諸軍<sup>172</sup>。

再觀現代我國之軍隊編組及訓練，讓人感到一代不如一代，從抗戰時的軍團、軍、師、旅、營到連等編組，雖因時代變遷，台灣的軍事體制，到2002年3月1日改革以後，軍隊必須縮編；至今只有旅、營到連等編組，但訓練是不會縮，可是現今連軍隊訓練都大不如前。國防部曾下令氣溫超過31度不准出操；

<sup>171</sup> 龔延明著：《宋史職官志補正(下)》，臺北，中華書局發行，2009年8月1日版，卷162。

<sup>172</sup> 王鵬程著：《從《水滸傳》「四大奸臣」看北宋的中央官制》，遼寧，師範大學文學院〈期刊論文〉，2012年04期，98頁。

體能訓練跑步五千公尺變三千公尺，軍隊戰力已大幅衰退。宋朝與現今情況相同，都是人為因素，但仍有差異。宋代是皇帝怕軍人政變，得其帝位；現代軍人是上位者怕部屬部出事，影響其官位，洪仲丘命案就是最典型例子，我們國軍應朝向部隊正常的訓練，以及研擬如何免於政治性的壓制或脅迫，以提升戰鬥力維護國家安全。

## 第二節 宋代官僚

### 一、中央官僚權勢

朝政治體制的主要特點是加強中央集權，在職官制度上，中央集權、百官權力分散、重文輕武。宋朝官制，以元豐改制為界限，改制前、後各為一階段，南宋又為一大階段。宋代設中書、樞密、三司分掌政、軍、財三大務，宰相之權為樞密使、三司使所分取。宰相、樞密使、三司使三者的事權不相上下，不相統攝。中樞官制是中央集權的軸心，官稱和實職的分離，使朝廷內外大批官員無所事事，三省六部多有更迭，握有最高行政權者是「宰執」。宋代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基本上消除了造成封建割據和威脅皇權的種種因素。為了防範文臣、武將、女後、外戚、宗室、宦官等六種人的專權獨裁，宋朝廷制訂出一整套集中政權、兵權、財權、司法權等各種制度。可以說，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加強是從宋代逐步發展的。

#### （一）中央政制

宋代的中樞機構，真正握有最高行政權者是「宰執」。所謂「宰執」，即宰相與執政之統稱。宋代的宰相稱中書門下平章事，副職稱參知政事。參知政事也稱為「執政」，這是趙匡胤為牽制宰相而設置的。中央官職機構分為三省六部，為方便區分，參考龔延明著：《宋代官制辭典<sup>173</sup>》調製表格如下：

<sup>173</sup> 龔延明著：《宋代官制辭典》，臺北，中華書局出版，2013年9月1日，第257頁。

表 2 宋代中央機構分析表

區分	職官性質			職權
	門下省 (左省)	主管	門下侍中	1. 委任，長官名義上是 2. 上有名無職。
	副主管	門下侍郎	委派一名給事中任「判門下省事」真正掌管本省的職權。	
中書省 (右省)	主管	中書令	實際上也有名無職。	主管郊祀、皇帝冊文、州縣官考課、齋郎等年滿複奏、文官改賜章服、僧道給賜紫衣師號、舉人出身及寺觀名額等事。
	副主管	中書侍郎	委派一名中書舍人任「判中書省事」，真正掌管本省職權。	
<p>※門下和中書兩省的左、右散騎常侍，左、右諫議大夫，左、右司諫，左、右正言，通稱「兩省官」。門下省的起居郎和中書省的中書舍人稱「小兩省官」。散騎常侍、給事中、諫議大夫等稱「大兩省官」。北宋前期，大兩省官員雖名為諫官，但除非皇帝特旨供職，並不得諫諍。</p>				
尚書省 (都省)	主管	尚書令	實際上另外委派諸司三品以上者或學士一員任「權判尚書都省事」。	<p>1. 總轄吏、戶、禮、兵、刑、工等六部和司封、司勳、考功、度支等二十四司，並主管議定官員諡號、祠祭、受誓戒、在京文武官封贈、注甲發付選人、二十四司人吏遷補等事。</p> <p>2. 所轄六部二十四司，分屬左司和右司，左司掌管吏部（下轄司封、司勳、考功）、戶部（下轄度支、金部、倉部）、禮部（下轄祠部、主客、膳部）；右司掌管兵部（下轄職方、駕部、庫部）、刑部（下轄都官、比部、司門）、工部（下轄屯田、虞部、水部）。左、右司各設郎中 1 人，員外郎 1 人。</p>

宋代中央官職機構

宋代中央官職機構(六部)	區分	職官性質			職權
	吏部	主管	判流內銓事	專管考試選人、判決案例和擬定差遣等事。	負責對東西頭供奉官等武臣的考課和擬定差遣等事。太宗時，設立磨勘京朝官院和磨勘幕職州縣官院，總稱磨勘院，負責對京朝官和選人進行考核。隨後，改磨勘京朝官院為「審官院」、磨勘幕職州縣官院為「考課院」。太宗時還設置「京朝官差遣院」，負責對少卿監以下京朝官注擬差遣。
	戶部	主管	判戶部事	接受各地土貢，至時陳列於殿廷。	戶部主管全國戶籍、土地、錢穀的政令以及貢賦、征役等事。設戶部尚書一員，左、右曹侍郎各一員。左曹分管戶籍、稅賦、土貢、征權等事，右曹分管常平、免役、保甲、義倉等事。度支掌管全國財政預算，量入而出；金部掌管全國的貨幣收支，藏於府庫；倉部掌管倉庫貯積和收支等事。
	禮部	主管	判禮部事	掌管科舉，奏補太宙齋郎等事。	掌管科舉，奏補太宙齋郎等事。神宗時，撤銷太常禮院，其職權劃歸禮部。禮部設尚書、侍郎各一員，郎中、員外郎各一員。禮部下設祠部、主客、膳部等三司。掌管禮樂、祭祀、朝會、宴享、學校、科舉之政令。
	兵部	主管	判兵部事	掌管皇帝儀仗、鹵簿、武舉、義勇弓箭手等事。	神宗時設兵部尚書、侍郎各一員，職方、駕部、庫部和本部等四司郎中、員外郎各一員，職權略有擴大，主管民兵、弓手、廂軍、蕃兵、剩員，武士校試武藝，及少數民族官封承襲等事。
	刑部	主管	刑部尚書	主管全國刑政，並審複大理寺所定大辟案件。	太宗時，創設審刑院，將刑部審複權撥歸審刑院，審刑院成為全國另一最高司法機構。神宗時，撤銷審刑院以及糾察在京刑獄司，將其審複等權歸還刑部，從此，刑部的職權大為擴大，主管全國刑法、獄訟、奏讞、赦宥、敘復等事。
	工部	主管	判工部事	所屬屯田、虞部、水部的職權全被劃歸「三司」，工部職權很少。	神宗官制改革時撤銷「三司」，工部才恢復職權。南宋時，將軍器監和都水監並歸工部，工部的職權就更為擴大了。工部還兼管軍器所和文思院。

薩孟武在《中國社會政治史》一書中，將宋代中央官制列表如下<sup>174</sup>：

表 3 宋代中央官制列表

機關	職掌	職官	權限	元豐改制前	元豐改制後	南渡後
中書省	掌進擬庶務，宜奉命	中書令	掌佐天子議大政，授所行命令而宣之	國朝未曾真拜，以他官兼領者不預政事	因官高不除人，以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行令之職	孝宗乾道八年置左右丞相，省令不置
		中書侍郎	掌貳令之職，參議大政授所詔旨而奉之	置	別置侍郎，以佐右僕射之行中書令之職	孝宗乾道八年置參知政事，省中書侍郎不置。
此外尚有右散騎常侍，右諫議大夫，右司諫，右正言同掌規諫諷諭，凡朝政闕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事有違失，皆得諫正。又有中書舍人，凡事有失當及除授非其人，則論奏封還詞頭。						
三省	受天下成事審命，駁正違失	侍中	掌佐天子議大政，審中外出納之事	國朝以秩高罕除，雖有用他官兼領而實不任其事	因官高不除，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行侍中職	孝宗乾道八年置左右丞相，省侍中不置
		門下侍郎	掌貳侍中之職，省中外出納之事	置	別置侍郎，以佐左僕射之行侍中職	孝宗乾道八年置參知政事，省門下侍郎不置
此外尚有左散騎常侍，左司諫，左正言，與中書省同。又有給事中，若政令有失，除授非其人，則論奏而駁正之。南渡後，罷門下省不置，乃另置一局以處左右諫官（見歷代職官表卷十九都察院下，引王應麟玉海）。給事中則與起居郎同為掌記天子言動之官。						

<sup>174</sup> 薩孟武著：《中國社會政治史》，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1995年版。



機關	職掌	職官	權限	元豐改制前	元豐改制後	南渡後
三省	尚書省	尚書令	掌佐天子議大政，奉所出命令而行之	自建隆以來不除惟親王元佐元儼以使相兼領，不與政事	虛設其名，無有除者	南渡後不置
		左右僕射	掌佐天子議大政，貳令三省長官皆為宰相之任	置	自官制行，不置侍中中書令，以左右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行侍中中書令職事	孝宗乾道八年置左右丞相，省僕射不置
		左右丞	掌參議大政，通治省事，以貳令僕射之職	置	置	南渡後，置參知政事，省左右丞不置
有六部，曰吏部，曰戶部，曰禮部，曰兵部，曰刑部，曰工部。每部除本司外，又各置三曹，即與隋唐各部四曹相似。宋初，天子財計歸之三司，戶部無職掌。而兵政總於樞密使，武選屬於吏部，兵部亦同虛設。他如禮部，權分於鴻臚與光祿，工部之權分於將作與都水。據文獻通考(卷五十二職官志六)，宋除吏部外，不置尚書，只置判部事一人或二人。						
樞密院	掌軍國機務，備兵防邊，出納政令，以佐邦治	樞密使	佐天子執兵政	慶曆中，二邊用兵，令宰相兼樞密使	不復兼	或兼或否，至開禧，以宰臣兼使，遂為永制
	有副使為使之貳。不置使，則有知院事，同知院事為之貳。苟其人資淺，則用直學士簽書院事，同簽書院事。					
三司使	總國計，應四方之貢賦，朝廷不預，一歸三司，號曰計省	三司使	掌邦國財用之大計，總鹽鐵度支戶部之事，以經天下財賦而均其出入焉，位亞執政，目為計臣	置	罷三司使，併歸戶部	無
	鹽鐵掌天下山澤之貨，關市河渠軍器之事，以資邦國之用。度支掌天下財賦之數，每歲均其有無，制其出入，以計邦國之用。戶部掌天下戶口稅賦之籍權酒工作衣儲之事，以供邦國之用。					

機關	職掌	職官	權限	元豐改制前	元豐改制後	南渡後
御史臺	掌糾察官邪肅正綱紀，大事則廷辨，小事則奏彈。	御史中丞	為臺主	置	置	置
	御史大夫宋初不除正員，止為加官，御史臺之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一人掌貳臺政。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二人，掌以儀法，糾百官之失。三曰察院，監察御史六人，掌分察六曹及百司之事，糾其謬誤，大事則奏劾，小事則舉正。					
此外尚有九寺五監。太宗時羅處約言：「九寺三監(當時只有國子少府將作三監)，多為冗長之司，雖有其官，不舉其職」(宋史卷四百四十羅處約傳)。九寺，即太常寺，宗正寺，光祿寺，衛尉寺，太僕寺，大理寺，鴻臚寺，司農寺，太府寺，或置卿一人，或置判寺事一人或二人。五監即國子監，少府監，將作監，各置判寺一人。軍器監，國初戎器之職領於三司胄曹案，官無專職。元豐正名，始置監一人。都水監舊隸三司河渠案，元豐正名，置使者一人。						

作家陳茂同著《中國歷代職官沿革史<sup>175</sup>》一書道，宋代宰相制度大體有五次變動，摘述如下：

第一次是北宋初，宋神宗元豐以前。這時期的變化情況。名義上與唐代沒有什麼不同，但掌政、軍、財三大務，宰相之權為樞密使、三司使所分取。宰相、樞密使、三司使三者的事權不相上下，不相統攝。宰相之權既已分削，又設參知政事互為牽制實際上卻有很大區別。主要在於宋代設中書、樞密、三司分，相權益弱，而皇權卻由此加強。另一方面的變化是，中樞機構中三省制已進入衰落荒廢的階段。職權的轉移，是三省制消亡的先聲。第二次是宋神宗元豐五年（西元 1082 年）開始的官制改革，史稱元豐改制。元豐改制撤銷中書門下，恢復唐初三省制度，置三省長官——尚書令、中書令和門下侍中。不過，這三個官位只是虛設，從不授人。又仿照唐制，用尚書左仆射、右仆射代行尚書省的職權；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代行中書令的職權，他們是正宰相。這時，參知政事的名稱被取銷，而增設了

<sup>175</sup> 陳茂同著：《中國歷代職官沿革史》北京，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 年版，第 308 頁。



四名副宰相，即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右丞。

第三次是宋徽宗政和年間(西元1111—1118年)，蔡京任宰相，自稱「太師」，總領門下、中書、尚書三省之事，改尚書左、右仆射為「太宰」、「少宰」，由太宰兼門下侍郎，少宰兼中書侍郎。欽宗靖康年間，又廢除太宰和少宰，改為尚書左仆射和右仆射。

第四次是南宋高宗建炎三年(西元1129年)，正式以左仆射和右仆射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正宰相，又將門下侍郎和中書侍郎改為參知政事，為副宰相。還取消尚書左、右丞的官稱，大體上恢復了宋初的制度。

第五次是孝宗乾道八年(西元1172年)，又改左、右仆射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左、右丞相，參知政事照舊。除去中書令、侍中、尚書令的虛稱。門下並入中書，稱中書門下。左右宰相主中書事，兼尚書省之長，六部直屬於宰相，尚書省之制已廢於無形，實際上這也是三省合一。從此，左右宰相成為全國最高的行政長官，尚書省只掌握六部，奉命執行政務。當時大臣虞允文、梁克家為首任左、右宰相並兼樞密使。

宋代宰相官名經過多次變更，薩孟武在《中國社會政治史<sup>176</sup>》一書中，也將宋代三省長官更置制列表，讓讀者更清楚宋代官制名稱，更置表如下：

表 4 宋代官制名稱

省名	官名	職掌	前後更置			備考
			元豐改制前	元豐改制	南渡後	
門下省	侍中	掌佐天子議大政，審中外出納之事	以秩高罕除，雖有用他官兼領，而實不任其事	以官高不除人，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行侍中職	置左右丞相，省侍中不置。	據續通考，宋南渡後，不置門下省
	門下侍郎	掌貳侍中之職，省中外出納之事	置	別置侍郎，以佐左僕射。	置參知政事，省門下侍郎不置。	
中書省	中書令	掌佐天子議大政，授所宣之。	未曾真拜，以他官兼領者，不預政事。	以官高不除人，以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行令之職	置左右丞相，省令不置	其屬有六部，曰吏部，曰戶部，曰禮部，曰兵部，曰刑部，曰工部
	中書侍郎	掌貳令之職，參議大政，授所宣詔旨而奉之。	置	別置侍郎，以佐麵號僕射。	置參知政事，省中書侍郎不置。	
省名	官名	職掌	前後更置			備考
			元豐改制前	元豐改制	南渡後	

<sup>176</sup> 薩孟武著：《中國社會政治史》，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1995年版，166頁。

尚書省	尚書令	掌佐天子議大政，奉所行之命。	自建隆(太祖)以來不除，惟親王元佐元斂以使相兼領，不與政事。	虛設其名，無有除者。	並省不置	其屬有六部，曰吏部，曰戶部，曰禮部，曰兵部，曰刑部，曰工部
	左右僕射	掌佐天子議大政，與三省之職。	置	自元豐官制行，不置侍中中書令，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行侍中中書令職事。政和中，改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以太宰兼門下侍郎，少宰兼中書侍郎。靖康元年復為左右僕射。	置	
	左右丞	掌參議大政，通治省事，以貳令僕射之職。	置	置	復置參知政事，省左右丞不置	

## (二) 梁山泊時期中央權勢

《水滸傳》的故事發生在北宋末年徽宗時期，當時朝中奸臣當道，社會動盪。宋江、林沖，楊志等許多好漢雖想為朝廷效力，無奈官逼民反，只能落草為寇。皇帝昏聩固然是造成政府暗弱的一方面原因，但更多是北宋中央政治制度的問題。和其他朝代相比，北宋的政治制度是相當複雜的。大陸遼寧師範大學王鵬程教授在『從《水滸傳》「四大奸臣」看北宋的中央官制<sup>177</sup>』一文中說明：

從地域上來講，北宋政權雖然建立，但當時在南方和北方，還存在著南唐、吳越、漳泉、南漢、後蜀、北漢等八九個割據政權。在北宋內部還有不少節度使，他們割據一方，既有土地，又有人民、甲兵和財賦。為了鎮壓人民的反抗和防止割據勢力的再起，宋太祖趙匡胤制訂出一整套以集中政權、財權、兵權等制度來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sup>178</sup>。

### 1. 二府制

<sup>177</sup> 王鵬程著：《從《水滸傳》「四大奸臣」看北宋的中央官制》，遼寧，師範大學文學院〈期刊論文〉，2012年04期，99頁。

<sup>178</sup> 王鵬程著：《從《水滸傳》「四大奸臣」看北宋的中央官制》，遼寧，師範大學文學院〈期刊論文〉，2012年04期，101頁。

宋朝中樞機構為「二府制<sup>179</sup>」，即設中書門下和樞密院兩個機構。「中書門下」是宰相辦公的地方，又稱「政事堂」，印文行敕曰「中書門下」，平時簡稱「中書」。北宋初年，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簡稱「同平章事」）為宰相，而以參知政事為副相。參知政事也稱為「執政」，這是宋太祖趙匡胤為牽制宰相而設置的。文學家、政治家范仲淹就曾任參知政事，《水滸傳》第一回亦提到。所以真正握有最高行政權者是「宰執」。所謂「宰執」，即宰相與執政之統稱。參知政事地位的提高，是宋代統治者削弱宰相之權，並使之與宰相互相牽制，從而加強皇權的重要措施。

元豐改制後，以「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行侍中事，為首相；以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行中書令事，為次相」。撤銷中書門下，恢復唐初三省制度，置三省長官——尚書令、中書令和門下侍中。不過這三個官位只是虛設，從不授人。這時，參知政事的名稱被取消，而增設了四名副宰相，即「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右丞」。

北宋徽宗時期，蔡京先後四次任相，共達十七年之久，並自稱「太師」，太師多為大官的加銜，無實際的職權。蔡京在任上大肆貪污，搜刮民脂民膏。

《宋史·奸臣傳二》記載：「京既貴而貪益甚，已受僕射奉，複創取司空寄祿錢，如粟、豆、柴薪與僉從糧賜如故，時皆折支，亦悉從真給，但入熟狀奏行，帝不知也<sup>180</sup>。」

蔡京權勢最盛時曾任「太師總領三省事」，但這種稱號只是權臣耍弄權術的一種伎倆，並非宋朝常制。樞密院產生於唐朝，分為左、右內樞密使，向由宦官擔任。唐朝後期的樞密院是在三省之外複有一省，內樞密使是在宰相之外複有宰相，是正常國家機構之外的多餘機構，是君主專制制度下宦官擅權的產物。唐末朱溫在奪取政權之前，把掌握朝廷實權的宦官殺掉，改用文士為樞密使；同時使樞密使由全面掌權改變為專管軍事。宋代中書門下與樞密院共掌文、武大權，稱為東、西「二府」。《宋史·職官志二》提到：「宋初，循五代之制，置樞密院，與

<sup>179</sup> 王鵬程著：《從《水滸傳》「四大奸臣」看北宋的中央官制》，遼寧，師範大學文學院〈期刊論文〉，2012年04期，98頁。

<sup>180</sup> 龔延明著：《宋史職官志補正》，臺北，中華書局出版，2009年8月1日。

中書對掌文、武二柄，號為「二府」。<sup>181</sup>』《文獻通考·職官考<sup>182</sup>》記載：

唐末，諸司使皆內臣領之，樞密使始與宰相分權矣。降及五代，改用士人，樞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其權重于宰相。太祖受命，以宰相專主文事，參知政事佐之，樞密使專主武事，副使佐之。

樞密院長官的官稱，宋初為樞密使和樞密副使，或稱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簽書（署）和同簽書樞密院事。元豐改制，專用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等官稱。宋朝的樞密使、知樞密院事照例用文人充任，副職有時用武人，充分體現了重文輕武的政制特點。但是北宋的樞密使與中書的關係極不正常。南宋王明清在《揮塵錄·後錄<sup>183</sup>》談道：「樞密使每朝奏事，與中書先後上，所言兩不相知，以故多成疑貳。」明確指出這種互相牽制所造成的殆誤軍國大政的弊端。

《水滸傳》中另一位奸臣童貫出身宦官，《宋史·宦官列傳三<sup>184</sup>》說：「（童貫）狀魁梧，偉觀視，頤下生須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閹人。」從外表上看童貫陽剛之氣十足，不像是閹割後的宦官。可能和他年近二十歲才淨身有關。徽宗政和元年（西元 1111 年）童貫領樞密院，從此手握重兵，位列三公，因此童貫也是中國歷史上掌控軍權最大的宦官。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中央機構的「二府制」中，宰相主持政事，樞密使掌兵，一旦奸臣當道，國家很難對其進行有效制約，權傾朝野蔡京和童貫狼狽為奸，國家必然是一片混亂。

## 2. 高俅與三衙

在作家王鵬程著《從《水滸傳》「四大奸臣」看北宋的中央官制<sup>185</sup>》一書中有對高俅與三衙的介紹：

《水滸傳》中「四大奸臣」的官職，對高俅和楊戩的描寫與史實有一定出

<sup>181</sup> 龔延明著：《宋史職官志補正》，臺北，中華書局出版，2009年8月1日。

<sup>182</sup> (宋)馬端臨著：《文獻通考》，浙江大學圖書館，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卷54〈職官〉8。  
<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res=881>

<sup>183</sup> (宋)王明清著：《揮塵錄》，凡二十卷。分前錄四卷、後錄十一卷、三錄三卷、餘話二卷，記載宋代典章制度、軍事、政治，又及官僚文人軼聞，兼論詩文。

<sup>184</sup> 王鵬程著：《從《水滸傳》「四大奸臣」看北宋的中央官制》，遼寧，師範大學文學院〈期刊論文〉，2012年04期，101頁。

<sup>185</sup> 王鵬程著：《從《水滸傳》「四大奸臣」看北宋的中央官制》，遼寧，師範大學文學院〈期刊論文〉，2012年04期，102頁。

入，楊戩在《水滸傳》中筆墨最少，為人卻最是心狠手辣，宋江、盧俊義便是被他獻計鳩死。

歷史上楊戩也曾在徽宗財政危機時獻計，創辦了「公田所」，將所有權不明確的土地全部納為政府所有，用一種變著法子搜刮民間良田的方式來減輕財政危機。楊戩在《宋史》中還專門有列傳，據《宋史·宦官列傳三<sup>186</sup>》記載：

（戩）自崇寧後，日有寵，知入內侍省。立明堂，鑄鼎彝、起大晟府、龍德宮，皆為提舉。政和四年，拜彰化軍節度使……曆鎮安、清海、鎮東三鎮，由檢校少保至太傅……宣和三年，戩死，贈太師、吳國公。

宋代以朝臣出任知州、知府，所封節度使一般不赴本州府治理政事。楊戩受封的三鎮節度使更多是一種榮譽性的虛銜，禮遇優厚。後官至太傅，位列三公之一，正一品位。《水滸傳》前期楊戩沒有出現，在徽宗朝晚年梁山泊勢力鼎盛時期，宦官楊戩才粉墨登場，官拜太尉兼樞密院副使，《宋史》中並無此記載。

《水滸傳》對高俅的描寫最多，刻畫也最深刻。其勾結奸佞，培植黨羽，組織軍隊多次進剿梁山，梁山招安後還設計陷害宋江等人。

《水滸傳》第二回，徽宗抬舉高俅做殿帥府太尉，掌控國家正規軍禁軍，80萬禁軍教頭王進、林沖都是他的下屬，身為制使的楊志也是他的部下，而且高俅能節制10個節度使征討梁山，似乎高俅的殿帥府是實際掌控統兵權的<sup>187</sup>。

但宋史中並無殿帥府這一建制，當然也不存在殿帥府太尉一職。宋代「太尉」乃是宋代對武將和統兵文官的尊稱。

高俅在歷史上實有其人，但是史書上對這個人記載不詳。《宋史》中沒有高俅傳記。王明清的《揮塵後錄<sup>188</sup>·卷七》記載：

高俅者，本東坡先生小史，草劄頗工……值王在園中蹴鞠，俅候報之際，睥睨不已，王呼來前詢曰：「汝亦解此技邪？」俅曰：「能之。」漫令對蹴。遂愜王之意，大喜……逾月，王登寶位。上俊寵之，……數年間建節，循

<sup>186</sup> 龔延明著：《宋史職官志補正》，臺北，中華書局出版，2009年8月1日。

<sup>187</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年版，23頁。

<sup>188</sup> 《揮塵後錄》一書是宋代王明清（西元1127~1214年）所著之筆記小說，為《前錄》的續編，成書于南宋光宗紹熙五年（西元1194年），仍以雜記宋代朝野故實為主，原書六卷，後世版本則析為十一卷，為紹熙甲寅武林官舍中所記。

至使相，遍歷三衙者二十年。鎮殿前司職事，自佖始也。

史上高俅的官職應該是三衙中的殿前司的都指揮使。三衙是宋代掌管禁軍的機構，三衙是指殿前都指揮使司（殿前司），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司（侍衛馬軍司）和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司（侍衛步軍司）。五代後樞開始設置侍衛親軍，後晉時成為皇帝親兵的總稱。後周另設殿前司，擴充其軍力，形成與侍衛親軍司對峙的「兩司」。北宋初期，又將侍衛親軍司分成馬軍司和步軍司，形成三衙，互不統屬。各設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和都虞侯，作為三衙統兵官。三衙管轄全國的禁軍，侍衛馬、步軍司還在名義上管轄各地的廂軍。宋朝一般用文臣主持的樞密院與三衙互相牽制，實行以文制武。「三衙」與樞密使所掌之兵權不同：樞密使有發兵之權，而無統兵之重；三衙有統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三衙又各統一部分兵力，以便互相制約，其目的是為提高和鞏固皇權，防止兵變。

楊志在東京做過殿前司制使官，制使在宋代是殿前司所屬下級軍職，級別要高於林沖。書中寫道：楊志丟失了花石綱之後，挑了一擔錢物，想帶回東京去樞密院打點關係。事實上三衙和樞密院是兩個不同的系統，楊志作為三衙系統的軍官，是高俅的手下，樞密院無任命權。《水滸傳》中醜郡馬宣贊任衙門防禦使保義，歸侍衛步軍司統領。

施耐庵在書中雖然改了高俅的官號，權力卻沒有變，羞辱王進，誣陷林沖，逼走楊志，三人皆因為受高俅管制這才忍氣吞聲。朝中奸臣沆瀣一氣，把持朝政，成為大宋王朝的一種悲哀，這種怪異現象是北宋末年朝綱腐敗的一道獨特的風景。

### 3. 三司與三省六部

在《水滸傳》中，「三省六部<sup>189</sup>」的官員幾乎沒有被提到，這也反映出三省六部在宋朝時期逐漸被邊緣化的事實。雖然三省名義始終存在，但是已經混同為一省。同時由於樞密院、三司的設立，宰相的軍權、財權被剝奪，三省制度名存實亡。

北宋設立的三司使是「三省六部」職權遭到削弱的重要原因。宋初沿舊制，三司總理財政，成為僅次於中書、樞密院的重要機構，號稱「計省」，三司的長

<sup>189</sup> 王鵬程著：《從《水滸傳》「四大奸臣」看北宋的中央官制》，遼寧，師範大學文學院〈期刊論文〉，2012年04期，102頁。

官三司使被稱為「計相」，地位略低於參知政事。宋太宗時，罷三司使，另設鹽鐵、度支、戶部三使。真宗時，又罷三使，重設三司使一員，另設鹽鐵副使、度支副使和戶部副使。《宋史·職官志補正<sup>190</sup>》的記載：

鹽鐵司掌天下山澤之貨，關市、河渠、軍器之事，以資邦國之用……度支司掌天下財賦之數，每歲均其有無，制其出入，以計邦國之用……戶部司掌天下戶口、賦稅之籍、權酒、工作、衣儲之事，以供邦國之用。

三司制度的設立最初是為了分割宰相的財權，但嚴重分化了戶部和工部的職能。三司總管全國財政，戶部幾乎無所職掌，委派「判戶部事」一員，接受各地土貢，至時陳列於殿廷。工部宋初僅設「判工部事」一員，所屬屯田、虞部、水部的職權全被劃歸「三司」，工部職權很少。由於樞密院的設立，兵部只委任「判兵部事」一員，只管皇帝儀仗、鹵簿、武舉、義勇弓箭手等事。審官院代行吏部考校京朝官的職權，太常禮院和禮儀院代行禮部的禮儀之權，審刑院代行刑部複審大理寺所定案牘之事。六部接近閒置，機構過分臃腫，行政極為效率低下。直到元豐改制撤銷三司制度，六部各設尚書和侍郎，主管本部事務，六部職能才趨於正常。但北宋的三省六部官員始終不在政治權利的中心位置。

## 二、地方官僚

宋朝的地方行政區劃，基本上是兩級制，即府、州、軍、監為一級，縣為一級。宋朝的地方官均以中央官吏派出任，以州為標準單位。知州照例兼廂軍正印職。除知州外，每州設「通判」一人，其地位類似隋朝通守。州一級發出檔，必須通判簽署，才能生效。目的就是要牽掣一下知州的權力。縣一級的官吏，主要有知縣、縣丞、主簿和縣尉。知縣由中央派出的官吏擔任，也是一種差遣。宋太宗以後，又把全國分為若干路，路相當於唐代的道、元代的省。這就變成路、州、縣三級。<sup>191</sup>

### （一）宋代地方官制——縣

<sup>190</sup> 龔延明著：《宋史職官志補正(下)》，臺北，中華書局發行，2009年8月1日版，卷162。

<sup>191</sup> 龔延明著：《宋代官制辭典》，臺北，中華書局出版，2013年9月1日，第562頁。

縣是地方行政機構最低一級，自秦漢以後，曆朝相沿不革。宋代的縣，設縣令、縣尉，作為一縣的長官。大縣還設有主簿一員。《長編<sup>192</sup>》卷 11 載，開寶三年（公元 970 年）規定縣官的定制：

縣千戶以上，依舊置令、尉、主簿，凡 3 員；戶不滿千，止置令、尉各 1 員，縣令兼主簿事；不滿四百，止置主簿、縣尉，以主簿兼知縣事；不滿二百，止置主簿，兼縣尉事<sup>193</sup>。

神宗熙寧以後，令二萬戶以上的縣增置縣丞一員，縣丞次於縣令而位在主簿、縣尉之上。南宋時則取消縣丞。宋制縣的長官稱縣令。但往往看到史志記載多稱為知縣，這是宋代地方官制的特點。知縣就是知縣事的簡稱。據《長編》卷 4 載：

宋代為了加強對地方政權的控制，從乾德元年（公元 963 年）開始「命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縣、監察御史王祐知魏縣、楊應夢知永濟縣、屯田員外郎於繼徽知臨泛縣。常參官知縣，自嶼等始也<sup>194</sup>。

這是由皇帝直接委派京官帶本官去掌管一縣之政，即所謂知縣事，也就是一縣的主要長官。知縣有別於縣的本官縣令，因為是差遣。

## （二）宋代地方官制——州

州等於秦漢時的郡，隋唐以後改稱為州。州的長官，隋唐皆設刺史。趙匡胤立宋初年，鑒於唐末五代之患，削州鎮之權，「令文臣知州事」，其後，派二品以上的官員充任一州的長官；主要也是為了便於皇帝的直接控制。為了更有效地加強控制，又設通判與知州相互牽制、監督。

《長編》卷 4 載，宋太祖乾德元年（公元 963 年）「始命刑部郎中賈玘等通判湖南諸州<sup>195</sup>。

當時因為湖南剛剛平定，多留用後周時的舊官員，於是宋太祖才命刑部郎中

<sup>192</sup> 《續資治通鑑長編》，共九百八十卷，南宋 李燾編撰，費時約 40 年。記載起自宋太祖趙匡胤建隆元年（960 年），迄於宋欽宗趙桓靖康二年（1127 年），記北宋九朝 168 年史事。

<sup>193</sup> (宋)李燾著：《續資治通鑑長編長編》，臺北，中華書局，2004 年，太祖開寶三年正月癸丑條，卷 11。

<sup>194</sup> (宋)李燾著：《續資治通鑑長編長編》，臺北，中華書局，2004 年，太祖開寶三年正月癸丑條，卷 11。

<sup>195</sup> (宋)李燾著：《續資治通鑑長編長編》，臺北，中華書局，2004 年，太祖開寶三年正月癸丑條，卷 11。



賈玘等通判湖南諸州，意在控制這批留用官員。後來發展成爲牽制、監視州府長官的一種定制。《宋會要輯稿·職官》卷47說：

通判，州各1人，與長吏均理，州府之政，無不統治，藩府或置兩員，廣南小州有試秩充通判兼知州者。」又雲：「知州，掌郡國之政令，通判爲之貳<sup>196</sup>。

通判這種官的權位有些特殊：論官位，通判在知州之下，仁宗以前規定，朝官充通判者，曆兩任即可升爲知州，天聖六年（公元1028年）改爲三任方得充知州；論職權，則通判不但可與知州同理一州之政（州府公事須經知州與通判簽議連書方許發下，凡兵民、錢穀、戶口、賦役、獄訟聽斷之事，與守臣通判簽書施行），而且，作爲皇帝的耳目，所部官有功過及職事修廢，可直接通達皇帝。因此不能簡單地認爲通判就是知州的副職，當時人視之爲「監州」，則更符合其身分。

宋代以府、州、軍、監並稱。大體說，凡政治、經濟、軍事三者兼重的地方設府，有駐重兵的軍事地區設軍，工業區如煮鹽、冶鐵等重要地區設監<sup>197</sup>。

府的地位比州略高一些，因此，稍大的州，則多升爲府，升府的州，一部分是沿襲唐五代舊名，一部分是因爲皇帝未即位時所封或曾是任官之地。派往知府者一般都是比較重要的官員。

### （三）宋代地方官制——路

路的劃分，一開始並不是作爲行政區而設置的，所以路一級的官僚機構，便不成體制，設制的官員並沒有固定形式和人員，甚至可以說連駐地、轄內的地境範圍及名稱都是隨時變動的。

路的官僚機構，主要有四個監司，稱爲帥、漕、憲、倉。這些官員均由皇帝委派。帥也稱爲安撫使，是一路高級軍政長官，照例由文臣充任，但往往帶都總管銜，統轄軍隊，掌管兵民、軍事、兵工工程諸事。南宋的安撫使改爲帥司，兼管民政。漕是轉運使，其本職是經管一路財賦，保障上供

<sup>196</sup> (清)徐松著：《宋會要輯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7月1日出版，卷四十七。

<sup>197</sup> 龔延明著：《宋代官制辭典》，臺北，中華書局出版，2013年9月1日，第562頁。

及地方經費的足額。爲了履行其本職，就有必要巡察轄境，稽考簿籍，舉劾官吏。<sup>198</sup>

久而久之，轉運使便成爲事實上的大行政區（路）的監司官。不過，轉運使的品秩不很高，而地方長官如知府、知州，還可能是前任的執政官，品位在轉運使之上。在職權上轉運使較爲廣泛，而在體制上卻不能完全以下屬對待府州。這與漢代的州刺史與郡守的關係略同。

南宋改爲漕司。與轉運使平行的又有提點刑獄公事及提舉常平司兩種，前者管司法，稱爲憲；後者管賑荒救濟事宜，稱爲倉<sup>199</sup>。

另外又在安撫司中設走馬承受 1 員，有事可直接向皇帝報告，不經安撫使之手，事實上與唐代的監軍相似。所以每路有四個系統的長官，職權互相不同，而又不能認真負責。

#### （四）宋代地方官制——軍

軍在唐代是一種軍區，隻管兵戎，五代以後，逐漸與行政區沒有多大差別，至宋代則成爲兵、民、軍、政合一的行政區域。凡是唐代節鎮所在仍保留其軍號，也有加給新改的軍號，這種稱爲節度州。但另有一種稱軍的地方，不是節度州，而是由縣升的，或領數縣，或並不領縣。

這種軍往往僅比縣略高一級。設軍的地方，一般是在邊境，也有是在關隘要地。宋太宗時期，軍的建置最多，總共有 34 個，其中在河北、陝西與契丹、西夏接壤的邊境所建置的就有 15 個<sup>200</sup>。

在邊境地區設軍，是爲了適應制禦外敵的需要，而在內地的關隘口設軍，則主要是爲了易於彈壓兵民的叛亂。五代的軍，治所與縣治同處一所，而隸屬於州；宋代因削藩鎮兵權，取消支郡制度，於是軍便得與州府並列。《宋史職官志》卷 162：

監，實際上與縣差不多，但因其直屬京師，不爲州縣所轄，因而也同列於州。監亦有領縣者。府、軍、監的設官，大體與州相似，說：「知州事，通判州事各 1 人，府、軍、監事如州，視地望重輕，以資級應選省充<sup>201</sup>。

<sup>198</sup> 龔延明著：《宋代官制辭典》，臺北，中華書局出版，2013 年 9 月 1 日，第 563 頁。

<sup>199</sup> 龔延明著：《宋代官制辭典》，臺北，中華書局出版，2013 年 9 月 1 日，第 564 頁。

<sup>200</sup> 龔延明著：《宋代官制辭典》，臺北，中華書局出版，2013 年 9 月 1 日，第 565 頁。

<sup>201</sup> (宋)李燾著：《續資治通鑑長編長編》，臺北，中華書局，2004 年，仁宗慶歷八年正月盡是年

宋代的地方行政單位名稱是非常複雜的，路之下有府、州；府、州之外又有軍、監。府也有與節度軍號同的，也有不同的，節度州有不改府的，升府之後也有不立節度軍號的。

### （五）地方官制的其他機構

對於地方官僚體制，《宋會要輯稿·職官》卷 42 有較明確的記述：大中祥符二年（公元 1009 年）十一月，真宗詔論監司失察罪時說：

分天下爲郡縣，總郡縣爲一道，而又總諸道於朝廷。委郡縣於守令，總守令於監司，而又察監司於近臣，此我朝內外之紀綱也。故欲擇守令，必責之轉運，必責之近臣。既嚴連坐之罪，又定舉官之賞，而失察者又有罪，賞罰行，紀綱正矣<sup>202</sup>。

轉運使有權管一路之政，但因宋代州府長官常是二品以上的朝官帶本官充任，因而有時轉運使的官位低於州府長官，這就給轉運使在行使職權上造成困難。因此，大中祥符五年（公元 1012 年）規定，凡是大兩省官以上充任轉運使的，州府公文必由轉運使、副使申轉；若是觀察使以上知州府的，州府公文不必經由轉運使。於是路與州府長官的關係就以品秩高低來決定，這樣的地方機構，自然會出現許多紊亂的現象。

宋代地方駐軍指揮則有都總管、副總管、都鈐轄、副鈐轄、都監、副都監三級，或守臣兼充，或武臣充副職。至於沿邊地區則置都巡檢、巡檢。南渡以後，多采用臨時措置，各軍將領分別給以統制，同統制、副統制、統領、同統領、副統領等名號、其下則有正將，副將、準備將等名，這些都是偏裨之職<sup>203</sup>。

宋代的州、縣衙門中，除了中央所委派的官員外，還有很大數量的吏。在州一級政府里，有孔目官、勾押官、開拆官、押司官，糧料官等等。在縣衙門里，有押司、錄事、手分、貼司等。吏的來源有的是召募，有的是差派，絕大部分從地主階級中選充。有的吏是世襲的，父死子繼。吏的名目繁多，最主要的職責是

---

閏正月，卷 162。

<sup>202</sup> (清)徐松著：《宋會要輯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7 月 1 日出版，卷四十二。

<sup>203</sup> 龔延明著，《宋代官制辭典》，臺北，中華書局出版，2013 年 9 月 1 日，第 566 頁。

經手征收賦稅，處理獄訟。他們上下其手，趁機敲榨勒索。吏是封建統治集團中一個重要而不可忽視的組成部分。

據《文獻通考·職役考》記載：

北宋政權建立以後，就差派鄉村的地主當里正、戶長和耆長。里正、戶長負責「課督賦稅」。耆長則專司「逐捕盜賊」。總之，這些鄉村最基層的小吏，其職責有二：一是榨取錢物，二是彈壓農民<sup>204</sup>。

在縣以下，還有鄉和里。鄉、里雖然沒有正式的政權機關，但是宋代統治者依靠鄉間地主，統治和控制廣大農民。

## 小結：

《水滸傳》作為一部文學名著，內容包羅萬象。生活在明朝的施耐庵創作一部以宋朝為歷史背景的作品，其中有些官職出現錯誤在所難免，這並不能磨滅《水滸傳》在史學上貢獻，從文學作品中看歷史，也是研究歷史的重要途徑。宋朝官職制度的幾大特點：中央集權、重文輕武，職權分散，內重外輕，在《水滸傳》中體現得很明顯。如果不對北宋的中央官制有所瞭解，就很難真正瞭解水滸文化。歷史有其特殊性、變異性與傳統性，必須從多種角度去分析總結，才能讓文學名著的價值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

---

<sup>204</sup> (宋)馬端臨著：《文獻通考》，浙江大學圖書館，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卷 12〈職役考〉1。  
<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res=881>

## 第五章 梁山泊關勝與林沖的地位論

在角色設定與梁山泊的定位上，梁山英雄人物而在報國無門之時，他們揭起「替天行道」的大旗，懲治貪官汙吏，攻殺惡霸豪強，劫富濟貧，用暴力而不是依靠早已顛倒的朝綱來維持著廣大百姓所認可的社會正義。這是作者鋪陳出水滸英雄好漢造反是被逼的「官逼民反」最佳理由。探討的是相關人物與梁山泊的定位問題，先從關勝和林沖的排名在角色設定與梁山泊的定位上，梁山英雄人物而在報國無門之時，他們揭起「替天行道」的大旗，懲治貪官汙吏，攻殺惡霸豪強，劫富濟貧，用暴力而不是依靠早已顛倒的朝綱來維持著廣大百姓所認可的社會正義。

### 第一節 關勝的家族關係

梁山排名中林沖排在關勝之後排第五，是讓很多林沖愛好者憤憤之事，不過，關勝有個了不起的祖宗，本人又功夫了得，儀表不俗。加上宋江要做的事情是將一個黑社會組織改造成可以與朝廷對話、通過對話走向和解的組織，那梁山事實上的第一將，就必須是他真正能指揮得動的。綜合上述幾點，五虎上將第一位，非得給關勝不可。

#### 一、關勝的家族關係與官場地位

關勝是三國名將關羽的後代，使一把青龍偃月刀，精通兵法。原來是蒲東的巡檢，後被蔡太師調往梁山泊攻打宋江。關勝一人大戰林沖、秦明兩人。後用計擒住張順、阮小七。宋江不能取勝。呼延灼用假投降的辦法引關勝兵馬進入宋江的大寨，被撓掛鉤拖下馬鞍活捉。關勝感到宋江有膽識重義氣，便歸順了梁山。

關勝在水滸中的形象，遠沒有他的玄祖那般動人。他的走過場般的出頭露面，甚至可以說是空白的。吳桃源先生在《畫說水滸人物》一書中評論關勝最後

一段提到：

畢竟《水滸》中的關勝是虛構人物，即使有《水滸》專家據《宋史·劉豫傳》考查出關勝這個人，卻也無法證明是否為關羽之後。而《水滸》作者之所以安排關勝上場，卻是大著膽子朝關羽之後的方向去描寫他。由此可知，《宋史》中的關勝與《水滸》中的關勝應是兩碼子事，陳洪綬的畫可以證明《水滸》作者只想鈎起大家對關羽的懷念。<sup>205</sup>

然而，世上的機遇有時是給沒有準備的人的，只要你人脈好，沒準機遇自動來敲你的門，古往今來都有這種情況。所以人脈對一個人的機遇關係很大。《水滸傳》裡的關勝就是一個碰到機遇主動來敲門的人。梁山集團為救盧俊義，兵困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派人到東京向岳父蔡太師蔡京求救。事關女兒、女婿的性命前程，蔡京當然高度重視，於是召集總參將領們集體開會討論對策。會上宣瓚突然向蔡京推薦他的老鄉關勝。

小將當初在鄉中，有個相識。此人乃是漢末三分義勇武安王嫡派子孫，姓關，名勝，生的規模與祖上雲長相似，使一口青龍偃月刀，人稱為大刀關勝。現做蒲東巡檢，屈在下僚。此人幼讀兵書，深通武藝，有萬夫不當之勇。若以禮幣請他，拜為上將，可以掃清水寨，殄滅狂徒，保國安民。乞取鈎旨。<sup>206</sup>

既然是推薦，當然是只說優點，不說缺點，甚至還給他美化一番。於是，蔡京把關勝叫來面試了一番，親眼觀察。蔡京覺得，關勝儀表堂堂，八尺五、六的身高，跟關羽一樣長一雙丹鳳眼，馬上就喜歡上了這位年輕的軍官。

由於關勝外貌給人感覺滿意，印象分通過了，蔡京再給關勝提出個考題：「梁山泊草寇圍困北京城郭，請問良將，願施妙策，以解其圍<sup>207</sup>。」關勝是個聰明人，機會來的時候，不僅懂得抓住，還懂得做好準備。他馬上胸有成竹地獻上圍魏救

<sup>205</sup> 吳桃源著：《畫說水滸人物》，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年10月，175頁。

<sup>206</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年版，645頁。

<sup>207</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年版，638頁。

趙之計：「久聞草寇占住水窪，驚群動眾。今擅離巢穴，自取其禍。若救北京，虛勞人力。乞假精兵數萬，先取梁山，後拿賊寇，教他首尾不能相顧<sup>208</sup>。」

關勝獻上的計策，的確能打中梁山的要害，梁山無後方作戰實力，若老巢被抄了，必然死無葬身之地。關勝一句「乞假精兵數萬」，說得非常老道，不得不令人佩服。精兵數萬這個規模，顯然不是小小的團級軍官可以指揮的，關勝的弦外音是：要讓我統帥大軍，希望能給個軍長的頭銜，才夠威夠猛。關勝開出個「數萬人馬」的條件，其實暗中是為了自己的身價，當時梁山主力盡出，北圍大名府，留守的人馬不多，況且對朝廷來講，梁山只不過一個小小的水泊而已，相當於一支土匪隊伍，按理把關勝提拔為團長而率幾千人去就足夠了。關勝抓住這個機遇，提出「合理」的要求，他也知道這個時候蔡京會同意<sup>209</sup>。

《水滸傳》有一個特點，一個將領一出場，總是武藝高的不得了，等到來到了梁山泊，也就是那回事兒，真正到了較勁兒的時候，還是要看林沖的。關勝和林沖交過手，不過，林沖是和秦明兩個人鬥關勝一個。相鬥的結果，用關勝自己的話說，「看看輸於他」，所以無法證明到底是誰的武藝高強。

從小說內容來看，《水滸傳》裡的關勝，性格具有兩面性，掌權時表現得光明磊落、勇猛囂張，進入困境時，很快就投降反戈、陰暗狡猾。這種人在現實生活中、在現代職場中和商業活動中經常可見，了解其經歷，解讀其人生細節，分析其性格特徵，具有現實主義，可以幫我們認清這類人，在用人和防人上，可以做到一清二楚，掌握全局。

## 二、林沖的身世與官場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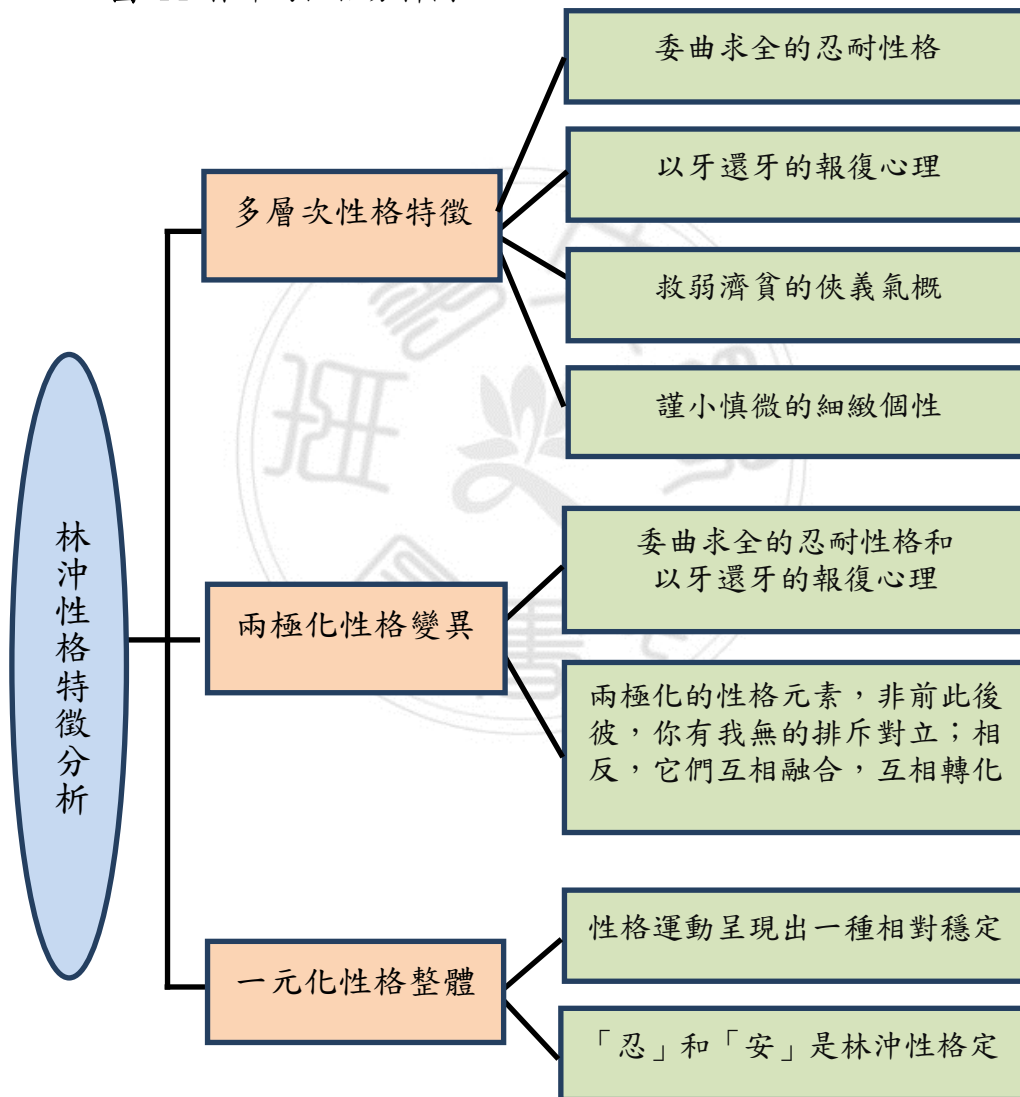
豹子頭林沖是小說《水滸傳》中的人物，原為東京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生得豹頭環眼，燕頰虎鬚，身長八尺，人稱「豹子頭」。善使槍棒，有萬夫不當之勇。妻子張氏貞娘，岳父也是禁軍教頭，父親是東京的提轄官，操刀鬼曹正是他

<sup>208</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年版，638頁。

<sup>209</sup> 中文百科在線：《關勝》，2011年1月7日。[http://www.zwbk.org/zh-w/Lemma\\_Show/104527.aspx](http://www.zwbk.org/zh-w/Lemma_Show/104527.aspx)

的徒弟。林沖東京(現河南開封)人氏，生性耿直喜武，愛結交好漢，慣使槍棒。因他的妻子長得漂亮，幾次三番被太尉高俅的乾兒子高衙內調戲，不僅如此，高俅為了治好高衙內的心病(佔有林沖的妻子)，讓自己的心腹陸謙設計陷害林沖，使其帶刀誤入白虎堂，蒙冤刺配到河北滄州。從林沖被陷害到上梁山的細節，凸現出林沖個性中的四個層次的性格特徵是線的交錯，而且它們的強弱也是不一樣。

圖 14 林沖的性格分析圖



※閻宇隆繪圖

參考張少康著《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一書林沖性格分析<sup>210</sup>

<sup>210</sup> 張少康著：《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2007年3月8日，第325頁。



作家張少康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中對林沖的性格特點分析如下<sup>211</sup>：

### （一）多層次的性格特徵

從藝術角度而言，小說形象中所包含的性格特徵的層次越豐富越好。縱觀林沖這一人物形象，他具有四個層次的性格特徵。第一：委曲求全的忍耐性格。第二：以牙還牙的報復心理。第三：救弱濟貧的俠義氣概。其四：謹小慎微的細緻個性。

### （二）兩極化的性格變異

美學家朱光潛曾說過：「世間事物最複雜因而最難懂的莫過於人。」人之所以複雜難懂，其中一點就在於人性格的多樣性。林沖的性格，最突出的是他委曲求全的忍耐性格和以牙還牙的報復心理，這是兩極化的性格。兩極化的性格元素，非前此後彼，你有我無的排斥對立；相反，它們互相融合，互相轉化

### （三）一元化的性格整體

林沖這一人物形象之所以豐滿完整，除了以上兩點外，還在於他的性格運動呈現出一種相對穩定性和一貫性。而只有性格的豐富性和統一性相統一的人物形象才是一種有機的生命體。林沖在不同環境中都在認真地扮演不同的角色：在東京，他逆來順受，連老婆給高衙內調戲了，都忍了，目的就是當好他八十萬的禁軍教頭；野豬林險遭不測也忍了；在滄洲，他苟且偷生，既來之，則安之，當好囚徒；逼上梁山後，便安心當個「梁山賊寇」。「忍」和「安」是林沖性格定性的核心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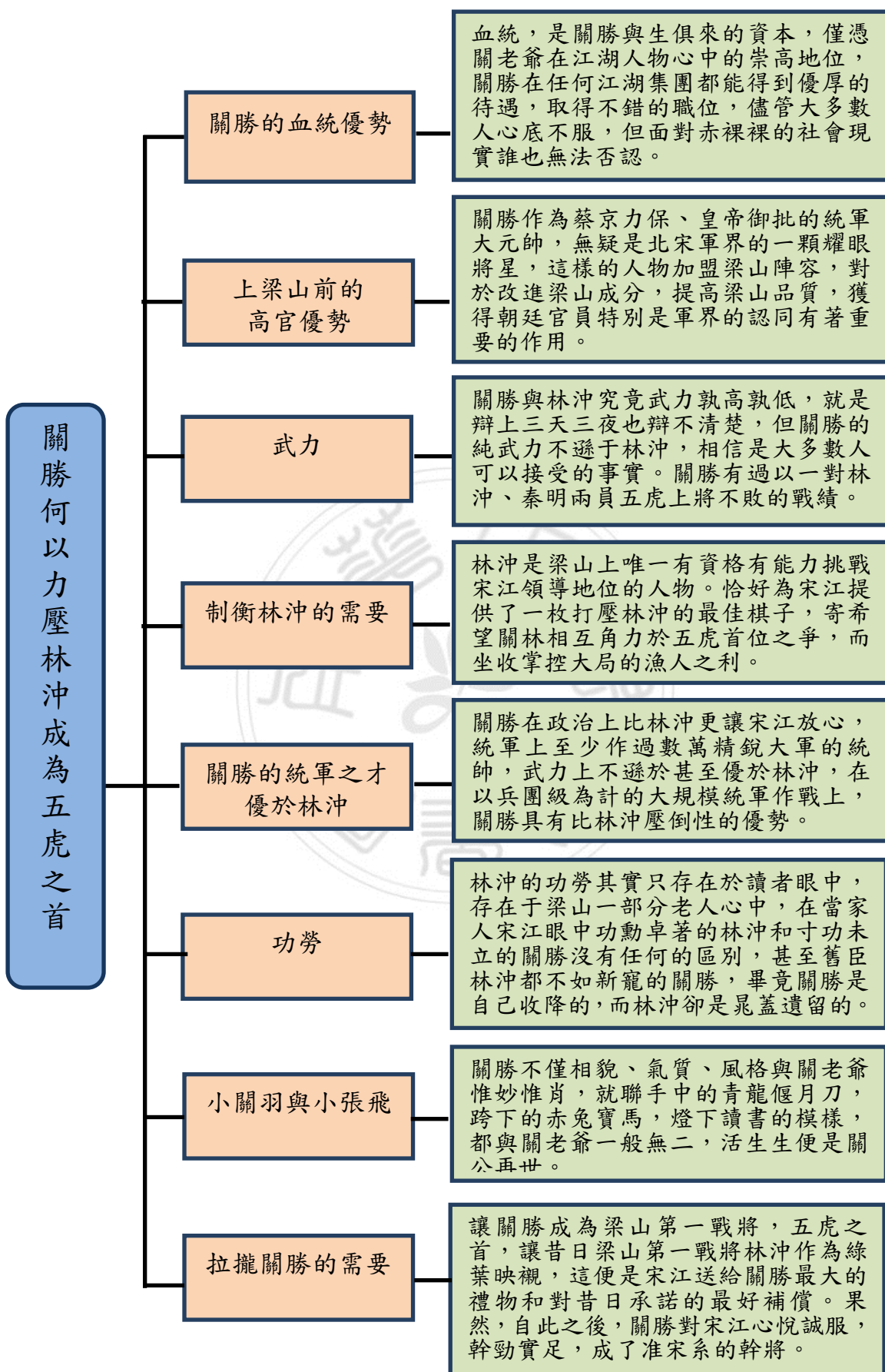
## 三、水滸中大刀關勝何以力壓林沖成為五虎之首

文學史上時常評論水滸英雄中大刀關勝及林沖到底誰才真正配的上是五虎之首，雖然原著故事情節早已將關勝定位為代表梁山武將(盧俊義應算統帥層次)最高峰的五虎之首，可是因林沖在故事情節中的出場更甚顯著，使的大部分閱讀者早已習慣林沖才算的上是梁山第一高手。於是關勝及林沖地位之爭往往是文學史上評論的重要議題。網路作家何超所著《水滸中大刀關勝何以力壓林沖成為五虎之首<sup>212</sup>》一文中，分析了關勝能力壓林沖成為五虎之首的道理所在，筆者就其見解分析繪如下表：

<sup>211</sup> 張少康著：《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2007年3月8日，第325頁。

<sup>212</sup> 何超著：《水滸中大刀關勝何以力壓林沖成為五虎之首》，發表於何超科學網博客，2016年9月18日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192212-1003633.html>

圖 15 關勝何以力壓林沖成為五虎之首分析圖



※閻宇隆繪圖

關勝，之所以能夠力壓林沖成為五虎之首、梁山第一戰將，有其自身過硬的條件(武功、統帥之才)，有其先天的凝聚人心的正統形象(關公之後)和後天的便於招安的高貴身份(朝廷前高官)，還有宋江的政治考量(拉攏關勝、壓制林沖、去晁蓋化抹殺林沖功勞)，再加上小關羽小張飛的形象定位，諸多的因素累加在一起決定的。關勝力壓林沖成為五虎之首，是在宋江主政下的梁山，在招安的大背景下的必然結果。

## 第二節 相關人物與梁山泊的定位

有人評論《水滸》非農民小說而是游民小說，因為小說中有不少人物為游民，也有不少描寫游民的場景，如閻惜婆、武大郎、潘金蓮等。但這些都是《水滸》中的陪襯人物。《水滸》中著力刻畫的主要人物，如宋江、林沖、武松、李逵、魯智深、楊志、吳用、晁蓋、公孫載、朱全……等眾多人物，除少數人如吳用為教師，公孫勝為道士，李逵為無業遊民，晁蓋為地主外，半數以上的人物均為各級官吏。而且《水滸》中的主要人物，如宋江、林沖、李逵、武松、魯智深、楊志、阮氏三兄弟等都是罪犯，都有命案在身，李逵、魯智深、武松等人視人命如野草，殺人如同體育鍛煉，滿身血債。張青、孫二娘、顧大嫂等乾脆以殺人，賣人肉包子為業。可以說，《水滸》也不是一部反映宋—明時期游民生活的小說，而是一部主要言說罪犯聚集為寇，形成氣候，最後被朝廷安撫，並為朝廷拼命出力的故事。

《水滸傳》不僅寫了下來勞動人民如李逵、阮氏三兄弟奮起反抗，也寫了如柴進、盧俊義這些原是統治階級營壘中的人先後捲進了起義軍的行列。作品通過林沖、武松等一大批英雄被逼上梁山經過的描寫，具體生動地說明了「官逼民反」的必然性。林沖這一形象尤其具有典型性。大陸學者彌勒佛(筆名)在《由人名看《水滸》中的人物定位》一文中說明：

《水滸傳》中的人物按照人名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由人名可以定位的人物，這些人物對小說的情節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因而，施耐庵在寫作時對這些人物的名和綽號也進行了認真地考慮，另一類是由人名不能定位的人物，這些人物對小說的情節發展沒有太大的影響，因而，施耐庵可能在寫作是隨便地給他們取了一個名字。<sup>213</sup>

<sup>213</sup> 彌勒佛(筆名)著：《由人名看《水滸》中的人物定位》，2015年9月25日。  
<http://www.123guoxue.com/thread-227773-1-1.html>

表 5 梁山好漢的來源構成分類表

類 別	人 物
梁山成勢前元老	宋萬、杜遷、朱貴、林沖
晁蓋帶來的人馬	吳用、公孫勝、劉唐、阮氏三兄弟、白勝
宋江帶來的人馬	花榮、戴宗、李逵、孔明、孔亮、宋清
地方上的大戶	盧俊義(心腹:燕青)、柴進、李應
地方小吏	朱仝、雷橫、孫立、宋江、施恩、楊雄
朝廷的降將	關勝、秦明、呼延灼、董平、張清、索超、黃信、宣贊、郝思文、韓滔、彭玘、單廷圭、魏定國、凌振、龔旺、丁得孫
收編其他山頭的頭領	<p>二龍山：魯智深、武松、楊志、曹正、張青、孫二娘</p> <p>少華山：史進、朱武、陳達、楊春</p> <p>揭陽鎮：穆弘、穆春、李俊、張橫、張順、童威、童猛、李立</p> <p>飲馬川：裴宣、鄧飛、孟康</p> <p>黃門山：歐鵬、蔣敬、馬麟、陶宗旺</p> <p>清風山：燕順、王英、扈三娘、鄭天壽</p> <p>對影山：呂方、郭盛</p> <p>枯樹山：鮑旭</p> <p>芒碭山：樊瑞、項充、李袞</p> <p>桃花山：李忠、周通</p>
散戶游民	徐寧、石秀、解珍、解寶、樂和、杜興、鄒淵、鄒潤、朱富、孫新、顧大嫂、郁保四、蕭讓、安道全、皇甫端、金大堅、楊林、侯健、薛永、湯隆、蔡福、蔡慶、李雲、時遷、焦挺、石勇、王定六、段景住

資料來源：參考 1.施耐庵著之《水滸傳》。2.吳閑雲著之《黑水滸》。

## 一、角色設定與象徵

梁山起義軍在王倫、晁蓋、宋江三代領導人的帶領下，由弱到強，不斷壯大，最終人才濟濟，兵強馬壯。一流武藝高超的軍官上梁山之後，對梁山泊的體質產

生了改變，使梁山泊成為一個可以與朝廷相抗衡，可以造反的龐大集團。但梁山領導人在這個過程中所展現出的治寨理念、激勵措施和管理方法值得我們借鑒總結。

梁山在鼎盛之時瞬間土崩瓦解，原因有很多，但人才戰略是關鍵因素。梁山三代領導人不同的人才戰略，決定了梁山不同的發展階段，其間的得失，對今天的企業人才戰略仍有重要的啟示意義<sup>214</sup>。

梁山泊水寨先後三任首領王倫、晁蓋和宋江。王倫心地狹隘，故事不多，其心緒狹促之態，刻畫也是入木三分。王倫其人不足道，故他只是梁山階段性領袖。

晁蓋的角色被設定為梁山過渡性領袖，他原是一莊園主，上梁山奪得梁山水寨首領之位後，水寨大有起色，但仍是占山為寇，幹的剪徑、搶劫的勾當，並顯不出太大的野心，也沒有長遠規劃，只是借此寨避禍而已。因此晁蓋統領下的水寨，出場的隊伍人馬，也不過兩、三百人。書中對晁蓋的描寫塑造是篇幅最少的。

宋江上梁山之後，兼併了周圍幾個山頭人馬，隊伍迅速擴大，到三打祝家莊時，已可出動二千人馬，山寨也漸顯出不同的發展思路和新氣象。這與宋江的謀劃大有關係。

宋江作為水滸英雄裡的第一號主角也是故事裡的靈魂人物，可是一直到了第十八回，為了向晁蓋通風報信才從故事裡出場。在第三十九回，宋江在江州潯陽江樓上所題的「反詩」：

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恰如猛虎臥荒丘，潛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報冤仇，血染潯陽江口<sup>215</sup>。

證明了宋江有從事政治野心和企圖，更有政治眼光和氣魄。其實宋江並不想上梁山，走向反抗朝廷之路，從故事情節裡我們可知晁蓋多次相邀宋江入夥及因犯罪被發配兩次路過了梁山，他都無上山的意願。到了江州實在是走頭無路時逼

---

<sup>214</sup> 易定宏著：人才戰略決定梁山成敗----《水滸啟示錄》，2010年4月4日。  
<http://books.sina.com/bg/sinablog/overseas/20100404/171219098.html>

<sup>215</sup>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年版，387頁。

不得已，才不甘願的上了梁山。由於宋江的加入，從此梁山泊水寨迅速發生了改變，顯現出了政治口號：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由於大量的號召，梁山泊的組織越具規模，有了類軍隊的指揮體系，也為了後期接受了朝廷招安增加了力量。

《水滸傳》一開始是採個人角色設定的敘寫方式，藉由武松、林沖及魯智深等英雄人物的個別故事，來講對朝廷不滿又或因遭受到了政治迫害進而反抗朝廷等抗爭，這些故事內容雖然精彩可及，但終究還只是屬於個人的反抗，不能影響到整個統治階層而造成威脅。然而隨著劇情發展及當時抗爭力量所需，由一開始的個人反抗，逐漸的演變為聚集而形成小規模的反抗，小規模又聚集聯合成一隻軍容壯盛的起義的隊伍。作家錢念孫在《中國文學史演義(參)元明清篇》寫道：

智取生辰綱可以說小規模地聯合的萌芽，參加的有漁民、貧民、下層文人，也有道士、地主等。他們出於對當權者的仇恨，為奪取不義之財，齊心協力，終於取得勝利，事後又一起上了梁山<sup>216</sup>。

所以說在宋江上梁山之後，迎合了趨勢樹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出現了起義英雄武裝割據的新局面。

### (一) 角色象徵的塑造

小說家的任務，就是在用語言說明故事中角色設定人物的個性及特徵，並由當時的時空背景、生長環境及個人經歷所局限，隨著後續環境的發展、政治因素考量及經歷的差別，所設定人物的性格當然也會有所差異。作家游國恩在《中國文學史》一書中說明：

《水滸傳》之所以成為我國文學史上影響巨大的作品，不僅在於它思想內容的豐富，而且也由於它藝術的成熟。《水滸傳》的藝術成就，最突出地表現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全書巨大的歷史主題，主要是通過對起義英雄的歌頌和對他們鬥爭的描繪中具體表現出來的。因而英雄形象塑造的成

---

<sup>216</sup> 錢念孫著：《中國文學史演義(參)元明清篇》，臺北，正中書局出版，2009年4月1日，第755頁。

功，是作品具有光輝藝術生命的重要因素<sup>217</sup>。

所以在《水滸傳》的故事情節中，至少出現了一、二十個鮮明個性的角色類型，在這些設定中所營造出來的形象，個個栩栩如生，有血有肉，深深的烙印在讀者的心中。

林冲原本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禁軍教頭的地位，優厚的待遇，美滿的家庭，一般而言都會使人產生一種安逸的遐想，林冲當然也不意外，很自然的產生一種安於現實，怯於反抗的個性，所以對朝廷的打壓一再隱忍；但在同時他所受的各種經歷，又使他認識了各種不同階層、出生及地方勢力的江湖好漢，造就了他豪俠、耿直、不甘久居人下的個性，所以說林冲是隱忍不是逆來順受，這兩者之間是有所差別。但是忍到最後實在是忍無可忍，最後抱持著負仇的信念上了梁山，這種壓抑的爆發，是他性格發展的必然結果。

魯達是林冲的好兄弟，多次在林冲身處絕境時救了林冲，並多次勸導林冲上梁山，那他當初又是因為什麼原因上梁山的，與林冲來做比較，初期出場時是渭州經略府的提轄，沒有家小也沒有任何產業，又是處於社會的下層可以說是沒什麼牽掛，因為愛好打抱不平及為弱者主持正義，最終受到了社會的壓迫和遭受到不平的際遇，而產生了強烈的憤怒，或許在他的眼裡，榮華富貴及功名利祿遠比不過社會正義，因此造就了他酷愛自由，好打不平的性格，但是這種性格和當時黑暗的現實，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所以說魯達上梁山是為了向整個封建階層的統治者挑戰而走上的道路。

另外我們在舉青面獸楊志為例，他上梁山的道路更為曲折。楊志是「三代將門之後」，「一刀一槍，博個封妻蔭子」是他的生活目的。為了實現這個目的，他可以委曲求全。因先後失陷花石綱及護送生辰綱時被劫，不但斷了他的功名道路，而且有落入牢獄的危險，他才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上了梁山。但是因他自己

---

<sup>217</sup> 游國恩著：《中國文學史》，北京，中國圖書刊行社，1986年版，第42頁。

處處心想的如何出人頭地及虛榮心的作祟，造就了他性格上缺陷，所以最終他的夢想只能落空。

《水滸傳》在人物塑造上不僅表現了現實主義藝術的高度成就；同時也體現著浪漫主義的優秀傳統。書中的英雄人物，不僅植根於現實的土壤之中，而且又是被高度理想化了的。作者從人民的理想出發，把他們的反抗性格和道德情操，提到很高的境界，並把自己強烈的愛憎感情熔鑄在人物身上，使他們具有叱吒風雲的英雄氣概和不畏艱險的樂觀精神。因此說小說在人物塑造上非但繼承和發展了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優良傳統，而且把兩者結合起來，從而使《水滸傳》成為我國小說史上兩結合的創作方法運用得較好的作品<sup>218</sup>。

## （二）角色設定與梁山泊的定位

從《水滸傳》在一百零八將的簡介中，寫著這一百零將各有來歷，各有專長，各有性格，各有功績，各有分工，各有職銜，各有其事，各有其職，組成了梁山泊起義軍的領導集團，文學家李春林先生在《官逼民反話水滸傳》一書中說明：

從《水滸傳》一百零八將的簡介中我們看到，這一百零八將各有來歷，他們的最高領袖人物是宋江、盧俊義，晁蓋雖已死去，仍起精神領袖作用，他們決定政策、制定方針，掌握著梁山泊起義軍的命運。吳用、朱武、公孫勝、樊瑞等人起著參議和組織執行最高決策的作用。這個小社會有一個龐大的軍事領導機構，有一批高級軍事領導人員。他們是馬軍中以關勝為首的五虎將，花榮為首的八驃騎兼先鋒使，以黃信為首的十六小彪將兼遠探出哨頭領，步軍中以魯智深為首的步軍十大頭領，樊瑞為首的十七大將校，還有以李俊為首的八大水軍頭領，有戴宗為首的總探情報頭領。<sup>219</sup>

《水滸傳》雖然沒有直接在經濟影響中寫道有關於階級上的矛盾，但是對於英雄起義對抗封建階級，則有著較深入的描序。小說一開始就寫著「亂自上作」

---

<sup>218</sup> 《明代文學》（西元 1368—1644 年），《水滸傳的藝術成就》，第三節，2016 年 5 月 18 日  
[http://www.ebaomonthly.com/window/reading/chlit/ch7/ch7\\_8.htm](http://www.ebaomonthly.com/window/reading/chlit/ch7/ch7_8.htm)

<sup>219</sup> 李春林著：《官逼民反話水滸》，臺北，旺文社出版，1994 年 8 月版，第 129 頁。



的起源是由於徽宗皇帝寵信高俅進而衍生後續的事端，隱喻著後續故事情節的發展，使人聯想到由昏君和寵臣代表的領導階層，朝廷會如何腐敗百姓會陷於怎樣的水火之中。

小說中的高俅做為蠱惑君主的逆臣，一直是做為反派角色代表人物的出現，《明代文學》一文中說道：

他原是個「浮浪破落戶子弟」，只因踢得一腳好氣球，受到皇帝的賞識，「沒半年之間，直抬舉他做到殿帥府太尉職事」。從此更倚勢恃強，與蔡京、童貫之流狼狽為奸，把持朝政，無惡不作。小說中出現的大小官吏，多是他的親友朋黨<sup>220</sup>。

除了高俅外，小說中還形容了社會基層貪官汙吏橫行霸道，例如一些較具代表性的人物如蔣門神、毛太公和西門慶等。另外還有一些官府的役吏及各式樣的爪牙，這些大大小小組織無形之中成為了一股黑暗權勢，欺凌和迫害著人民百姓。各種英雄的崛起產生及各方農民的起義，就在這一個時空背景氣勢磅礴地開始產生了。故事說到了諸英雄被逼上梁山的過程中，也有這連串整場的英雄人物，那個人屬林沖最具形象特色代表意義，因為他起先是八十萬禁軍的教頭，逼這個字用在他身上最為顯著，上了梁山之後又滅了王倫，為爾後梁山事蹟的發展開闢了道路。

中國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系博士生林剛先生在《解讀水滸》一書中對《水滸傳》的藝術分析中說明：

《水滸傳》裡的英雄人物，其性格的形成與環境是密不可分的，都是由於黑暗的社會環境把他們『逼上梁山』的，是由現實生活教育了他們，使他們逐步克服自身第弱點和缺點成長為英雄的。<sup>221</sup>

不過，從梁山豪傑的英雄傳奇，要如何定位？筆者認為「忠義」思想的是《水

<sup>220</sup> 《明代文學》（西元 1368—1644 年），《水滸傳的思想內容》，第二節，2016 年 5 月 18 日 [http://www.ebaomonthly.com/window/reading/chlit/ch7/ch7\\_8.htm](http://www.ebaomonthly.com/window/reading/chlit/ch7/ch7_8.htm)

<sup>221</sup> 林剛著：《解讀水滸》，北京，京華出版社，2001 年 1 月版，第 202 頁。

《水滸傳》這部小說的精髓，也是梁山的主要精神。我國是一個處於發展中的國家，特別是在我國經濟衰退的情況下，要使我們趕上歐美國家，站立於已開發國家之世界舞台，提倡「忠義」思想更具有現實意義。

首先我們先談「忠」，從我們小時到學校接受教育開始，師長我們就一直教導我們對國家、對民族的忠誠，自然而然就會產生對國家民族的赤膽忠心，並且就會認同於國家，自覺地遵守法紀和響應國家的號召，當然上述這些都做到後就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公民，筆者認為這是屬於較大的面向的「忠」。另外在字典裡的忠解釋成忠實、忠誠及忠厚，這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相處的高道德表現也是和人真誠相待的精神內涵，為什麼呢？當今社會上人們通常都是以自我為中心，自我意識強烈，使的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充滿了算計、心機、欺騙及謊言，這是和我們上述談到的構建和諧社會是背道而馳的。如果說人們相處之間可以少一分算計，都一分忠厚，少一分心機；多一分忠誠，少一分欺騙；多一分忠實，那麼就是在為構建和諧社會進一分心力，同時，這類型「忠」筆都把他歸類為小面向的「忠」。

接下來我們來談「義」，一般人講到義最先想到的是正義感，在詞語裡的解釋是追求正義、伸張正義的道德意識和行為。我們假想如果社會上若沒有了正義，那是非對錯就沒有了一定的標準，人們喪失公平正義的道德意識，屆時一定是秩序大亂，沒有了和諧社會存在的核心價值。再者有正義感的話又會衍生出責任感，對國家、民族及社會要有責任感，有關牽扯到國家、民族及社會筆者把他歸類為大面向的「義。」另外現在大多數的人已漸失去責任意識，例如對父母不孝、對長輩不尊及對幼兒遺棄等，大多屬這類型的範疇，把原本自己應盡的義務轉交給社會、轉嫁給他人。還有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合作及生意往來包括了各種商務活動，這時的「義」大都講求「誠信」也就解釋為「信義」，要言出必有信，答應人家的就一定要守信。有關個人行為的「義」，筆者把他歸類為小面向的「義」。

然而在封建時代，當「忠」和「義」無法實行，人民受到不公平對待，在忍無可忍之下，起來造反。可是，從古至今貪官污吏都不曾中斷過，《水滸傳》故

事寫的是宋朝上層的官員到地方小吏、豪強上上下下各色統治階級組成了一個黑暗統治網，給下層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梁山起義隊伍就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下發生的，從無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由分散到聚合、由沒有計畫的行動轉變為有戰略性的行動綱領，以及最後接受招安到徹底失敗的過程。但是作者或說《水滸傳》主要人物宋江卻受到濃厚的儒家思想教育，儒家的「修身、養性、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是歷來的知識份子的人生目標，宋江也是如此，他的思想跟常人一樣，把儒家的道德要求作為度量一個人的標準。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忠君愛國，因此，宋江也將忠君愛國作為最高標準，以此來要求自己 and 他人。所以才會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既然是造反，怎能這個要反，那個不反，這就決定了他悲劇性的命運結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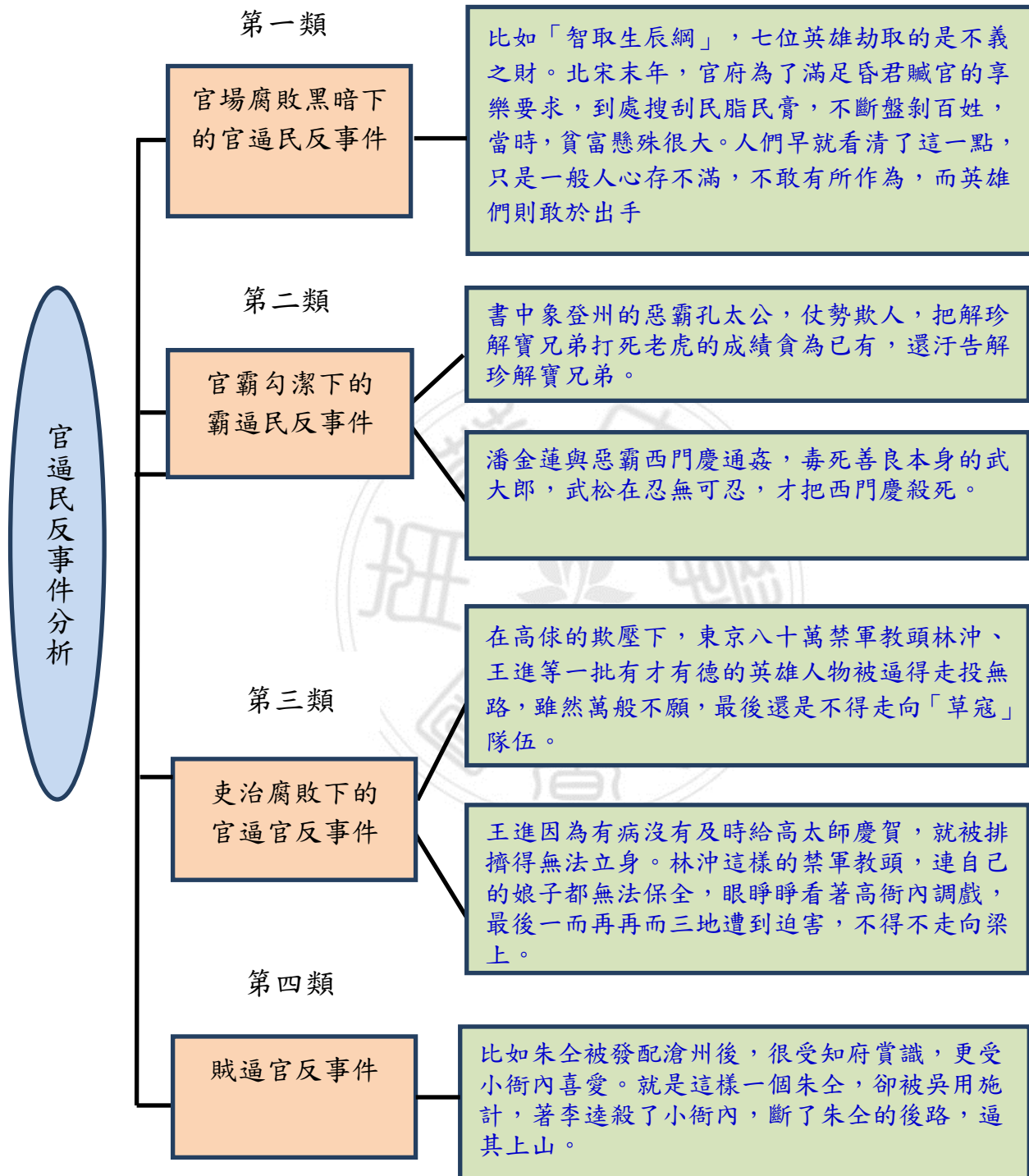
## 二、官逼民反與政治生態的關涉

北宋宣和時期，社會面臨巨大危機，「賢能者無法掌權，掌權者都為不肖之徒」，皇帝昏庸，奸臣當道，國家貧弊，吏治腐敗，民亂四起；同時外寇不斷，軍戰不利，大宋只能割地納幣，屈膝稱臣。在這種社會環境下，不但忠臣義士走投無路，平民百姓也無以自存。「水滸傳」前半部正是以此為背景的。宋江、林沖、武松等上梁山揭桿而起，與其說是被逼無奈、自求生存的不得已之舉，不如說是對罪惡現實的有意識的更為激烈的反抗。在報國無門之時，他們揭起「替天行道」的大旗，懲治貪官污吏，攻殺惡霸豪強，劫富濟貧，用暴力而不是依靠早已顛倒的朝綱來維持著廣大百姓所認可的社會正義。

所謂的「官逼民反」在成語字典裡的解釋就是指人民無法生活，被迫奮起反抗。我們如果仔細的閱讀《水滸傳》不難發現書中「官逼民反」事例很多，並且皆影響著故事後續的發展，筆者參考作家劉昌春在《水滸傳弘揚正氣的「官逼民

反」事件<sup>222</sup>》一文中對於「官逼民反」做出的論述以解析圖例舉如下：

圖 16 官逼民反事件分析圖



※閻宇隆繪圖

<sup>222</sup> 劉昌春著：《水滸傳弘揚正氣的「官逼民反」事件》，在華聲在線網站發表，2014年6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347ed50102edhm.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347ed50102edhm.html)

不過，從另一角度來看，梁山泊大部分人的出身和行為，他們本不具備被「官逼民反」的條件，那麼他們又是為什麼上梁山呢？簡單的來說，他們上梁山的目的，不是為了「反」，而更多是避難，像白虎山下孔太公的兒子孔明、孔亮，本來是武藝高強、稱霸一方的莊園主，而他們落草的原因是和本鄉的一個財主競爭，而把他們全定都殺了。另一種思想更加簡單，就是像三阮一樣，對「論稱分金銀，異樣穿綢錦，成甕吃酒，大塊吃肉」的「快活」生活的嚮往。而像林沖這樣被趕上絕路，無奈落草的人只是少數。

當然，很多人最終走上梁山確實是因為「逼」，然而與「官逼」相反，這種逼迫行為的發出者正是梁山泊，使「逼」的受害者成為新一批的強盜，作家孫琰《有關官逼民反<sup>223</sup>》一文中舉例說明：

1. 阮氏三兄弟：吳用成功地說服三阮「撞籌」，其關鍵就在「大魚」二字觸動了他們的傷心處。吳用以「大魚」為餌，採取步步進逼的方式，說動三阮參加到「七星聚義」的行列中來，這才有了「智取生辰綱」和「梁山泊大火拼」，從此以晁蓋為首的新一代好漢登上了梁山泊的舞臺。
2. 楊志：三阮加入「七星聚義」，奪取生辰綱，最終逼迫楊志落草。青面獸楊志最初只為「清白姓字，不肯將父母遺體來點汙了」，拒絕了王倫的挽留，最後被刺配到北京大名府梁世傑處，而押送生辰綱本是梁中書「有心抬舉」，誰知半路卻被以晁蓋為首的「七星」劫了去。從此楊志只好放棄了「指望把一身本事，邊庭上一槍一刀，博個封妻蔭子，也與祖宗爭口氣」的美好願望，跑到二龍山去落草。
3. 秦明、蕭讓、金大堅、李應、朱仝、徐甯、盧俊義、安道全等：為

<sup>223</sup> 孫琰著：《有關官逼民反》，山東，魯東大學漢語語文學院，〈現代語文(文學研究)〉，2007年第05期。

了維護自身的利益而「賺」人上山，梁山泊往往採取絕人後路的辦法，手段極為卑鄙和殘忍。為拉秦明入夥，宋江派花榮等人假扮秦明將青州城外數百人家放火燒為平地，殺死男子女人不計其數，致使秦明一家老小遇害。為招李應入夥，晁蓋、宋江又指使人冒充官府，強行將他的老小搬取上山，將李家莊放火燒盡，讓他們無家可歸；為讓朱仝上山，宋江、吳用指使李逵將四歲的小衙內劈成兩半；為招盧俊義入夥，吳用設計將盧俊義賺到梁山，使其有家難歸，身陷囹圄；為拉安道全入夥，張順殺死虔婆、李巧奴等人，並嫁禍于安道全，讓他也只能乖乖得跟著張順上了梁山。

另外談到有關於《水滸傳》的主題，歷年來研究相關議題的學者專家常以「官逼民反」來加以釋義，並且以正史中有紀載的北宋時期宋徽宗發生過的事例，與小說中的時空背景加以比對之後來證實此一觀點。《水滸傳》一開始便以此為開端，首先寫到宋徽宗如何寵信高俅，讓此人由市井無賴升為殿帥府的太尉，並任用蔡京、童貫、楊戩等奸臣以拔持朝政，由此禍為源加以驗證被「逼上梁山」確實因為「亂自上作」。那麼應該如何解釋「逼」這個字，從一面零八將上梁山落草的原因是不是能歸納為「官逼民反」，筆者參照作家孫琰《有關官逼民反<sup>224</sup>》一文表例說明：

---

<sup>224</sup> 孫琰著：《有關官逼民反》，山東，魯東大學漢語語文學院，〈現代語文(文學研究)〉，2007年第05期。

表 6 梁山英雄出身類別表

梁山英雄出身類別表		
類別	代表人物	事例
第一類	少華山：朱武、陳達 梁山泊：王倫、杜遷、宋萬 呂方：對影山 白虎山：孔明、孔亮 二龍山：魯智深、楊志、武松 芒陽山：樊瑞、項充、李袞 枯樹山：鮑旭	※打家劫舍的強盜。 ※王英原是車家出身，後因半路裡見財起意，就勢劫了客人，並與燕順、鄭天壽同霸清風山。還有一部分人雖然身份不是強盜，但也獨霸一方或者欺行霸市：如施恩就是快活林一霸
第二類	梁山泊：朱貴 十字坡：孫二娘、張青	※開黑店的小商販。
第三類	宋江：鄆城縣押司 朱仝、雷橫：都頭 戴宗：江州府節級 李逵：小獄卒	※有一部分原來是當時官府的小官吏。 ※梁山泊一百八人，強半為在官人役，如都頭也，教師爺，裡正也，書吏也，而一一都歸結於為盜，則著者之視在官人役為何如可知矣。
第四類	阮氏三兄：漁民 解珍、解寶：獵戶	※真正的「無產者」。 ※非受盡欺壓、手無縛雞之力的貧民，就像阮家三兄弟，他們有漁船、漁具等生產工具，平常還能弄到閒錢去賭博，可見也並非到了赤貧的狀態。
第五類	秦明、蕭讓、金大堅、朱仝、徐甯、盧俊義、安道全	※為梁山利益而被「賺」者。
第六類	呼延灼、韓滔、彭玘、關勝、魏定國、單廷圭	※被招降的軍官。
第七類	林沖、魯智深	※真正被逼而造反的。
備考	參考：孫琰著：《有關官逼民反》，山東，魯東大學漢語語文學院，〈現代語文(文學研究)〉，2007年第05期。	

現在世界各國大多數均屬於民主國家，造反一詞就極少出現了，即使有也會被認為是一種異常的社會現象，例如我們的總統在治理國家上，政策執行面被大多數民眾否認，透過憲法的規定採罷免程序就可將行換人，反之在古代社會均屬封建制度，政策執行僅掌握在君主及少數王公權貴手上，若搞的民不聊生自然而然會有人揭竿而起大唱造反口號。《水滸傳》的核心內容是有關於造反的，實際上，從古迄今，犯罪及其他反社會行為始終難與造反劃清界線，文學作家周家發在〈談《水滸傳》思想的複雜性〉一文中說明：

《水滸傳》的造反主題對一般讀者心中的維護現有社會制度的理念構成了一定程度的衝擊。試拿《水滸傳》跟《西遊記》和《三國演義》作一比較。後兩部小說的主題思想都是維護既有的社會秩序，《西遊記》的開首雖然講述了孫悟空大鬧天宮的「造反」行徑，但最終孫悟空還是「回歸正途」，保護師父取西經，還一路做惡懲奸，最後得以「修成正果」；《三國演義》的主題思想—「擁劉反曹」，就更加是維護封建正統。相比之下，《水滸傳》的造反主題便顯得非常大逆不道<sup>225</sup>。

《水滸傳》寫的最精采並且人人所悉知的部分應該是屬於前半部了，講述著英雄們聚義於梁山泊的故事，至於後半部「改邪歸正」接受朝廷的招安，大多數人對這一部分較欠熟。所以說梁山好漢給人的第一印象是落草為寇的起義者，而非接受招安後朝廷的鷹犬，這些正是《水滸傳》不同於《西遊記》之處。

這是一個有條件的合理化過程，即一般大眾並非認同一切造反行為，而只是認同在「官逼」情況下的「民反」行為。因此一位《水滸傳》的讀者可以一方面贊同梁山好漢的造反行徑，而另一方面卻對發生在他周遭現實環境的反社會行為持否定態度<sup>226</sup>。

由於《水滸傳》所講的主題大多屬於造反，這對於現今社會的讀者是必會造

---

<sup>225</sup> 周家發著：〈談《水滸傳》思想的複雜性〉，發表於中國，大紀元文化網，2005年1月5日，第3頁。

<sup>226</sup> 周家發著：〈談《水滸傳》思想的複雜性〉，發表於中國，大紀元文化網，2005年1月5日，第4頁。



成心理上一定程度的衝擊，且需把整個梁山好漢的行徑「合理化」等同於現今社會的合法化，要同意因為當時的朝廷腐敗、貪官污吏橫行，因而梁山好漢聚義造反是有理的，所以邊看的同時要邊思考古時和現今制度的差異性。同樣的，一位喜歡《水滸傳》的家長或者老師都可以鼓勵他們的孩子或則是學生讀《水滸傳》，但是同時卻得說明教育他們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故然《水滸傳》的故事很多精神是值得我們去學習的，但也有許多的錯誤是值得我們去思考必免的，這個應該就算是《水滸傳》之所以複雜的地方。

### 小結：

雖然《水滸傳》如上所述具有大逆不道的主題，可是歷來它卻又能為廣大讀者接受，甚至躋身於「中國四大古典小說」之林。其原因為除了它有很高的文學技巧外，造反的主題切合了大多數讀者的一種需要，就是對壓迫的控訴。事實上，這種需要不僅在中國存在，在外國也存在，所以外國亦有關於「俠盜」的小說(如羅賓漢)，只是其藝術性和影響力遠遠不及《水滸傳》而已。在古代社會，尤其是政治腐敗或處於異族壓迫的時期，封建剝削沉重，貪官污吏橫行，百姓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敢怒而不敢言，而《水滸傳》正好為他們出了一口污氣。在現代社會，由於幾乎世界每個國家都曾經過革命的洗禮，人們對「造反/革命」等反政府行為有更大的理解和容忍度，因此即使生活在現今政治較為清明的國家裡，也能認同古代造反者的行為。

## 第陸章 結論

《水滸傳》一書除了故事情節的演變，作者也在講述基層官吏的故事，賈志剛從《水滸傳》看宋代基層政治生態一文中解釋：

透過《水滸傳》來研究宋朝的基層政治，會得出結論：所謂的梁山好漢反貪官的故事，不過是汙吏反貪官的故事，所以汙吏們的志向就是「早早招安，博得個封妻蔭子」。換句話說，就是想從汙吏進階到貪官，以楊志和朱仝與宋江都有此想法，才會有一開始並不想上梁山，最後被逼上梁山<sup>227</sup>。

在相同的時間與當代其他國家來做比較，宋朝在於政治制度、科學文化及經濟民生方面都是位於前列，但還是無法脫離「普遍貧窮」的社會特徵。另外宋朝常年與北方發生戰事但屢屢戰敗，透過著一些不平等的條約並以財物、割地換取暫時性安定的局面。而《水滸傳》的故事就發生在宋徽宗宣和年間，讀過歷史我們都知道宋徽宗趙佶詩畫精通，甚至還有「瘦金體」傳世於今，但是作為皇帝卻不是個明君。他一即位就重用蔡京、童貫、高俅等人，修延福宮，築萬壽山，統治者重用奸臣的結果，就已經開始產生了「亂自上始」。

《水滸傳》中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和統治階級的罪惡，寫出了「官逼民反」、「亂由上作」的歷史真實，揭示出平民反抗朝廷的社會根源在於殘酷的封建壓迫和剝削，肯定和歌頌了梁山造反的正義性。小說描寫了一支游民起義隊伍從無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由分散而匯合、由盲目行動而變為有明確的行動綱領，以及最後受招安、徹底失敗的全過程。

薩孟武《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該書是一系列專欄文章的結集。這本小書的開篇，談的是梁山泊的社會基礎，也就是什麼樣的社會結構促成了水滸亂世的出

<sup>227</sup> 賈志剛：〈從《水滸傳》看宋代基層政治生態〉，中國知網空間圖書館，2014年7期3篇。

現。薩老先生著重點出，引發社會動盪的是兩個集團，一是豪強，二是流氓。豪強主要憑藉政治權力，利用農民的貧苦，大肆兼併土地，成為純粹的食利者。通過佔有土地而征斂的資源，不會用於擴大生產，而只是用於奢侈消費，對經濟發展毫無益處。豪強還可以通過與政權的聯繫，避免交納稅賦，這部分擔子就又落在已經極度貧苦的農民身上，直到把穩定的社會基礎完全壓垮。一旦天下大亂，豪強便紛紛起事，逐鹿中原。

梁山泊集眾英雄好漢於一隅，但從正統官方來看，仍是一群草寇流氓。雖然宋江起兵造反之正當性為「替天行道」，也就是為百姓伸張正義。但在《水滸傳》中真正替天行道的又有幾個，在政治上，既包括除暴安民、打抱不平，又包括護國安民，為朝廷效力，真正目的只是圖個「博得個封妻蔭子」而已。

反看現今的社會「豪強」無疑再現了，雖然不像古時那樣的暴力，但運用各種政治手段直接或者間接的圖利，已漸形成騎在人民頭上的食利者，聚斂資源的方式不外乎土地集中，最重要的手段還是佔有土地。而今之所出現大規模的「流氓」集團，卻也是土地資源之獵奪者，試看全台的議會，有多少不是豪強與流氓。社會的不穩是惡性的政治社會過程造成的，而不是由於文藝作品的煽動造成的。精英人士面對這樣的問題，表現出了驚人的愚蠢。豪強與流氓的胃口很大，雖然已經撈了很多，但是還沒撈夠，還想撈更多，政府對這種趨勢可能造成的後果，又不敢正視，以為在視線所及看到的是歡樂祥和，世界就會永遠歡樂祥和下去。

在徐塑方及孫秋克共同所著《明代文學史》一書中分析到：

歷史上起義造反後失敗的形式和下場，概括起來不外乎三種：一是被封建統治階級所鎮壓，不是失散就是被殺；二是向封建統治階級投降，不是被殺就是為其打仗；三是起義領袖當上了新的皇帝，建立起新的王朝<sup>228</sup>。

當然在這三種的形式之中一定會有所區別，在歷史上所造成的影響也會有一

---

<sup>228</sup> 徐塑方、孫秋克著：《明代文學史》，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年6月1日，第2節。

定上的差異，如果是因為英勇的反抗無法相對抗衡而遭到鎮壓，向統治者投降這當然不能做為比較。然而就最終來說，無論是那一種形式都是失敗，即使是當上了皇帝表面上看似成功，但實際上也算是失敗，因為無法改變封建社會的關係和政治制度，只是變換了朝代而以。因此《水滸傳》中的梁山英雄接受了朝廷招安也是歷史起義上一種失敗的形式。

如果我們從小說內容具體的來分析，可以查覺到從梁山起義到招安投降的這個過程並非是偶然的，而是有著其深刻的潛在因素，在《中國故代文學史》一書中有說道：

《水滸傳》中寫梁山義軍隊伍不是在形勢對他們極端不利的情況下出於走投無路，才被迫接受統治階級招安的；恰恰相反，他們是在取得了兩贏童貫、三敗高俅等一系列輝煌勝利的大好形勢下主動向統治階級投降的。而這種情況之所以出現，確是因領導人宋江的思想、立場及其所推行的路線有關；也是和小說中所宣揚的忠義思想以及作者的儒家「忠孝」觀念密切關聯<sup>229</sup>。

在《水滸傳》中的故事情節我們可以看到許多都是在進行道德的譴責及歌頌梁山英雄的見義勇為，作家森林在其著《水滸梁山「替天行道」到底是什麼》說道：

「替天行道」中的「道」與儒家的「道」卻有幾分相通之處。其譴責和歌頌的標準都以孔孟學說的道德為準繩，像書中譴責高俅的為富不仁和潘金蓮、閻婆惜的不守婦道，歌頌梁山英雄見義勇為、打抱不平的壯舉等等，這些都與儒家的道德規範極為吻合，所以說《水滸傳》中「替天行道」應是儒家的仁義之道，忠義之德<sup>230</sup>。

---

<sup>229</sup> 冷成金編著：《中國故代文學史四》，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3月1日，第155頁。

<sup>230</sup> 森林著：《水滸梁山「替天行道」到底是什麼》，北京，每日頭條雜誌歷史篇，2017年1月3日版。

所以說梁山好漢之「替天行道」無論是俠義還是忠義，它都是承認君權的存在，「道」就是君臣之義，替天行道就是替君行道，客觀上維護著這一君權的存在。

在小的時候，我們總認為這個世界非黑即白，所有故事、劇集中的人物非正即邪。但其實這個複雜世界可以存在亦正亦邪的事物，而這種認識只有在我們思想較為成熟後才能達到，一般樸實的百姓把《水滸傳》和自己的生活結合，凡和自己意見相左者，即起而走上反抗或表現出不悅的面貌，台灣目前社會風氣，已展現出只要跟我意見相左者，就不是同志，就要反對，如此思維的人，他是正或是邪呢？

總之，不管是封建時代，還是民主時代，就一般百姓而言，個人對統治階層大多沒有反抗能力，就是要有人起來領導，採集體抗爭成功的機會才會有。所不同的是封建時期，對統治階層抗爭會隨時要被殺頭的，推翻朝代換人不易；民主時代抗爭卻隨處可見，選舉制度造就做不好就換人來做，但選完後和封建時期一的換人不易，只能忍受。比封建時代進步的是資訊較明朗，百姓被剝削的機會幾乎沒有，但貪官依然存在。

試觀古代貪官受到懲處有多少，每個朝代，每時期都不一樣，但只要貪官污吏受制裁，人民均歡欣鼓舞，而受到制裁比率至今沒有統計過，應該不會太高。所以，貪官才會不一直出現。只是古代貪官是直接向百姓搜刮，騙取國庫。現今的貪官貪的也是國庫及社會的公共財，沒有和百姓自己有直接的關連。因此，人民被剝削的感受就沒有古代來的強烈吧。

而貪官污吏的懲治就看當時的領袖作為和社會風氣，而社會風氣是由領袖起帶頭作用。所以，領袖的能力與特質就顯得格外重要。宋朝從上至下大部分是自私自利的官僚，無法為國舉才，即使高俅重用楊志和呼延灼及關勝，也都是為一己之私，難怪宋朝積弱不振。再看梁山泊領袖宋江，雖不是衝鋒陷陣的猛將，卻

是一位成功的管理者和領導者。宋江和前兩位領袖王倫、晁蓋相比，無疑的宋江更深諳管理的藝術，他個人氣質使他成為一個深具凝聚力的好領袖。因此，民主時代的政治制度，讓人民自己選擇領袖，選舉好的領袖可以將國家帶向光明，選到壞的領袖卻讓國家停滯不前，甚至衰退滅亡。中華民國台灣有好的政治制度，要走向光明或是邁向滅亡，就看我們選出來的領袖的作為了。



## 參考文獻

### 一、中文書籍

-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上，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 年版。
- (明)施耐庵著：《水滸傳》下，臺北，正中書局發行，1970 年版。
- 于學彬著：《水滸傳講義》，臺北，實學社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 王利器著：《水滸研究》，中國古典小說名著研究叢刊之二，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 年。
- 王北固著：《水滸傳的組織謀略》，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
- 王守法編著：《中國政治制度史》，中國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 年。
- 李春林著：《官逼民反話水滸》，臺北，旺文社股份有限公司，1974 年。
- 李鑿、邱燮友、王更生、鄭明姍、沈謙編著：《中國文學概論》，新北市，國立空中大學印行，1989 年。
- 沈謙、徐泉聲、簡恩定、許應華編著：《中國文學導讀》，新北市，國立空中大學印行，1992 年。
- 余大平著：周積明主編。《解讀水滸傳草莽龍蛇》，新北市，雲龍出版社，2002 年。
- 李文序、魏春健等編著：《讀水滸掌握方法》，臺北，先智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 李桂奎著：《小說與人生境界十講》，中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 年。
- 何梅琴、范桂紅編著：《翫. 水滸》，新北市，咖啡田文化出版社，2005 年。
- 吳閑雲著：《黑水滸》，中國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4 年。
- 姚朋、朱炎、羅宗濤、高大鵬編著：《文學與社會》，新北市，國立空中大學印行，1992 年。
- 馬幼垣著：《水滸人物之最》，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 馬幼垣著：《水滸二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 孫琳著：《水滸傳-續作研究》，中國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
- 梁庚堯著：《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下冊》，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
- 許晏駢著：《水滸人物別傳》，臺北，金蘭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
- 黃水華著：《中國古代兵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
- 麥高濶著：朱濤、倪靜譯。《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臺北，花神出版社，2002年。
- 梁庚堯著：《南宋的農村經濟》，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 傅錫王編撰：梁山英雄榜《水滸傳》，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1年。
- 蒲安迪(美)著：《明代小說四大奇書》，中國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
- 劉良明著：《中國小說理論批評史》，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
- 駱玉明編選：《水滸傳故事選》，臺北，業強出版社，1992年。
- 蕭相愷編著：《水滸傳-鑒賞辭典》，中國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年。
- 盧永和著：《經典與民間-水滸敘事的文化闡釋》，中國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4年。
- 盧永和著：《經典與民間-水滸敘事的文化闡釋》，中國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4年。
- 薩孟武著：《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67年。
- 薩孟武著：《中國社會政治史》，臺北，三民書局印行，1977年。
- 韓秋白、顧青著：《中國小說史》，臺北，文津文化出版社，1995年。
- 鍾敬文、許鈺編著：《水滸傳》的傳說，臺北，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年。



## 二、學位論文(依完成先後順序)

- 李慧淳著：《水滸傳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72年。
- 崔省南著：《水滸傳寓意與結構分析》，國立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2年。
- 陳美伶著：《水滸傳之人物刻畫技巧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年。
- 林慶揚著：《水滸傳的人格世界》，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碩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
- 黃崇旻著：《水滸傳小說中的山寨研究》，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 康珮著：〔《忠義水滸全書》的義理闡釋——從人性、權力與符號的角度分析〕，桃園中壢中央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
- 林培雅著：《水滸傳關勝座次排名芻議》，國立臺南成功大學中文學報第二十六期，2009年。
- 翁菁好著：《水滸傳天命思想的運用研究》，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
- 許師用著：《水滸傳內容與立場的衝突述析》，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1年。
- 林詩涵著：《水滸傳思想及藝術研究》，私立彰化明道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
- 黃宜諭著：〔林奕華導演作品《水滸傳》、《西遊記》之男性氣概與顛覆〕，國立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碩士論文，2013年。

## 二、期刊論文(依完成先後順序)

- 孫述宇著：「南宋民眾抗敵與梁山英雄報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集 3》，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1 年。
- 馬幼垣著：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排座次以後水滸傳的情節和人物安排」《古典文學》第七集下冊，臺灣，學生出版，1985 年。
- 李基妍著：「書評：李慧淳著「水滸傳研究」」《中國語文學》第 10 輯，1985 年。
- 傅正玲著：「從水滸傳七十回本及一百二十回本探究兩種悲劇類型」，中國北京，漢學研究第 18 卷第 1 期，2000 年。
- 王麗娟著：「20 世紀水滸故事源流研究述評」，中國河南，中州學刊 5 月第 3 期，2003 年。
- 胥惠民著：「論《水滸傳》「義氣」文化的意義」，中國山東，荷澤學院學報第 3 期，2006 年。
- 孫琰著：「有關「官逼民反」」，中國北京，現代語文(文學研究)第 05 期，2007 年。
- 韓亞男著：「水滸傳中宋江的性格」，中國山西，忻州師範學院學報，2008 年。

## 四、網路資料來源

- 十年砍柴(李勇)著：《官軍為何不如民團》，  
<http://www.xiexingcun.com/shuihu/10/mydoc016.htm> 瀏覽日期：2015/11/20
- 朱筱新著：《古代的軍事訓練》，  
<http://big5.qikan.com/gate/big5/m.qikan.com/ArticleContentNew.aspx?titleid=81DBC8B3-E652-4C2A-8B0D-9624D3F54E1E&categorycode=8&Rowid=16&type=2>  
瀏覽日期：2016/02/22

- 余大平著：《為什麼要讓晁蓋早死》，  
<http://www.shui-hu.com/asp/Article.asp?ArticleId=5374> 瀏覽日期：2015/11/13
- 放言集：《淺說水滸傳》 <http://kmg1688.blogspot.tw/> 瀏覽日期：2015/10/248
- 周曉彤著：《淺論宋江的形象》，  
<http://www.wenku1.com/view/B4F5DA02A8D20479.html> 瀏覽日期：2015/11/9
- 陳良著：《梁山好漢的江湖義氣》，  
<http://video.sina.com.cn/v/b/72025696-1349311750.html> 瀏覽日期：2015/10/24
- 雪域寒川著：《從《水滸》看宋代軍事弊端》  
<http://article.hongxiu.com/a/2007-11-19/2428690.shtml> 瀏覽日期：2016/2/29
- 盧明著：《托塔天王稱晁蓋》，水滸國際網絡，  
<http://www.shui-hu.com/asp/Article.asp?ArticleId=5349> 瀏覽日期：2015/10/2
- 《中國傳統社會的仕紳與地方菁英》，<http://www.fancoll.com/79.html>  
瀏覽日期：2015/10/26
- 劉秉光著：《水滸宋江的真實背景來歷》，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9353640100opkh.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9353640100opkh.html) 瀏覽日期：2015/11/05
- 劉兆輝著：《草評「開國皇帝多流氓」》，  
<http://jftz.blogchina.com/91908.html> 2005-09-29 瀏覽日期：2016/06/02

附錄 1 梁山泊好漢全覽解悉表(三十六天罡星)

梁山泊好漢全覽 (三十六天罡星)			
排名	姓名	簡介	備考
1	宋江	天魁星，綽號「及時雨」、「呼保義」。原為鄆城縣押司，晁蓋死後成為梁山寨主。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一，為總兵都頭領。招安後被封為武德大夫、楚州安撫使兼兵馬都總管，後被高俅等奸臣毒死。而亡。	三十六 天罡星
2	盧俊義	天罡星，綽號「玉麒麟」。原為北京大名府員外，上梁山後坐第二把交椅。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二，為總兵都頭領。招安後被封為武功大夫、廬州安撫使兼兵馬副總管，後被高俅等奸臣毒傷，落水而亡。	
3	吳用	天機星，綽號「智多星」，表字學究，道號加亮。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三，為梁山掌管機密軍師，招安後被封為武勝軍承宣使。宋江被害後，自縊於其墳前。	
4	公孫勝	天閒星，綽號「入雲龍」，道號一清先生。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四，為梁山掌管機密副軍師。招安後參加征討遼國之戰，後辭別眾人回薊州出家。	
5	關勝	天勇星，綽號「大刀」。原為蒲東巡檢使。被蔡太師派遣征討梁山泊時失敗並投降。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五，為馬軍五虎將之首。招安後被封為大名府正兵馬總管。	
6	林沖	天雄星，綽號「豹子頭」。原為東京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因高俅陷害而投奔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六，為馬軍五虎將之一。病逝於杭州六合寺。	
7	秦明	天猛星，綽號「霹靂火」。原為青州都統制，攻打清風山時投降於宋江。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七，為馬軍五虎將之一。征討方臘時被方傑刺於馬下，死於非命。	

排名	姓名	簡介	備考
8	呼延灼	天威星，綽號「雙鞭」。原為汝寧郡都統制，攻打梁山時投降於宋江。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八，為馬軍五虎將之一。招安後被封為御營馬指揮使。	三十六 天罡星
9	花榮	天英星，綽號「小李廣」。原為清風寨武知寨，受文知寨劉高陷害後造反上梁山。石碣天書後排名第九，為馬軍八驍騎兼先鋒使之首。招安後被封為應天府兵馬都統制，後自縊於宋江墳前。	
10	柴進	天貴星，綽號「小旋風」。原為滄州莊園主，遭高廉陷害後被宋江救上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十，負責與李應一起掌管錢糧財物。招安後被封為滄州都統制，征討方臘歸來後辭官為民。	
11	李應	天富星，綽號「撲天鵬」。原為李家莊莊主，宋江攻破祝家莊後隨其上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掛名第十一，負責與柴進一起掌管錢糧財物。招安後被封為中山府鄆城都統制。征討方臘歸來後辭官為民。	
12	朱仝	天滿星，綽號「美髯公」。原為鄆城縣都頭，因放走雷橫而被發配滄州，後被吳用逼上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十二，為馬軍八驍騎兼先鋒使之一。招安後被封為保定府都統制。	
13	魯智深	天孤星，綽號「花和尚」，原名魯達。原為滑州經略府提轄，因打人致死而出家，落草於二龍山，隨後歸於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十三，為步軍頭領之首。征討方臘時生擒賊首，後於杭州六合寺坐化。	
14	武松	天傷星，綽號「行者」。因替兄長武大及朋友施恩報仇而兩次被刺配，後在張青夫婦的幫助下落草於二龍山，最後歸於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十四，為步軍頭領之一。征討方臘時單臂殘疾，遂於六合寺出家。	

排名	姓名	簡介	備考
15	董平	天立星，綽號「雙槍將」。原為東平府兵馬都監，被擒後歸順於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十五，為馬軍五虎將之一。征討方臘時於獨松關陣亡。	三十六 天罡星
16	張清	天捷星，綽號「沒羽箭」。原為東昌府統制，被擒後歸於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十六，為馬軍八靚騎兼先鋒使之一。征討方臘時獨松關陣亡。	
17	楊志	天暗星，綽號「青面獸」。原為殿帥府制使，因花石綱、生辰綱相繼失陷而落草於二龍山，最後歸順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十七，為馬軍八靚騎兼先鋒使之一。征討方臘時病故於丹徒縣。	
18	徐寧	天佑星，綽號「金槍手」。原為東京禁軍金槍班教頭，呼延灼征討宋江時，被請上以對付連環馬陣。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十八，為馬軍八靚騎兼先鋒使之一。征討方臘時亡。	
19	索超	天空星，綽號「急先鋒」。原為大名府管軍提轄使，被擒後歸順於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十九，為馬軍八靚騎兼先鋒使之一。征討方臘時亡。	
20	戴宗	天速星，綽號「神行太保」。原為江州兩院節級，因替宋江傳假信而入獄，後被救上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二十，為總探聲息頭領。招安後被封為兗州府都統制，征討方臘歸來後辭官出家。	
21	劉唐	天異星，綽號「赤髮鬼」。與晁蓋等人劫取生辰綱後同上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二十一，為步軍頭領之一。征討方臘時於杭州陣亡。	
22	李逵	天殺星，綽號「黑旋風」。原為江州牢營獄卒，為救宋江而造反並上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二十二，為步軍頭領之一。招安後被封為潤州都統制，後被宋江毒死。	

排名	姓名	簡介	備考
23	史進	天微星，綽號「九紋龍」。因與少華山朱武、陳達、楊春等人結義而落草。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二十三，為馬軍八飄騎兼先鋒使之一。征討方臘時於昱嶺關陣亡。	三十六 天罡星
24	穆弘	天究星，綽號「沒遮攔」。宋江題反詩後，為救宋江而造反並上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二十四，為馬軍八飄騎兼先鋒使之一。征討方臘時於杭州病故。	
25	雷橫	天退星，綽號「插翅虎」。原為鄆城縣都頭。殺人後被朱仝放走，遂來到梁山入夥。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二十五，為步軍頭領之一。征討方臘時於杭州陣亡。	
26	李俊	天壽星，綽號「混江龍」。宋江題反詩後，為救宋江而造反並上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二十六，為水軍頭領之首。征討方臘後裝病隱退。	
27	阮小二	天劍星，綽號「立地太歲」。與晁蓋等人劫取生辰綱後同上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二十七，為水軍頭領之一。被擒後自刎而亡。	
28	張橫	天平星，綽號「船火兒」。宋江題反詩後，為救宋江而造反並上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二十八，為水軍頭領之一。征討方臘時於杭州病故。	
29	阮小五	天罪星，綽號「短命二郎」。與晁蓋等人劫取生辰綱後同上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二十九，為水軍頭領之一。征討方臘時於清溪縣幫源洞陣亡。	
30	張順	天損星，綽號「浪裡白條」。宋江題反詩後，為救宋江而造反並上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三十，為水軍頭領之一，征討方臘時於杭州陣亡。	



排名	姓名	簡介	備考
31	阮小七	天敗星，綽號「活閻羅」。與晁蓋等人劫取生辰綱後同上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三十一，為水軍統領之一。征討方臘後被封為蓋天軍都統制，後被奸臣奪職為民。	三十六 天罡星
32	楊雄	天牢星，綽號「病關索」。原為蘆州押獄兼行刑劊子手，因夥同石秀殺妻而投奔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三十二，征討方臘時於杭州病故。	
33	石秀	天慧星，綽號「拚命三郎」。為幫義兄楊雄除殺淫婦而投奔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三十三，為步軍頭領之一。征討方臘時於昱嶺關陣亡。	
34	解珍	天暴星，綽號「兩頭蛇」。原為山中獵戶，入獄後被顧大嫂等人救出，遂投奔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三十四，為步軍頭領之一。征討方臘時墜崖身亡。	
35	解寶	天哭星，綽號「雙尾蠍」。原為山中獵戶，入獄後被顧大嫂等人救出，遂投奔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三十五，為步軍頭領之一。征討方臘時墜崖身亡。	
36	燕青	天巧星，綽號「浪子」。原為盧俊義家僕，為救主人而投奔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三十六，為步軍頭領之一。征討方臘後悄然消失。	

※資料來源：參考呂哲編著：《圖解水滸傳》，新北市華威國際事業有限公司出版，2014年3月，第278頁(梁山泊好漢全覽)，改撰。



附錄 2 梁山泊好漢全覽解悉表(七十二地罡星)

梁山泊好漢全覽(七十二地煞星)			
排名	姓名	簡介	備考
37	朱武	地魁星，綽號「神機軍師」。原與陳達、楊春、史進落草少華山，後歸於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三十七，為同參贊軍務頭領。征討方臘後被封為武奕郎兼都統領，後棄官山家。	七十二 地煞星
38	黃信	地煞星，綽號「鎮三山」。原為青州兵馬都監，於清風山戰敗後歸順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三十八，為馬軍小彪將兼遠探出哨頭領之首。征討方臘後被封為武奕郎兼青州兵馬都統領。	
39	孫立	地勇星，綽號「病尉遲」。原為登州兵馬提轄，為救解氏兄弟而造反後歸順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三十九，為馬軍小彪將兼遠探出哨頭領之一。征討方臘後被封為登州兵馬都統領。	
40	宣贊	地傑星，綽號「醜郡馬」。原為蔡京手下武將，征討宋江被擒後歸順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四十，為馬軍小彪將兼遠探出哨頭領之一。征討方臘時於蘇州陣亡。	
41	郝思文	地雄星，綽號「井木犴」。原為蔡京手下武將，征討宋江被擒後歸順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四十一，為馬軍小彪將兼遠探出哨頭領之一。征討方臘時於杭州陣亡。	
42	韓滔	地威星，綽號「百勝將」。原為陳州團練使，征討宋江被擒後歸順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四十二，為馬軍小彪將兼遠探出哨頭領之一。征討方臘時於杭州陣亡。	
43	彭玘	地英星，綽號「天目將」。原為潁州團練使，征討宋江被擒後歸順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四十三，為馬軍小彪將兼遠探出哨頭領之一。征討方臘時於宣州陣亡。	

排名	姓名	簡介	備考
44	單廷珪	地奇星，綽號「聖水將軍」。原為凌州團練使，征討宋江被擒後歸順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四十四，為馬軍小彪將兼遠探出哨頭領之一。征討方臘時於歙州陣亡。	七十二 地煞星
45	魏定國	地猛星，綽號「神火將軍」。原為凌州團練使，征討宋江被擒後歸順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四十五，為馬軍小彪將兼遠探出哨頭領之一。征討方臘時於歙州陣亡。	
46	蕭讓	地文星，綽號「聖手書生」。為救宋江，被吳用賺上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四十六，掌管梁山行文和調兵遣將之事。征討方臘歸來後，在蔡京府中擔任門館先生。	
47	裴宣	地正星，綽號「鐵面孔目」。原與鄧飛、孟康落草飲馬川，後隨戴宗歸於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四十七，為掌管守功賞罰軍政司。征討方臘後被封為武奕郎兼都統領。	
48	歐鵬	地閻星，綽號「摩雲金翅」。原與蔣敬、馬麟等人落草黃門山，後歸於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四十八，為馬軍小彪將兼遠探出哨頭領之一。征討方臘時歙州陣亡。	
49	鄧飛	地閻星，綽號「火眼狻猊」。原與裴宣、孟康落草飲馬川，後隨戴宗歸於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四十九，為馬軍小彪將兼遠探出哨頭領之一。征討方臘時於杭州陣亡。	
50	燕順	地強星，綽號「錦毛虎」。原為清風山寨主，為救宋江而歸於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五十，為馬軍小彪將兼遠探出哨頭領之一。征討方臘時於睦州陣亡。	
51	楊林	地暗星，綽號「錦鈞子」。隨戴宗投奔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五十一，為馬軍小彪將兼遠探出哨頭領之一。征討方臘後被封為武奕郎兼都統領，後辭官回到飲馬川。	
52	凌振	地軸星，綽號「轟天雷」。征討宋江被擒後歸順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五十二，為掌管專造大小火砲頭領。征討方臘後被留在朝廷火藥局御營。	

排名	姓名	簡介	備考
53	蔣敬	地會星，綽號「神算子」。原與歐鵬、馬麟等人落草黃門山，後歸於梁山。石揭受天書後排名第五十三，為主管錢糧收支頭領。征討方臘後被封為武奕郎兼都統領，後辭官回鄉。	七十二 地煞星
54	呂方	地佐星，綽號「小溫侯」。在花榮的幫助下，與郭盛一起歸於梁山。石揭受天書後排名第五十四，為守護中軍馬軍驍將。征討方臘時於烏龍嶺陣亡。	
55	郭盛	地佑星，綽號「賽仁貴」。在花榮的幫助下，與呂方一起歸於梁山。石揭受天書後排名第五十五，為守護中軍馬軍驍將。征討方臘時於烏龍嶺陣亡。	
56	安道全	地靈星，綽號「神醫」。宋江率軍攻打大名府時被賺上梁山。石揭受天書後排名第五十六，為專治內外科諸症的頭領。征討方臘後被封為太醫院金紫醫官。	
57	皇甫端	地獸星，綽號「紫髯伯」。宋江率軍攻打東昌府時被賺上梁山。石揭受天書後排名第五十七，為掌管專治馬匹疾病的頭領。征討方臘後被封為御馬監總使。	
58	王英	地微星，綽號「矮腳虎」。原為清風寨主，為救宋江而歸於梁山。石揭受天書後排名第五十八，為專掌三軍內探事馬軍頭領。征討方臘時於睦州陣亡。	
59	扈三娘	地慧星，綽號「一丈青」。被擒後歸順梁山，後被宋江配與王英。石揭受天書後排名第五十九，為掌管三軍內探事馬軍頭領。征討方臘時於睦州陣亡。	
60	鮑旭	地暴星，綽號「喪門神」。原為枯樹山寨主，在李逵的推薦下歸順梁山。石揭受天書後排名第六十，為步軍將校之一。征討方臘時於杭州陣亡。	
61	樊瑞	地然星，綽號「混世魔王」。原為芒碭山寨主，被公孫勝收服後歸順於梁山。石揭受天書後排名第六十一，征討方臘後被封為武奕郎兼都統領，後辭官出家。	

排名	姓名	簡介	備考
62	孔明	地狷星，綽號「毛頭星」。原為白虎山寨主，後歸順於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六十二，為守獲中軍步軍驍將。征討方臘時於杭州病故。	七十二 地煞星
63	孔亮	地狂星，綽號「獨火星」。原為白虎山寨主，後歸順於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六十三，為守獲中軍步軍驍將。征討方臘時於昆山淹死。	
64	項充	地飛星，綽號「八臂哪吒」。原為芒碭山寨主，被公孫勝收服後歸順於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六十四，為步軍將校之一。征討方臘時於睦州陣亡。	
65	李袞	地走星，綽號「飛天大聖」。原為芒碭山寨主，被公孫勝收服後歸順於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六十五，為步軍將校之一。征討方臘時於睦州陣亡。	
66	金大堅	地巧星，綽號「玉臂匠」。為救宋江，被吳用賺上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六十六，為掌管專造兵符印信頭領。受招安後在朝廷內府御寶監任用。	
67	馬麟	地明星，綽號「鐵笛仙」。原與歐鵬、蔣敬等人落草黃門山，後歸於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六十七，為馬軍小彪將兼遠探出哨頭領之一。征討方臘時於睦州陣亡。	
68	童威	地進星，綽號「出洞蛟」。隨李俊救宋江後歸順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六十八，為水軍頭領之一。征討方臘後與李俊一同隱退。	
69	童猛	地退星，綽號「翻江蜃」。隨李俊救宋江後歸順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六十九，為水軍頭領之一。征討方臘後與李俊一同隱退。	
70	孟康	地滿星，綽號「玉幡竿」。原與裴宣、鄧飛落草飲馬川，後隨戴宗歸於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七十，為掌管專工監造大小戰船頭領。征討方臘時於烏龍嶺陣亡。	

排名	姓名	簡介	備考
71	侯健	地遂星，綽號「通臂猿」。梁山智取無為軍時充當內應，後歸於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七十一，為掌管專造旌旗袍襖頭領。征討方臘時烏龍嶺陣亡。	七十二 地煞星
72	陳達	地周星，綽號「跳澗虎」。原與朱武、楊春、史進落草少華山，後歸於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七十二，為馬軍小彪將兼遠探出哨頭領之一。征討方臘時於昱嶺關陣亡。	
73	楊春	地隱星，綽號「白花蛇」。原與朱武、楊春、史進落草少華山，後歸於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七十三，為馬軍小彪將兼遠探出哨頭領之一。征討方臘時於昱嶺關陣亡。	
74	鄭天壽	地異星，綽號「白面郎君」。原為清風山寨主，為救宋江而歸於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七十四，為步軍將校之一。征討方臘時於宣州陣亡。	
75	陶宗旺	地理星，綽號「九尾龜」。原與歐鵬、蔣敬等人落草黃門山，後歸於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七十五，為監築梁山泊一應城垣頭領。征討方臘時於澗州陣亡。	
76	宋清	地俊星，綽號「鐵扇子」。跟隨哥哥宋江上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七十六，為掌管排設大小筵席頭領。征討方臘後被封為武奕郎，後辭官為民。	
77	樂和	地樂星，綽號「鐵叫子」。原為登州獄卒，解救解氏兄弟後歸於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七十七，為軍中走報機密步軍頭領之一。受招後被留在王都尉府中。	
78	贊旺	地捷星，綽號「花項虎」。原為東昌府副將，被擒後歸順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七十八，為步軍將校之一。征討方臘時於杭州陣亡。	
79	丁得孫	地速星，綽號「中箭虎」。原為東昌府副將，被擒後歸順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七十九，為步軍將校之一。征討方臘時於歙州陣亡。	



排名	姓名	簡介	備考
80	穆春	地鎮星，綽號「小遮攔」。宋江題反詩後，為救宋江而造反並上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八十，為步軍將校之一。征討方臘後被封為武奕郎，後辭官為民。	七十二 地煞星
81	曹正	地羈星，綽號「操刀鬼」。原與楊志、魯志深落草二龍山，後歸於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八十一，為掌管屠宰牛馬豬羊牲口的頭領。征討方臘時於宣州陣亡。	
82	宋萬	地魔星，綽號「雲裡金剛」。梁山元老之一。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八十二，為步軍將校之一。征討方臘時於潤州陣亡。	
83	杜遷	地妖星，綽號「摸著天」。梁山元老之一。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八十三，為步軍將校之一。征討方臘時於幫源洞陣亡。	
84	薛永	地幽星，綽號「病大蟲」。宋江題反詩後，為救宋江而造反並上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八十四，為步軍將校之一。征討方臘時於昱嶺關陣亡。	
85	施恩	地伏星，綽號「金眼彪」。與武松結識後同上二龍山，後歸於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八十五，為步軍將校之一。征討方臘時於常熟陣亡。	
86	李忠	地僻星，綽號「打虎將」。原為桃花山寨主，後歸順於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八十六，為步軍將校之一。征討方臘時於昱嶺關陣亡。	
87	周通	地空星，綽號「小霸王」。原為桃花山寨主，後歸順於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八十七，為馬軍小彪將兼遠探出哨頭領之一。征討方臘時於獨松關陣亡。	
88	湯隆	地孤星，綽號「金錢豹子」。隨李逵上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八十八，為掌管監督軍器鐵甲的頭領。征討方臘時於幫源洞陣亡。	
89	杜興	地全星，綽號「鬼臉兒」。原為李應家中總管，後隨同上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八十九，為南山酒店負責頭領之一。征討方臘後被封為武奕郎兼都統領，後隨李應回鄉。	

排名	姓名	簡介	備考
90	鄒淵	地短星，綽號「出林龍」。原為登雲山頭領，救出解氏兄弟後同上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九十，為步軍將校之一。征討方臘時於幫源洞陣亡。	七十二 地煞星
91	鄒潤	地角星，綽號「獨山龍」。原為登雲山頭領，救出解氏兄弟後同上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九十一，為步軍將校之一。征討方臘後被封為武奕郎兼都統領，後辭官回鄉。	
92	朱貴	地囚星，綽號「旱地忽律」。梁山原老之一。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九十二，為南山酒店負責頭領之一。征討方臘時於杭州病故。	
93	朱富	地藏星，綽號「笑面虎」。隨兄弟朱貴上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九十三，為監造供應酒醋的頭領。征討方臘時於杭州病故。	
94	蔡福	地平星，綽號「鐵胳膊」。原為大名府兩院押獄兼行刑劊子手，後歸順於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九十四，為專管行刑劊子頭領之一。征討方臘時於幫源洞陣亡。	
95	蔡慶	地損星，綽號「一枝花」。原為大名府押獄，後歸順於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九十五，為專管行刑劊子頭領之一。征討方臘後被封為武奕郎兼都統領，後辭官回京。	
96	李立	地奴星，綽號「催命州官」。宋江題反詩後，為救宋江而造反並上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九十六，為北山酒店負責頭領之一。征討方臘時於幫源洞陣亡。	
97	李雲	地察星，綽號「青眼虎」。原為沂水縣都頭，後被徒弟朱富逼上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九十七，為掌管造修房屋的頭領。征討方臘時於歙州陣亡。	
98	焦挺	地惡星，綽號「沒面目」。隨李逵歸順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九十八，為步軍將校之一。征討方臘時於潤州陣亡。	
99	石勇	地醜星，綽號「石將軍」。隨清風山隊伍同上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九十九，為步軍將校之一。征討方臘時於歙州陣亡。	

排名	姓名	簡介	備考
100	孫新	地數星，綽號「小尉遲」。救出解氏兄弟後投奔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一百，為東山酒店負責頭領之一。征討方臘後被封為武奕郎兼都統領，後辭官回鄉。	七十二 地煞星
101	顧大嫂	地陰星，綽號「母大蟲」。救出解氏兄後投奔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一百零一，為東山酒店負責頭領之一。征討方臘後被封為東源縣君，後辭官回鄉。	
102	張青	地刑星，綽號「菜園子」。原為二龍山寨主，後歸於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一百零二，為西山酒店負責頭領之一。征討方臘時於歙州陣亡。	
103	孫二娘	地壯星，綽號「母夜叉」。原為二龍山寨主，後歸於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一百零三，為西山酒店負責頭領之一。征討方臘時於幫源洞陣亡。	
104	王定六	地劣星，綽號「活閃婆」。隨張順上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一百零四，為北山酒店負責頭領之一。征討方臘時於宣州陣亡。	
105	郁保四	地健星，綽號「險道神」。原為曾頭市頭領，後歸順於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一百零五，為掌管把捧帥字旗的頭領。征討方臘時於幫源洞陣亡。	
106	白勝	地耗星，綽號「白日鼠」。智取生辰綱後被捕，被救上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一百零六，為軍中走報機密步軍頭領之一。征討方臘時於杭州病故。	
107	時遷	地賊星，綽號「鼓上蚤」。隨楊雄、石秀同上梁山。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一百零七，為軍中走報機密步軍頭領之一。征討方臘時於杭州病故。	
108	段景住	地狗星，綽號「金毛犬」。盜得寶馬後欲投奔梁山，卻引發曾頭市之戰。石碣受天書後排名第一百零八，為軍中走報機密步軍頭領之一。征討方臘時於烏龍嶺陣亡。	

※資料來源：參考呂哲編著：《圖解水滸傳》，新北市華威國際事業有限公司出版，2014年3月，第278頁(梁山泊好漢全覽)，改撰。